



主管單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主辦單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經濟管理研究所



主辦單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

經濟管理學刊

ACADEMIC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第1期

2023年12月



學研出版社
Academic Research Press

《經濟管理學刊》簡介

《經濟管理學刊》由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主管、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經濟管理研究所與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2023年3月，是國際性經濟管理專業刊物，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2957-675X（紙質版）、2957-6768（電子版），每半年出版一期。

《經濟管理學刊》是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的來源期刊，為澳門特區第一批被收錄的經濟管理類期刊。未來，為進一步加強學術影響力，將繼續申請加入其他國際期刊資料庫。

《經濟管理學刊》的評審和編委專家由經過全球招聘與嚴格遴選的國際知名學者所組成，本刊以“理論、實踐、前沿”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經濟管理領域的繁榮和發展。期刊實行稿件三審制和雙向匿名審稿制，自籌備、創立至今，期刊內容反映經濟管理研究領域共同關心的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長期積極主辦、協辦各種相關學術活動，並成為全國大學生管理挑戰賽的獨家合作期刊，日後，期望能進一步把本刊建設為國際上有知名度的經濟管理領域學術期刊。

主管單位：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主辦單位：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經濟管理研究所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

經濟管理學刊

ACADEMIC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第 1 期

2023 年 12 月

學研出版社

Academic Research Press

創刊詞

經濟斷崖式下滑前景不容樂觀 高勝文提多元建議解經濟困境*

高勝文

早前，政府公佈一系列經濟數據，資料顯示本澳經濟前景不容樂觀，以至投資市場吸引力有所減弱。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政策研究主任高勝文表示關注，他直言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並未到位，亟待改善，經濟轉型危機與機遇並存，為免“兩頭不到岸”，促解決第四次經濟轉型所引起的各類挑戰。對此，他提多元建議解經濟困境。

【本澳經濟前景不容樂觀】

高勝文表示，本澳近年受疫情、第四次經濟轉型、俄烏戰爭、加息及全球經濟不明朗等內外因素疊加影響，經濟形勢複雜且具不確定性，對民商帶來深切影響及隱憂，這均反映在澳門居民失業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與入境旅客相關數據等方面。本年5月至7月總體失業率為4.1%，本地居民失業率為5.4%，較上一期（4月至6月）分別上升0.4及0.6個百分點；就業不足率上升9.3個百分點至13.4%，而隨着應屆畢業生投入勞動力市場，預料失業率短期維持高位，甚至有趨升的可能。與此同時，本年7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103.95)按年上升1.38%，出現經濟學上的菲利普斯曲線惡化，即失業率與通貨膨脹同時加劇的“滯脹”局面；另一方面，今年1至7月入境旅客按年跌26.3%，不過夜旅客及留宿旅客分別減2.6%及47.9%，第二季旅客總消費（不包括博彩）按年減46.3%至38.5億澳門元，疫下旅客少、出行預算減少且消費力大不如前。從上述資料可見，本澳經濟前景不容樂觀。

* 本文根據2022年9月12日《市民日報》第1版之《經濟斷崖式下滑前景不樂觀 新舊產業協同發展面臨挑戰 高勝文：抓住經濟轉型促多元發展》一文改編而成。

【澳門投資市場吸引力有所減弱】

高勝文指出，隨着本澳經濟下行壓力加劇，失業率上升、就業不足、物價高企、外圍經濟疲弱等問題也日趨嚴重，居民在疫情下收入不足，幾乎花光積蓄，甚至出現負債，面對不樂觀的經濟環境，居民的消費意慾將進一步下降。政府雖推出了現金分享、抗疫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兩個“百億經援”、澳人食住遊、水電費補貼、稅務減免、帶津培訓、職業配對、及其他民生福利等援助措施，對“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等方面具短暫作用，但在長遠恢復與促進經濟發展方面成效不大。此外，有意見指，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公開競投招標書似與商業現實脫節，加上相關“限賭”政策，上述多種不利因素使澳門投資市場吸引力有所減弱。

【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並未到位，亟待改善。】

高勝文坦言，澳門屬全球高收入地區，居民理應在較佳的社會環境中成長及發揮所長，但現實卻是上樓難、交通擁擠、醫療與教育及青年政策有待完善、居民放下身段但失業率還不斷上升、營商環境惡劣且企業現倒閉潮、防疫政策矛盾混亂，出現公共管理學中的“政府失靈”現象。這說明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並未到位，亟待改善。

【經濟轉型危機與機遇並存】

高勝文回顧澳門近代經濟史稱，本澳經歷了三次經濟轉型，於晚清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原料加工業和專營制度產業，促成首次經濟轉型；此後，七、八十年代紡織製造業的興起及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開拓及發展了銀行、保險、房地產等高附加值服務業，這可視為第二次經濟轉型；20世紀末，澳門回歸後賭權開放，進入第三次經濟轉型。總的來說，三次經濟轉型，使產業從多元趨向單一，

也為經濟發展埋下危機隱患。近年，特區政府積極培育及發展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重點新興產業，由此，帶動澳門進入第四次經濟轉型，也為產業單一重新邁向多元提供了機遇。

【為免“兩頭不到岸”，促解決第四次經濟轉型所引起的各類挑戰。】

高勝文直言，從澳門近代經濟史可見，每次的經濟轉型約需二十年或以上的時間，且須配合前瞻性與跟進政策，否則會引致經濟轉型失敗。他憂慮，第四次經濟轉型涉及的新興產業，需要量與質並重的人資與配套，這並非短時間能實現，在近年經濟斷崖式下滑，加上“政府失靈”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原有產業衰退或消失，新興產業難以發展的“兩頭不到岸”局面。因此，系統深入地探討如何協同新舊產業發展，解決第四次經濟轉型所引起的各類挑戰，是迫在眉睫且極其必要的，並已成為當局不可回避的課題。

【多元建議解經濟困境】

高勝文期望，未來特區政府能在有擔當、有能力的官員領導下，帶領居民破局，並能更關心就業、住房、交通、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讓民商得到保障。對於如何緩解經濟困境，他結合微觀及宏觀經濟學的理论與實踐，從個人、社會以至區域合作等角度提以下多元建議：

1. 人才是推動澳門發展的重要保障，應加強各類人才培養，通過加大教育投入、延長居民受教育年限、針對特區銳意發展的行業，為居民提供適切課程等措施，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與競爭力。同時，也從人才回流及人才引進等方面完善人才政策；

2. 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大力促進經濟增長，如減輕稅收、降低利息、在重災困難行業推出以工代賑、增加公共工程等措施，刺激經濟增長與帶動就業

職位的增加；

3. **加強就業支援**，如完善就業服務，包括做好職業配對、監管招聘、後續支援，以及深化職業培訓計劃、提供聘用津貼、舉辦大型招聘會和逐步推行職業認證等，以全力協助居民提升職業技能及保障就業；

4. **鼓勵和支持創業**，以幫助居民自謀職業與吸納他人就業；

5. **完善與強化社會保障體系**，以減輕居民的失業壓力，促進居民再就業，這對緩解失業問題起重要保障作用；

6. **構建與促進勞資政三方和諧勞動關係**，實現效率、公平和表達權的平衡，這對杜絕勞資衝突與對立、緩解失業問題、維持社會穩定等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

此外，高勝文認為除上述六點建議外，還需結合加強吸引國外遊客、爭取正常及放寬通關、積極融入及共建大灣區等多元措施，才能真正緩解經濟困境。

高勝文直言，**加強吸引國外遊客**，是恢復本澳經濟的另一出路，因此，政府應儘快解決多年來客源單一的局面，放眼世界各地賭城，除了靠“賭”吸引遊客外，更多是通過世遺歷史、文化節慶、美食風俗等元素吸引遊客到來。誠言，澳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在賭收不斷暴跌的情況下，更應利用好“歷史文化優勢”，加強對外推廣澳門世遺景點、美食之都、品牌節慶活動等，加上澳門與葡語國家一直保持着友好聯繫，有望在現時“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的基礎上，打造第七大經濟走廊，即中葡經濟走廊。相信通過逐步落實中央明確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定能緩解經濟困境。

同時，高勝文表示，**爭取正常及放寬通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緩解經濟困境。近日在中央政府、廣東和珠海全力支持下，本澳已實現“動態清零”的防疫目標，

冀爭取正常及放寬通關，使居民，尤其是應屆畢業生能嘗試北上就業創業。他提到，早前出台的《關於支持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為本澳青年在大灣區就業創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建議政府結合實際，制定實行更積極、更開放及更有效的就業創業扶助政策，使居民在落戶、就業創業、工商登記、稅收、停居留和出入境、子女入學、購房、醫療、公共文化等方面得到優質的服務，助居民在大灣區就業創業。他也冀本澳青年結合自身的職業生涯規劃和各市發展的產業，進一步考察灣區各地的人才政策，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及國家作貢獻。

此外，高勝文談到，本澳失業問題也受到地理面積、城市規模、產業結構、經濟總量、貿易總額、人力資源等方面制約，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積極融入及共建大灣區**。他舉例指，深合區為澳門發展提供了現時面積三倍多的土地，有了這塊土地，可通過深合區重點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和現代金融產業等新興產業。長遠而言，期望透過積極融入及共建大灣區，促進產業多元發展，以應對由第四次經濟轉型所引起的各類挑戰。

上述之經濟管理問題為本人於2022年9月提出，相關部門已採納本人部分建議並有序跟進完善。未來，讓我們繼續以《經濟管理學刊》為平台，為社會建言獻策、貢獻力量，以實際行動踐行愛國愛澳。

《經濟管理學刊》顧問、主編

高勝文 博士、特聘教授

2023年12月20日 澳門回歸日 拂曉

於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目錄

《經濟管理學刊》簡介.....	封面二
創刊詞	
高勝文.....	I
目錄.....	VI
澳門金融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與構建“亞元”貨幣的推進路徑	
高勝文.....	1
數字化建設如何提升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基於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	
周紅 李政興 李征 梁鈺潔.....	20
公司治理與資訊環境—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的經驗證據	
王蕾.....	47
Z世代擇業觀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李錦昊 王瓊勝 蔣瑩.....	70
新冠肺炎疫情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評估—基於雙重差分模型	
范凱煊 羅瑩瑩 徐天琪.....	88

鋼鐵行業數位化轉型下的財務風險研究—以 C 鋼為例	
黃志林 李芊芊.....	104
關於非營利性組織參與社區養老治理的研究	
程研 謝欣彤.....	117
《經濟管理學刊》投稿須知.....	143
《經濟管理學刊》體例要求.....	144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簡介.....	封面三

澳門金融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 與構建“亞元”貨幣的推進路徑*

高勝文**

摘要：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具有政治制度、地理區位、歷史文化、政策支持、經濟金融及歸僑社團等優勢，這些優勢令其在“一帶一路”，特別是“一路”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經濟金融優勢尤為明顯。基於此，本文對澳門經濟金融現狀、特點及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中的障礙進行分析，並就澳門金融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與構建“亞元”貨幣，提出適切的推進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金融業的發展。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亞元；中元；澳門

一、前言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於澳門享有出口配額、關稅優惠以及在內地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再加上當時管治澳門的葡萄牙政局穩定，澳門經濟得以迅速增長，為澳門金融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

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中，港澳地區作為連接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樞紐，無疑將發揮重要作用。其中，在金融發展方面，澳門的作用不可忽視。回歸以來，澳門金融業已有長足發展，特別是長期以來與葡語和西語國家及“一帶一路”沿

*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基金會2023年學術項目資助計劃《資產證券化助力澳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實現高品質發展的最優機制設計研究》（項目申請編號：G01540-2212-543）的階段性成果。

** 高勝文，行政學博士、心理學碩士畢業、管理學學士，特聘教授，跨領域學者，現任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涉及人文社會科學多個領域。

線部分國家有密切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聯繫，凸顯了獨特的聯繫優勢。

¹長久以來，澳門金融業對外依賴程度高，對內以旅遊博彩業為主。隨着近年博彩收入連續下滑，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已成全社會共識。但金融中心近有香港、深圳，遠有上海、新加坡，發展金融業，必須要與香港、深圳等國際金融中心錯位發展。²基於此，本文對澳門經濟金融現狀、特點及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中的障礙進行分析，並就澳門金融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³與構建“亞元”⁴貨幣，提出適切的推進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金融業的發展。

二、澳門經濟金融現狀及特點

自澳門回歸以來，在賭權開放的帶動下，經濟由逐漸復甦轉向高速增長，以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金融業和建築地產業為四大經濟支柱。如表 1 所示，2017 年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是 2000 年的 8 倍多；除 2015 年外，同期變動率均為正數，平均增幅超過 13%；2007 年，澳門人均 GDP 首次超越香港，2010 年，澳門人均 GDP 達 51000 美元，位居亞洲第一，⁵2013 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 GDP 達 14 萬美元，超過排名第二的卡塔爾，排名世界第一。⁶在就業方面，澳門失業率持續下降，近年平均失業率低於 2%；在工業方面，受旅遊博彩業的影響，工

¹ 梁維特. 澳門金融業助力“一帶一路” [N].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6 年 3 月 17 日.

² 蘇寧. 澳門發展特色金融 風起正是揚帆時 [N]. 人民日報, 2017 年 2 月 23 日.

³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的前提條件是：要素市場一體化、通貨膨脹水平相若、穩定匯率、經濟發展水平一致及相似財政政策，如果能滿足以上五點，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的可能性就較大。

⁴ 亞元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歐元之父”的羅伯特·蒙代爾 (Roberta Mundell) 提出的一個貨幣構想。他在 2001 年的上海 APEC 會議期間預言：“未來 10 年，世界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 (亞元區)。在全球性貨幣缺少的情況下，亞洲或者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統一貨幣是大勢所趨。”他的這一論斷為亞元區的建立帶來了生機勃勃的希望。但是亞洲地區的經濟複雜性，使得亞元這一構想很難實現。

⁵ 袁持平，劉洋. 澳門與橫琴合作中的產業選擇 [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P180.

⁶ 彭琳. 全球人均 GDP 第一的地方原來在中國，引自 <http://finance.sina.com.cn/zl/international/20140716/072619717834.shtml>

業增加值總額在回歸後的十年呈現收縮的趨勢，近年保持平穩增長；在本地產品出口總額方面，因以第三產業為主，本地產品出口總額呈大幅度收縮，2017年本地產品出口總額約為2000年的十分之一；在對外貿易方面，對外商品貿易差額越來越大，進口額遠遠大於出口額，對外商品貿易從2001年開始，一直存在逆差。

表 1 2000—2017 年澳門經濟概況

年份	本地生產總值 (百萬澳門元)	同期變動率(%)	失業率(%)	第四季月收入中位數 (澳門元)	工業增加值總額 (千澳門元)	本地產品出口總額 (千澳門元)	對外商品貿易差額 (千澳門元)
2000	48,972	/	6.8	4,711	4,307,444	17,080.68	2,282.86
2001	54,718	1.4	6.4	4,627	3,855,980	15,127.89	-697.41
2002	58,826	7.5	6.3	4,746	3,752,291	14,773.90	-1,397.98
2003	65,734	11.7	6.0	4,818	3,834,417	16,261.02	-1,397.12
2004	84,920	29.2	4.9	5,603	3,930,009	17,322.80	-5,342.93
2005	96,872	14.1	4.1	5,845	3,923,865	14,362.98	-11,516.95
2006	118,338	22.2	3.8	7,371	4,409,498	14,372.88	-16,066.04
2007	147,382	24.5	3.2	7,926	3,979,191	13,515.70	-22,683.29
2008	167,760	13.8	3.0	8,500	3,587,744	9,582.34	-27,008.82
2009	171,467	2.2	3.5	9,000	3,110,275	2,971.10	-29,229.44
2010	225,051	31.3	2.8	9,000	3,031,231	2,389.79	-37,158.45
2011	294,347	30.8	2.6	10,300	3,147,511	2,390.24	-55,317.96
2012	343,818	16.8	2.0	12,000	3,519,266	2,284.97	-62,768.11
2013	411,865	19.8	1.8	12,300	3,699,463	2,009.19	-71,919.63
2014	442,070	7.3	1.7	14,000	4,152,480	2,022.75	-80,037.40
2015	362,213	-18.1	1.8	15,000	4,538,584	1,820.83	-73,971.18
2016	362,265	0.0	1.9	15,000	4,883,516	1,962.86	-61,305.02
2017	404,199	11.6	2.0	15,000	/	1,785.56	-64,567.96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年鑒》（2000—2017年）

在銀行體系和金融監管方面，澳門金融管理局（AMCM）是澳門金融機構的監管人，澳門的金融機構主要包括銀行、保險公司、金融公司、非銀行信用機構、金融中介公司、現金速遞公司、兌換店及兌換櫃台。目前，澳門共有28家銀行，其中10家為本地註冊（包括1家郵政儲金局）而另外18家為外地註冊。此外，尚有1家金融公司從事有限制之銀行業務、2家融資租賃公司及1家從事發行及

管理電子貨幣儲值卡業務的其他信用機構。尚包括 11 家兌換店，6 家兌換櫃台，2 家現金速遞公司，2 家金融中介人公司，2 家支付服務機構及 1 家其他金融機構之代表辦事處。另外，澳門保險業共有 24 家保險公司，當中 11 家為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餘的 13 家為非人壽保險公司。⁷



圖 1 2017 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市經濟規模對比圖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 <http://www.dsec.gov.mo>

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市比較而言，2017 年澳門是粵港澳大灣區各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最高的地方，達人民幣 622,803 元，但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各市生產總值中，澳門只有人民幣 4 041.99 億元，排在 11 個城市中的第 6 名(如圖 1 所示)；在對外商品貿易方面，澳門進出口貨值為 108.58 億美元，只排在 11 個城市中的第 10 名(如圖 2 所示)。

⁷ 澳門銀行業及保險業簡介，引自澳門金融管理局網頁 <http://www.amcm.gov.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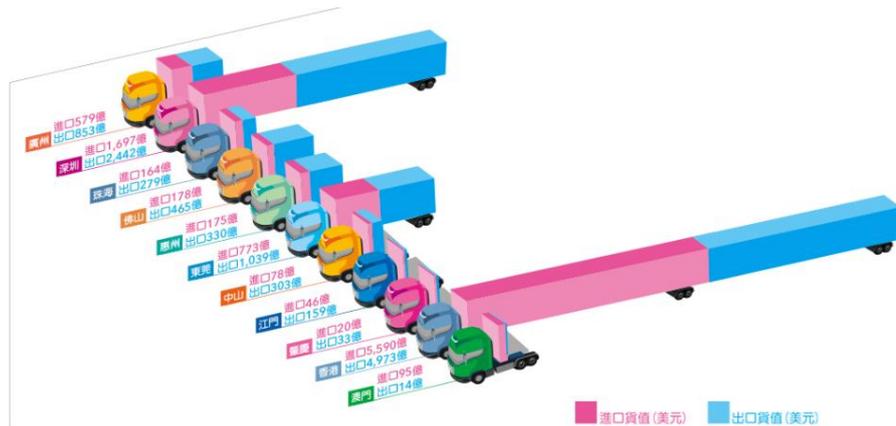


圖 2 2017 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市對外商品貿易對比圖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 <http://www.dsec.gov.mo>

不可否認，澳門具有自由港、低稅制、無外匯管制、政局穩定、銀行體系健全、有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制的優勢，⁸從上述經濟金融現狀分析來看，澳門雖然本地生產總值持續增長、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高、失業率持續下降，但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相比，澳門總體經濟規模不大，加上受旅遊博彩業的影響，工業在一定程度上被“擠出”，致使貿易逆差不斷拉大。

曾有學者從澳門的經濟發展歷史、澳門的經濟現況、澳門經濟的發展限制等多方面因素，歸納出澳門經濟金融的幾個特點：其一，澳門經濟受限於多種發展限制的共同影響，發展因而有所局限；其二，經濟發展欠多元，結構非常單一；其三，經濟發展波動極大，且波動不斷循環；其四，經濟集中於低技術生產，容易被其他競爭者替代。⁹ 因此，澳門需借助經濟金融優勢，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市錯位發展，以進一步發展澳門的經濟金融業。

三、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中的障礙

歷史上，粵港澳三地因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緣相通。多年來，為促進內

⁸ 袁持平，劉洋. 澳門與橫琴合作中的產業選擇[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P68.

⁹ 梁嘉豪. 新加坡促進經濟多元創新發展對澳門之啟示[J]. 澳門經濟 第四十三期. 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17：P66-67.

地¹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的共同繁榮與發展，加強雙方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聯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以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早於2003年10月18日，雙方決定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文簡稱CEPA），其後陸續簽訂多個補充協議。通過採取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措施。隨着2004年1月1日CEPA實施以來，澳門特區政府與內地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合作日益密切，進一步推動了兩地在金融領域的合作。

總括而言，澳門總體經濟規模不大，其金融體系只屬微型體系，但金融業卻是澳門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並且對促進區域合作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自2008年¹¹提出以來，形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格局，不僅在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方面存在衝突的地方，而且經濟制度也不一樣，這對粵港澳三地的融合發展造成一定的影響，其現存的問題主要包括：（1）“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問題、（2）缺少法定性聯盟機制、（3）要素流動受限、（4）資金往來受限及（5）產業合作不平衡等。¹²

在金融合作方面，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中的障礙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大灣區城市間合作意願不太積極。由於粵港澳三地分屬不同的政治體制、貨幣體系和法律制度，金融合作必然受到制度上的制約，導致銀行間業務合作意願明顯不足。現階段，金融互動合作基本上還是民間自發地對三地經貿投資發展做出反應，缺乏有超前意識的規劃、組織與協調。因此，金融合作雖然存在融資與貸款、金

¹⁰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內地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關稅領土。

¹¹ 在國家2008年12月發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中，提出粵港澳三地圍繞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展開積極探索。

¹² 國世平.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全球定位[M].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P120-129.

融市場、金融機構、涉外金融、貨幣流通等多方面的合作方式，但總體上仍處於“自覺需求反映型”，合作的層次不夠深入，仍停留在“要素互補”階段；二是金融合作缺乏制度性安排。儘管三地間的金融關係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越來越緊密，但由於缺乏政府的主導和組織協調，這種金融關係帶有很大的自發性和分散性。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機制和粵港、粵澳兩地金融管理部門間建立的金融合作聯絡機制因缺乏制度性的安排而難以發揮其推動作用。此外，三地金融業的合作缺乏協調，從而缺少金融合作的“龍頭”，而且正規金融機構未能發揮金融中介的主管道作用，造成資金體外迴圈，這種狀況不僅遠未適應大灣區金融合作關係向高層次提升的需要，還難以有效抑制地下金融活動。¹³

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進程

英國智庫 Z/Yen 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於 2017 年 9 月發佈了《第 22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22），從營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城市聲譽等方面對全球重要金融中心進行評分和排名。如表 2 所示，GFCI 22 共有 92 個金融中心進入榜單，其中全球前 20 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為：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東京、上海、多倫多、悉尼、蘇黎世、北京、法蘭克福、蒙特利爾、墨爾本、盧森堡、日內瓦、舊金山、溫哥華、迪拜、波士頓、深圳。

¹³ 楊少華.“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創新與合作研究—基於灣區金融競爭力評價指標分析[J]. 澳門經濟 第四十四期. 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18：P87.

表 2 第 22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綜合競爭力排名和得分（前 20 大金融中心）

中心	GFCI 22		GFCI 21		较上期变化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伦敦	1	780	1	782	0	▼2
纽约	2	756	2	780	0	▼24
香港	3	744	4	755	▲1	▼11
新加坡	4	742	3	760	▼1	▼18
东京	5	725	5	740	0	▼15
上海	6	711	13	715	▲7	▼4
多伦多	7	710	10	719	▲3	▼9
悉尼	8	707	8	721	0	▼14
苏黎世	9	704	11	718	▲2	▼14
北京	10	703	16	710	▲6	▼7
法兰克福	11	701	23	698	▲12	▲3
迪拜	12	691	25	696	▲1	▼16
蒙特利尔	13	697	14	713	▲7	▼6
墨尔本	14	696	21	702	▲3	▼13
卢森堡	15	695	18	708	▲4	▼10
日内瓦	16	694	20	704	▼11	▼31
旧金山	17	693	6	724	▼1	▼17
温哥华	18	692	17	709	▲13	▼5
波士顿	19	690	9	720	▼10	▼30
深圳	20	689	22	701	▲2	▼12

資料來源：《第 22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22）

報告顯示，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和東京仍是全球五大金融中心；倫敦受英國脫歐的影響正在減小，本期評分僅下降 2 分，而紐約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評分出現 24 分的大幅下降；香港在連續 3 期排名落後新加坡之後，本期逆轉反超，再次奪回全球金融中心前三甲的地位；¹⁴其中，中國內地有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青島、成都、大連七個城市進入榜單，香港重新回歸全球金融中心前三甲，並排名大中華地區金融中心首位（如表 3 所示）。

表 3 第 22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大中華地區金融中心排名情況

金融中心	大中華地區 排名	GFCI 22		较上期变化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香港	1	3	744	▲1	▼11
上海	2	6	711	▲7	▼4
北京	3	10	703	▲6	▼7
深圳	4	20	689	▲2	▼12
台北	5	27	677	▼1	▼12
廣州	6	32	668	▲5	▲18
青島	7	47	649	▼9	0
成都	8	86	604	-	-
大連	9	92	595	▼17	▼2

資料來源：《第 22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22）

¹⁴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香港超新加坡居第三位[N]. 香港文匯報，2017 年 9 月 12 日.

現時，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世界經濟版圖上的重要經濟形態，在人口規模及佔地面積均遠超世界三大灣區。物流運輸方面，大灣區優勢亦非常明顯，單計深圳、香港和廣州的港口貨櫃吞吐量，已是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三倍以上，機場旅客的輸送量亦高於紐約等三大灣區。從經濟規模看，大灣區的 GDP 高於三藩市灣區，緊隨紐約灣區及東京灣區之後。展望未來，大灣區立足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發展潛力不容忽視。而根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樂觀估計，到 2020 年，大灣區的 GDP 將基本追平東京灣區，到 2030 年，大灣區的 GDP 將達 4 萬 6,200 億美元，超過東京灣區(3 萬 2,400 億美元)和紐約灣區(2 萬 1,800 億美元)，成為世界 GDP 總量第一的灣區（如表 4 所示）。¹⁵

表 4 世界主要灣區指標的比較 (2016 年)

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	東京灣區	紐約灣區	三藩市灣區
人口(萬人)	6 774	4 396	2 015	768
面積 (萬平方公里)	5.6	3.65	2.15	1.79
GDP (萬億美元)	1.39	1.86 ⁽²⁾	1.68	0.78
人均 GDP (萬美元)	2.05	4.27 ⁽²⁾	8.22	10.17
集裝箱吞吐量 (萬個標準貨櫃 單位)	6 264.2 ⁽¹⁾	772.5	625.2	237
機場旅客量 (億人次)	1.86	1.17	1.3	0.76
第三產業比重	62.2%	82.3%	89.4%	82.8%
全球金融中心 指數 2017 排名	香港(3) 深圳(20) 廣州(32)	東京(5)	紐約(2)	三藩市(16)
特點	內地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區域之一，擁有龐大的港口群和機場群，是中國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	由人工規劃而成的灣區，聚集了全日本 1/3 人口，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群和國際金融中心。由於大批全球 500 強企業總部設於此地，故又被稱為“產業灣區”。	定位為“金融灣區”，是全球金融的核心中樞，匯集眾多銀行、證券、期貨、保險及外貿機構，全美最大的 500 家公司中 1/3 以上的總部均設於此。	定位為“科技灣區”，是全球高科技研發中心，矽谷的所在地，並擁有全美第二多的全球 500 強企業。

資料來源：2016 粵港澳大灣區概況[G]. 香港：香港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8：P11.
註：(1) 只包括深圳、香港及廣州數字。
(2) 2014 年數字。

¹⁵ 2016 粵港澳大灣區概況[G]. 香港：香港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8：P12.

另一方面，在香港桂強芳全球競爭力研究會及中外城市競爭力研究院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競爭力研究報告》顯示，在粵港澳大灣區 11 個城市中，香港以 93.13 分被評為 2018 年區內最具競爭力城市，深圳以 92.82 分排名第二，廣州以 91.51 分緊隨其後（如表 5 所示）。報告指出，香港在經濟、產業、金融、商貿等方面有獨特優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有核心作用。¹⁶因此，香港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核心，深圳、廣州及澳門可作為金融增長極，其他城市可作為金融支點，形成“一心三極多點”的金融格局，通過將粵港澳大灣區各市設為不同的金融級別及錯位發展，以克服金融合作中的障礙，逐漸縮小彼此之間的差距，長遠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

表 5 2018 粵港澳大灣區最具競爭力城市排行榜

排名	城市	總分
1	香港	93.13
2	深圳	92.82
3	廣州	91.51
4	澳門	88.62
5	佛山	86.43
6	東莞	86.24
7	珠海	84.68
8	中山	82.37
9	惠州	80.45
10	江門	78.99
11	肇慶	78.62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競爭力研究報告》

金融一體化是一個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發展過程，由最初是國際金融結算、匯兌業務的發展，逐漸發展為國際借貸資本順暢流動和金融市場的融合，較高級別則是發行統一貨幣，各國完全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¹⁷總括而言，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進程可借鑒歐盟的理論和經驗，由三地組建統一的金融機構、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及發行統一的貨幣（“中元”），逐步推進及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

¹⁶ 港競爭力冠大灣區城市[N]. 香港信報，2018年6月29日.

¹⁷ 袁持平，劉洋. 澳門與橫琴合作中的產業選擇[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P59.

五、澳門金融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與構建“亞元”貨幣的 推進路徑

若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後，可建立“中元”貨幣區，“中元”貨幣區的實現有利於提高中國整體競爭力、防範國際金融危機及成為構建“亞元”貨幣的突破口。澳門可憑借經濟金融優勢參與其中，並通過以下適切的推進路徑，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與構建“亞元”貨幣，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金融業的發展。

（一）發展創新金融及特色金融

近年來，澳門受到全球經濟復甦疲軟、中國內地經濟存在下行壓力等不利宏觀影響，遭遇到經濟深度調整和周邊地區相繼開放博彩業等不確定性因素的挑戰。同時，澳門對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央政府公佈一系列深化澳門平台作用的新舉措及惠澳措施，給澳門發展帶來了巨大政策紅利。因此，澳門應順應發展大勢，大力發展創新金融及特色金融，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金融新走廊。

1. 創新金融

在創新金融方面，隨着粵港、粵澳合作補充協定的簽訂、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推進以及《廣東省建設珠三角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的出台，粵港澳將會在跨境支付結算、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業務、金融監管等方面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在許多方面將會有創新之舉。¹⁸然而，中國內地、香港、澳門三地金融業務的開展及管理方式上也有較大的差異¹⁹，使創新金融出現困境。

¹⁸ 周盛盈. 粵港澳金融合作與創新法律保障之路徑選擇[J]. “一國兩制”研究 第28期. 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P171-176.

¹⁹ 粵港澳三地金融業務的開展及管理方式上存在：1. 政策及法律淵源不同、2. 金融業經營的方式不同、3. 金融監管模式不同及 4. 金融業發展程度不同等差異。

多年來，澳門財政儲備充裕，但回報率偏低。根據資料顯示，2016年財政儲備年度回報率為0.8%，而通脹為2.3%，扣除通脹後實際回報率為-1.5%；2015年回報率為0.7%，扣除通脹實際回報率仍是負數。²⁰有見及此，早於2015年，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昨披露，會將部分儲備透過廣東省政府與及國家開發銀行投資，以賺取更高回報。²¹截至2018年3月，特區財政儲備總額達5,148.9億澳門元，其中持有的人民幣資產約為921.9億澳門元。隨着財政儲備規模逐漸擴大，為優化財政儲備的資產多元配置，爭取提升中、長期回報，粵澳雙方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下，探索開拓兩地的創新金融合作。在內地監管部門容許的政策前提下，粵澳雙方經磋商後同意採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形式，在貫徹安全、有效、穩健的原則下，共同設立“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下文簡稱“粵澳基金”）。目前基金已完成註冊手續，即將進行首次注資並正式運作。基金設保本保息、退場、監管三項機制，以保障澳門財政儲備的投資保本增值。²²與此同時，為面對全球邁向數據化，澳門即將迎來新發展。特區政府與阿里巴巴集團已簽署《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充分利用阿里巴巴領先的雲計算、應用大數據等相關技術能力，促進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的步伐，長遠而言，將澳門發展成一個“以數字引領科技，智能服務民生”的智慧城市。²³

可以說，粵澳基金及智慧城市的建設，是區域合作及金融合作的新模式，其中的粵澳基金更是創新金融所取得的首個積極成果。筆者建議，在創新金融方

²⁰ 財儲回報低 投資宜設基準目標[N]. 澳門日報，2017年4月25日.

²¹ 澳門計劃調動千億儲備 部份交予廣東省政府投資[N]. 南方都市報，2015年5月31日.

²² 粵澳基金嚴謹監督保本增值，引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
<https://www.gov.mo/zh-hant/news/243849>

²³ 澳加速建智慧城市[N]. 澳門日報，2017年8月5日.

面，可參照粵澳基金的成功例子，鼓勵在金融業務、金融機構準入、金融市場、金融產品等方面進行創新，大力發展創新金融。

2. 特色金融

澳門勞動人口少、市場小，缺乏自然資源；但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在經濟方面擁有稅制簡單稅率低、自由港、資金進出自由等諸多優勢。這樣的資源稟賦條件尤其適合大力發展金融服務業。有學者通過實證及比較分析得出“作為離岸金融中心，澳門還沒有發揮出自己的比較優勢，特色金融仍處在起步階段”的結論。自《二〇一六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出“結合澳門優勢，發展特色金融產業”以來，政府、業界都對相關領域深入研究，並逐步獲得具有實踐意義的共識。特色金融重在“特”字，即發揮“特色優勢”、定位“特色行業”和服務“特色區域”。²⁴

當前，人民幣使用和接受程度大幅提高，2014年底全球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已達6.5萬億元，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澳門至去年底人民幣存款餘額達1,034億元，十年增幅超過千倍，是離岸人民幣存款第五大地區，²⁵這為構建離岸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澳門政府正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由此衍生形成鑒別、評估、抵押、銀行、保險、物流、租賃、維護保養、保安、巡展會展產業、文化藝術品加工產業等以文化為主的金融事業。

總括而言，澳門在發展特色金融的過程中，應發揮自身的優勢，結合中央對澳門的定位，以“融資租賃先行，財富管理和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跟進”，打造具有澳門特色的金融服務體系。²⁶重點關注粵港澳大灣區、葡語系國家、東

²⁴ 劉若川. 挑燈看劍：特色金融是經濟適度多元新舉措[N]. 澳門日報，2017年3月15日.

²⁵ 澳千億人民幣存款 離岸第五大[N]. 澳門日報，2015年5月13日.

²⁶ 中國華融：澳特色金融三步走[N]. 澳門日報，2017年12月20日.

盟國家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離岸金融、融資租賃、文化藝術金融、綠色金融以及財富資產管理等，並從加強金融人才培養、制定金融政策及法規、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積極發展特色金融。

（二）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

人民幣國際化²⁷是中國國家崛起、硬實力和軟實力剛柔相濟的重要標誌，也是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並保持經濟持續強盛的重要支柱和國家工具，是中國21世紀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²⁸事實上，人民幣已經開始承擔國際貨幣的功能，當前是全球第三大交易貨幣，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並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功能，即成為國際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擁有與美元及歐元並駕齊驅的地位。一是人民幣應該可以在境內和境外自由兌換成外幣，可以在境外銀行中開設人民幣帳戶，在境外使用以人民幣為基礎的信用卡和借記卡，在個別情況下還可以小規模地直接使用人民幣現金；二是在國際貿易合同中可以以人民幣為計價單位，而且不僅可用於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還可以在不涉及中國的國際貿易中作為買賣雙方都同意使用的計價貨幣；三是在國際貿易結算時可以採用人民幣作為支付貨幣，甚至在一些未採用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的國際貿易中，也可以經買賣雙方同意後採用人民幣支付；四是人民幣可以作為國際投資和融資的貨幣，這不僅包括人民幣可以用於實體經濟的投資、並購等活動，還包括人民幣可以用於虛擬經濟領域的各種金融資產及其衍生產品，例如股票、債券、票據、保單、保函、期貨、期權、遠期和互換；五是人民幣可以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僅可以

²⁷ 貨幣國際化的條件：具經濟規模、具完善的金融市場、具國際影響力、具使用慣性等。

²⁸ 人民幣國際化，引自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網頁
http://www.locpg.hk/zggq/2014-01/10/c_125984536.htm

作為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手段，而且應在特別提款權中佔有一定的比例。²⁹近年，隨着人民幣加入 SDR³⁰，以及國家相繼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大大促進了人民幣國際化。澳門也可通過以下的推進路徑，助力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

1. 推進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

自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貿易中以美元和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匯率都經歷了劇烈波動。同時，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放緩對貿易融資產生了較大衝擊。匯率的劇烈波動和貿易融資的萎縮，都對貿易需求產生不利影響。在美元和歐元匯率劇烈波動中，如使用幣值相對穩定的人民幣進行結算，可減少對美元和歐元結算的依賴，也可規避使用美元和歐元結算時產生的匯率風險。因此，推行人民幣結算可有利於穩定貿易需求。

伴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在港澳地區以及東南亞周邊國家的影響不斷擴大。2009 年 4 月 8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 5 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境外地域主要為港澳、東盟地區，此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快速增長。2010 年 6 月 19 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同時決定繼續擴大跨

²⁹ 成思危. 人民幣國際化之路[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P6-7.

³⁰ 2015 年 11 月 30 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董事會召開五年一度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貨幣籃子組成的審議工作，批准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將人民幣作為除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之外的第五種納入 SDR 的貨幣，新的貨幣籃子將於今（2016）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這是 IMF 首次將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貨幣納入 SDR 貨幣籃子。

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亦稱“紙黃金”（Paper Gold），最早發行於 1969 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會員國認繳的份額分配的，可用於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務、彌補會員國政府之間國際收支逆差的一種帳面資產。其價值目前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組成的一籃子儲備貨幣決定。會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的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因為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有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

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國內試點地區擴大到 20 個省市，試點業務範圍包括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境外地域擴大到所有國家和地區。³¹

2015 年澳門地區人民幣清算量達 1.57 萬億元，同比增 22.8%，全球排名第九。其中為葡語國家銀行辦理人民幣清算業務 76 億元，同比增長 15%，澳門推進中葡貿易人民幣結算平台步伐穩健，成效顯著。³²2016 年 3 月 7 日，在澳門銀行界積極配合、澳門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全力協助、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及珠海中心支行的多方支援下，有 28 家金融機構參與的澳門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正式投入運作，為銀行客戶的人民幣匯款及銀行間的人民幣資金匯劃提供即時結算服務。³³至 2016 年底，澳門與葡語國家銀行的人民幣清算量達到 138.94 億元。³⁴因此，澳門有條件打造為葡語國家人民幣結算平台，進一步推廣人民幣在葡語國家之間使用，這有利於雙方企業經貿往來時規避匯率風險，通過提高人民幣在葡語國家的接受程度，同時採取相應的措施方案，如：進一步解決境外人民幣回流的問題、對人民幣境外流通採取鼓勵和保護政策、放寬人民幣出入境限制及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等，以加速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

2. 加入亞投行，為沿線國家或地區提供資金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AIIB），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成立宗旨是為了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是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

³¹ 汪洋. 跨境貿易以人民幣結算：路徑選擇與風險[J]. 國際經濟評論 第 2 期.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2011：P108-118.

³² 去年澳人幣清算 1.57 萬億[N]. 澳門日報，2016 年 1 月 21 日.

³³ 澳人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投運[N]. 澳門日報，2016 年 3 月 8 日.

³⁴ 澳與葡語國人幣清算 138 億[N]. 澳門日報，2016 年 12 月 6 日.

機構，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 1000 億美元，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開業。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按大洲分，亞洲 34 國，歐洲 18 國，大洋洲 2 國，南美洲 1 國，非洲 2 國，總計 57 國，截至 2018 年 6 月底，隨着黎巴嫩的正式加入，亞投行成員國已達 87 個，成員從亞洲拓展至全球。

在兩年時間裏，亞投行交出的“成績單”涵蓋 24 個投資專案、42 億美元專案貸款總額，全部集中在亞非地區，涉及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印尼等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12 個成員；專案內容則涉及貧民窟改造、防洪、天然氣管道建設、高速公路與鄉村道路、寬頻網路、電力系統等方面，聚焦能源、交通、城市建設等基礎設施領域，幫助各成員開發高質量、低成本的基礎設施專案，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最大限度服務民生。³⁵

2017 年 3 月 23 日，亞投行在北京宣佈其理事會已批准 13 個新意向成員的加入，此次 13 個新增成員包括阿富汗、亞美尼亞、斐濟、中國香港和東帝汶、比利時、加拿大、埃塞俄比亞、匈牙利、愛爾蘭、秘魯、蘇丹和委內瑞拉。³⁶其中，香港的成功加入，對澳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澳門可嘗試申請加入亞投行，為沿線國家或地區提供資金，以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

（三）打造“中元”貨幣區，助力構建“亞元”貨幣

就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趨勢而言，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是有望實現的。但由於粵港澳三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短期內無法實現貨幣一體化，因此，通過以下的短中長期目標，打造“中元”貨幣區，助力構建“亞元”貨幣，更符合實際的發展需要。

1. 短期目標，建立自由貿易區

³⁵ 亞投行兩周年：中國誠意打動世界[N]. 新晨日報，2018 年 1 月 17 日.

³⁶ 亞投行再擴朋友圈[N]. 人民日報，2017 年 3 月 24 日.

現時，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在短期內無法實現，但由三地之間有着較為特殊的經濟聯繫，使其具備了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條件。自由貿易區建立後，一方面可增強大灣區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拉近通貨膨脹水平、維持穩定的匯率、實施相似的財政政策，使經濟發展水平趨向一致，為打造“中元”貨幣區奠定基礎。

2. 中期目標，發行統一的貨幣

當自由貿易區發展完善、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的前提條件達到後，三地可在適當情況下，組建統一的金融機構，協助處理相關的金融事務，並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及發行統一的貨幣——“中元”，逐漸以“中元”取代人民幣、港元及澳門元，使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高度一體化。

3. 長期目標，構建“亞元”貨幣

隨着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10+1”）自由貿易區和中日韓—東盟（“10+3”）自由貿易區等實體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亞洲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呼籲效仿“歐元區”而在亞洲建立一個“亞元區”的呼聲日趨高漲。當“中元”成為強勢貨幣後，必定吸引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入使用，將來可聯同其他自由貿易區共同組建“亞元區”並助力構建“亞元”貨幣，這將大大提高共同抵禦外部金融衝擊的能力，從而達到亞洲區域經濟繁榮穩定的目標。

六、總結

本文認為，澳門應進一步發揮和挖掘經濟金融優勢，通過發展創新金融及特色金融、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打造“中元”貨幣區等推進路徑，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及助力構建“亞元”貨幣，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金融業的發展。

Macau's financial industry boosts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and Construction of "Asian Dollar" Currency

KOU SENG MAN

Abstract: Macau occupie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hen it participat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 geographical loc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economy and finance, association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is leads to Macau be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considering the advantages of economy and finance. In this paper, some investig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s of Macau's economy and finance,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have been made. Besides, this paper addresses how to establish Asian dollar to develop Macau's financial industry.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Finance;
Asian dollar; China trade area dollar; Macau

數字化建設如何提升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

—基於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

周紅 李政興 李征 梁鈺潔*

摘要：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來臨，基於數字化與智慧化的創新已成為企業發展新的創新驅動力。對於國有平台企業而言，數字化建設能夠為企業可持續發展帶來新契機，如何利用數字賦能提升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是現階段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本研究基於 TOE 理論和數字化轉型視角，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為案例研究物件，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方法探究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驗證了平台數字化建設、平台開放度、平台領導力、創新政策支持均對企業績效有正向作用，發現了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存在轉型價值目標不清晰、企業創新能力不足、數字化技術服務生態不健全和缺乏複合型數位人才等問題。根據該企業存在的問題，提出國有平台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要加強頂層設計，提高數位治理能力；賦能企業數字化平台建設；建立內外聯動的數字化轉型模式以及提高全員數位意識和素養，培養複合型數字人才。

關鍵詞：數字化建設；國有平台型企業；企業績效；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一、引言

近年來，新興資訊技術和數位技術如大資料、互聯網等迅速發展，引發了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新產品和新形勢的出現，促使傳統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企業

* 周紅，天津師範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李政興，天津師範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李征，天津師範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梁鈺潔，天津師範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

通過數位技術能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推動技術創新，最終實現提升企業生產效率的目的，數位技術與傳統產業的結合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新動力。在國家相關政策的驅動下，企業逐漸將數位技術作為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手段。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企業深入瞭解自身戰略和未來發展趨勢，是提升企業競爭力、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必然選擇。國有平台企業大多分佈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優化資源配置、統籌市場管理、提升機制活力方面價值顯著。但是隨著國有平台企業的不斷發展，企業績效並沒有實現大幅度增長。平台公司數字化、市場化轉型成為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基於數字化轉型背景來研究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不僅能夠推動新一代資訊技術與國有平台型企業的融合創新，加速傳統產業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數字化轉型，更有利於發揮國有平台型企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建設發展中的示範引領作用，從而實現高品質發展。

在國企改革、產能優化和國際形勢變動的大局勢下，國有平台企業對數字化變革的需求比其他企業更加強烈。企業在其運營過程中引入數字化技術能夠顯著提升其資源配置效率，延長價值鏈末端配置鏈條，從而在各個方面提升企業績效。那麼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哪些因素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具體哪個因素發揮著關鍵作用？以及在國有平台型企業進行持續的數字化建設過程中，國有平台型企業如何才能更好的提升其企業績效？

本研究基於 TOE 理論從技術層面、組織層面與環境層面探究數字化技術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協同影響，具有一定的理論貢獻。理論貢獻有以下 2 點。

① 以往的研究探討側重技術、組織或環境因素的某個條件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單一效應，本研究使用 SEM 方法研究技術層面、組織層面和環境層面 3 個不

同維度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驅動作用，驗證了數字化技術在個案中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完善了數位技術影響國有平台企業績效的路徑研究體系，為國有平台型企業更快更好的提升企業績效提供了新的方向。②立足數字化情境，剖析數字化技術如何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將數字化技術作為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條件之一進行研究，豐富了數字化技術與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關係的研究。

二、案例簡介

（一）案例選擇

本研究探索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驅動因素以及如何提升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作為研究物件，進行深入的單案例研究。案例研究適用於處理多因素影響的複雜結構，重點關注“是什麼”和“為什麼”。由於驅動國有企業轉型的因素十分廣泛，涉及企業內部與外部因素，且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驅動因素是實驗性的，而單個案例研究同樣適用於獨特的、初步的或試驗性的案例，因此本研究方法的選用是合適的。本研究選取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作為分析物件，主要基於以下三個原因：第一，本次選取的企業屬於典型的國有平台型企業，符合當前研究情境和調研問題；第二，所選的案例在平台數字化建設、平台開放性、創新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便於對前期歸納出的企業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對比分析，揭示影響路徑中的因果聯繫；第三，個案研究需要豐富的資訊和大量的資料作為支撐資料，所以資料的可獲取性十分關鍵。該公司允許實地考察，有助於獲取一手資料。

（二）企業簡介

天保控股有限公司是濱海新區管理的市屬國有企業集團，是天津保稅區投資融資、開發建設、運行養管、招商引資的平台。在積極為區域發展作貢獻的同時，公司持續加快推動市場化轉型發展，聚焦於四大主業板塊，即區域開發建設、基礎設施運營服務、商貿物流、金融與優質股權投資，形成“多業並舉、競相發展”的產業發展格局，發揮平台作用、服務區域發展、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持續增強。公司緊緊依靠天津港保稅區獨特的區位、政策、產業、人才等多重優勢，積極融入區域產業發展，不斷壯大自身實力。天津港保稅區是我國北方規模最大的保稅區，規劃管理面積 223.2 平方公里，已形成“三區兩港”空間佈局（空港經濟區、海港保稅區、臨港經濟區，天津港、濱海國際機場口岸資源），擁有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先行先試政策，區域功能形態在我國最為完善。天保控股深深植根于保稅區這片沃土，“十四五”期間，堅持深耕區域、開拓創新，以“融入發展、創造價值”為使命，以多種方式融入區域產業和駐區優質企業的發展，共用發展成果，實現價值創造。公司將致力於成為“區域開發商、價值投資商、產業服務商”，“區域開發商”“就是要為區域產業發展提供包括園區、地產、基礎設施等在內的硬體支撐，“產業服務商”就是要為區域產業和企業提供金融、物流、能源、人力資源等集成高效的軟體支援，“價值投資商”就是要適時跟投優質產業和重點項目，實現“與強者同行”借勢發展，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未來，該公司將更加緊密地與區域新興產業、主導產業深度融合，壯大形成區域開發、產業服務、金融投資、科技創新等新的四大產業板塊。

三、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一）文獻綜述

隨著數位技術的不斷更新，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國有平台型企業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正在積極轉型升級，逐漸擴大其數字化領域，以適應市場的變化和挑戰¹。目前國內外學者關於數字化背景下企業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來自企業的內部因素和其面臨的外部因素。在數字經濟時代下，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能夠加速企業與外部的資訊交換，獲得客戶的回饋資料，提高企業管理層的決策效率，進而促使企業提高和保持核心競爭力²。平台開放程度對於數位平台的架構和治理至關重要，數位平台通過兩種方式實現開放，即訪問開放和資源開放³，並且這種開放有助於促進創新和價值創造。隨著開放程度的提高，企業能夠從外部創新主體獲取更豐富的創新資源，尤其是在開放式創新模式下，企業需要從外部環境中獲取創新所需要的資源，掌握大量異質性資源和能力，以達到降低成本並增加收益的目的⁴。平台的數字化建設會影響平台的開放度與平台自身能力，具體而言數字化技術具備增強平台型企業的能力。它可以在生態系統中合理配置參與主體資源、並協調主體利益關係，即平台領導力，國有平台型企業在此基礎上可以統籌融合更多的內外部資源，進而提高平台開放度，而平台開放度與平台企業能夠利用外部資源的數量與品質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這種相關關係使得內外部資源能夠被高效整合與利用並形成良性迴圈。同時，在平台企業構建的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中，平台開放度的合理設置也會影響平台企業的生存、發展品質及創新績效

¹ 劉蘋. 數字經濟影響民營企業韌性的空間效應研究[J]. 工業技術經濟, 2022, 41(12):20-7.

² 張遠, 王愛強. TOE 理論框架下的企業創新績效組態路徑[J/OL]. 財會月刊:1-9[2023-10-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90.F.20231016.1409.010.html>

³ KARHU K, GUSTAFSSON R, LYYTINEN K. Exploiting and defending open digital platforms with boundary resources:Android's five platform forks[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8, 29(2):479-497.

⁴ 張鎰. 互補性資產、平台領導力與雙元創新的關係研究[D]. 暨南大學, 2021. DOI:10.27167/d.cnki.gjnu.2019.001416.

⁵。除此之外，作為國有平台型企業，其與政府溝通密切，是政府與社會溝通的橋樑，政府的創新政策支持有助於降低企業在創新活動中的風險，提高企業積極參與創新的意願，並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這些能力與不穩定的外部環境相匹配，促進企業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增長⁶。姚維保等⁷利用中國上市醫藥企業的面板資料進行研究，發現研發稅收優惠的支援總體上有助於促進企業的經濟績效和創新績效。Tornatizky 等⁸提出 TOE 理論框架，該理論框架從技術、組織、環境 3 個層次系統地構建了影響企業(組織)技術創新的因素，具備系統性和靈活性。TOE 框架理論為研究問題搭建了系統框架，從整體角度探究企業面臨內外部因素對其新技術應用的影響。該理論框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推廣和拓展，目前被廣泛應用於高品質發展、綠色創新、數字化發展等研究中⁹。

基於上述分析，本研究基於 TOE 框架理論，從技術、組織和環境 3 個層面探討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驅動的影響因素，將技術與組織層面作為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發展的內部因素，環境層面作為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因素，技術層面引入平台數字化建設，組織層面引入平台型企業開放度以及平台領導力，環境層面引入創新政策支持，從而探究 TOE 三層面不同要素對

⁵ BOUDREAU K. Open platform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 granting access vs. devolving control[J]. *Management Science*, 2010, 56(10):1849-1872.

⁶ 張林雪. 創新政策支持、企業創新戰略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D]. 東南大學, 2022. DOI:10.27014/d.cnki.gdnau.2021.002397.

⁷ 姚維保, 張翼飛. 研發稅收優惠必然提升企業績效嗎?——基於上市醫藥企業面板資料的實證研究[J]. *稅務研究*, 2020(07):95-101.

⁸ TORNATZKYL G, FLEISCHER M, CHAKRABARTI A K.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vation*],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90.

⁹ 孫佩紅, 劉凱月. 戰略性新興企業高品質發展組態研究:基於 TOE 拓展框架的 fsQCA 分析[J] *西部論壇*, 2022, 32(5):12-25.

國有平台型企業經濟績效、創新績效的影響，系統分析平台數字化建設、平台領導力、平台開放度以及創新政策支持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驅動作用。

1. 數字化平台建設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影響

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不少企業都寄望於通過數字化技術獲得企業經營突破和效益提升。數位技術是融入或融合於通信技術的服務或產品，擁有可編輯性、可擴展性、開放性和關聯性等特點¹⁰。NAMBISAN S 等¹¹強調數字化技術的應用重新塑造了產品與服務的供給和生產模式，提高了社會的資源配置以及使用效率，不僅能夠為生產者帶來績效和能力的顯著提升，還可以在更深層次引發企業關於價值創造邏輯的突破性變革。同時數位技術應用能夠有效控制企業獲取資訊的成本、降低中間消耗等，進而提高企業整體全要素生產效率¹²。根據張毅等¹³的研究發現數位平台能夠說明製造企業構建綠色價值供應鏈，在採購和運輸等領域實現資源的綠色傳送和效率提升，從而增強製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並改進企業績效。此外，張善亮等¹⁴從數位技術賦能視角出發，認為數位技術可以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賦能企業，使組織結構扁平化，最大限度地發揮員工潛能，從而推動中小企業提高經營效率，提升企業績效水準。

鑒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1：平台數字化建設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存在正向影響。

¹⁰ 王海花, 杜梅. 數位技術、員工參與與企業創新績效[J]. 研究與發展管理, 2021, 33(01):138-148. DOI:10.13581/j.cnki.rdm.20200757.

¹¹ NAMBISAN S, LYTTINEN K, MAJCHRZAKA.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J]. MIS Quarterly, 2017, 41(1):223-237.

¹² 郭金花, 郭椽楠, 郭淑芬.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基於“寬頻中國”戰略的准自然實驗[J]. 證券市場導報, 2021(06):13-23.

¹³ 張毅, 郭宇. 打造一站式數字化平台構建國際化綠色供應鏈[J]. 國際工程與勞務, 2020(11):19-21.

¹⁴ 張善亮, 惠朋, 李擘. 數位技術與中小製造企業績效: 資訊共用的仲介作用[J]. 科學與管理, 2023, 43(03):21-30.

2. 平台開放度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影響

WEST¹⁵將平台開放度定義為企業在創新過程中,向其他企業分享技術知識、資訊和資源的程度。從開放資源的角度來看,平台的開放程度可以從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進行評估。廣度反映了平台開放資源的數量範圍,而深度則代表了這些開放資源對開發者的可利用程度¹⁶。韻江等¹⁷認為提升開放廣度水準有利於增強企業的網路戰略能力,從而促進創新績效的提高;而增加開放深度則有利於提升企業的網路關係能力,進而推動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Parker 等¹⁸指出,平台開放度是一種機制,可以推動互補者進行創新並獲取企業競爭優勢,平台的開放程度與外部創新資源的數量與品質密切相關,這直接影響著平台企業能否通過這些創新要素開展創新活動¹⁹。此外,平台的開放度也會影響平台企業在創新過程中選擇何種創新方式,進而影響其獲得企業競爭優勢的能力²⁰。企業進行外向型開放或者合作開放有利於將專利轉化為企業的財務績效。然而,陳鈺芬和陳勁²¹研究了我國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外部組織的開放程度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係,並

¹⁵ WEST J. How open is open enough? Melding proprietary and open source platform strategies[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7):1259-1285.

¹⁶ 孫耀吾, 王雅蘭. 高技術服務創新網路主導企業最優平台開放度選擇研究[J]. *研究與發展管理*, 2016, 28(06):19-26. DOI:10.13581/j.cnki.rdm.20161021.004.

¹⁷ 韻江, 馬文甲, 陳麗. 開放度與網路能力對創新績效的交互影響研究[D]. *科研管理*. 2012, 33(7): 8-15.

¹⁸ PARKER G, VANALSTYNE M. Innovation, openness, and platform control [J].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64(7): 3015- 3032.

¹⁹ LAURSEN K, SALTER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 (2) : 131-150.

²⁰ Oliver Alexy, et al. Surrendering control to gain advantage: Reconciling openness and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 (6).

²¹ 陳鈺芬, 陳勁. 開放度對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J]. *科學學研究*, 2008(02):419-426. 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08.02.022.

指出開放度有利於提高創新績效，但不同產業企業的開放程度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有所差異。

鑒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2：平台開放度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存在正向影響。

3. 平台領導力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影響

Gawer²²是首次提出平台領導力（Platform Leadership）概念的學者，她從互補角度闡述了平台領導力是指平台企業通過與大量協力廠商企業合作，影響其他互補企業進行產品開發的能力。張鎰等²³認為平台領導力是推動平台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關鍵能力之一，他們的研究表明，在平台企業進行雙元創新過程中，平台領導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平台領導力影響著平台企業的平台規劃戰略，決定其對外開放的力度，並對其進行何種類型的創新活動產生重大影響。領導力越強大，對於推動平台企業發揮創新作用更有利，進而有助於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並且平台領導力和聲譽的提升也密切相關，二者相互作用推動了平台型企業可持續性提升²⁴。謝騫²⁵發現平台領導力在平台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作用中起到了仲介效應。平台型企業可以通過發揮自身優勢，增強平台對消費者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來吸引消費者，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從而達到提高企業績效的目的。此外，郝斌等²⁶指出隨著企業網路能力的增強，其

²² Gawer A. The Organization of Platform Leadership: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Intel's Management Processes Aimed at Fostering Complementary Innovation by Third Parties[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²³ 張鎰，劉人懷，陳海權. 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平台領導力影響因素——基於紮根理論的探索性研究[J]. 南開管理評論, 2020, 23(03):28-38+131.

²⁴ Jianxin Ge, and Tong Li.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Platform Sustainability[J]. Sustainability, 2019, 11(16).

²⁵ 謝騫. 平台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研究[D].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2023. DOI:10.27075/d.cnki.ghzdc.2022.000316.

²⁶ 郝斌，任浩. 企業間領導力：一種理解聯盟企業行為與戰略的新視角[J]. 中國工業經濟. 201

在聯盟中取得領導地位的機會將增加，核心企業的領導力越強，越有助於促進企業間關係的協調，並進而提高網路績效。

鑒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平台領導力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存在正向影響。

4. 創新政策支持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影響

企業創新能力方面的研究是政府補貼政策的熱點研究問題之一，關於政府對企業創新活動提供政策支持的相關研究，其結論基本分為兩種——存在擠入效應（正向促進作用）或存在擠出效應，即抑制企業發展²⁷。田志龍等²⁸通過分析武漢市東湖高新區創新政策文本發現，創新政策的支持和政策體系是通過競爭性政策過程來實現的，而不是單一的直接政府補貼，這種競爭性政策過程激發了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對政策資源的競爭，從而推動了企業創新和產業的發展。政府對企業的補貼力度不僅影響製造業企業加入平台的積極性，也影響協力廠商開發商與平台之間的合作²⁹。顧夏銘等³⁰驗證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活動之間存在顯著的激勵效應和選擇效應，但不確定性經濟政策的增加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抑制企業的資本投資活動。然而，政府補貼支持在管理效率的創新激勵效應中具備明顯的門檻效應，當政府補貼不斷增加並超過一定界線時，企業管理效率對技術創新的不利影響能夠被明顯改善³¹。也有研究發現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的

1(3):109-118.

²⁷ 尹若清, 申王儀佳, 馬藝軒. 新能源汽車政府補貼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基於文獻綜述的視角[J]. 物流工程與管理, 2022, 44(06):125-128.

²⁸ 田志龍, 陳麗玲, 顧佳林. 我國政府創新政策的內涵與作用機制: 基於政策文本的內容分析[J]. 中國軟科.

²⁹ 周曉陽, 陳可欣, 溫浩宇等. 政府補貼下考慮零售商不同競爭行為的閉環供應鏈決策及合同選擇[J]. 中國管理科學, 2022, 30(03):176-188. DOI: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20.0231.

³⁰ 顧夏銘, 陳勇民, 潘士遠.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創新——基於我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J]. 經濟研究, 2018, 53(02):109-123.

³¹ 曾卓然, 韓仁傑, 任躍文. 企業管理效率、政府補貼與技術創新[J]. 統計與決策, 2021, 37(02):1

完善程度,會影響到中國政府實施的創新補貼政策對企業研發創新的作用³²。因此,不同的技術創新激勵政策,作用效果截然不同,需要考察到技術創新激勵政策的內部異質性³³。

鑒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4: 創新政策支持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存在正向影響。

綜合已有研究可以得出,現有文獻大多針對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發展的某一項潛在的內部或外部因素進行實證檢驗,缺乏從整體角度將企業內部組織因素與其面臨的外部環境因素結合起來探討如何驅動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發展。因此本研究使用 SEM 方法,旨在發現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高經濟績效和高創新績效的關鍵因素,解決上述問題,豐富現有理論研究,並為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發展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支援。

(二) 理論框架

根據上述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影響因素分析,本研究借鑒 Tornatizky&Fleischer 提出的 TOE 框架³⁴,從技術、組織、環境 3 個方面構建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理論模型。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平台數字化建設、平台開放度、平台領導力,創新政策支持進行實證研究,分析平台數字化建設、平台開放度、平台領導力,創新政策支持如何協同聯動,共同提

81-184. DOI:10.13546/j.cnki.tjyj.2021.02.039.

³² 張傑,陳志遠,楊連星等. 中國創新補貼政策的績效評估:理論與證據[J]. 經濟研究, 2015, 50(10):4-17+33.

³³ 陳強遠,林思彤,張醒. 中國技術創新激勵政策:激勵了數量還是品質[J]. 中國工業經濟, 2020(04):79-96.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0.04.004.

³⁴ 李雷,楊水利,陳娜. 數字化轉型的前因組態與績效研究——來自中國製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23, 40(16):32-41.

升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本研究將結果變數企業績效細分為兩個指標：經濟績效與創新績效。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理論框架如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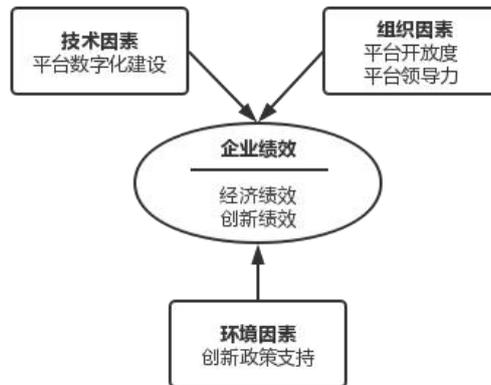


圖 1 TOE 框架下數字化技術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驅動模型

四、案例分析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採用了文獻研究法、問卷調查法。首先通過閱讀相關文獻瞭解已有學者關於影響企業績效因素的相關研究成果，其次，通過實地調研與問卷調查的方法瞭解天保控股有限公司數字化轉型的現狀和獲取相關資料，最後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驗證本文所述提出的假設，為本文的結論提供實證支援。

1. 文獻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方法指學術研究者通過科學的搜集、鑒定、總結、整理、歸納等多個方面的研究，獲取相關文獻課題的一種方法。本研究通過整理、歸納國內外對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進行研究的相關文獻資料的研究成果，基於 TOE 理論對對研究變數進行了闡述，並提出了相應的研究假設。

2. 問卷調查分析法

問卷調查分析法是一種被廣泛採用的社會調查技術和手段，在控制測量和度量資料的同時，分析和收集可靠性資料。本研究製作了相關調查問卷，並通過對公司人事經理的訪談，修改了部分問卷內容。

3. 結構方程模型方法

結構方程模型是定量研究中的一項核心統計方法，包括因數分析和線性回歸分析等，可用於模型辨識、估計和驗證等各類因果模型。本研究根據收集到的資料和資料，設計出相應的內潛變數和外潛變數，並利用 SPSS 24.0 和 AMOSS 24.0 統計軟體，進行了一系列信度和效度分析以及路徑分析，驗證了研究假設，並為結論提供了實證支援。

(二) 問卷設計

本研究對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中高層管理者及技術人員發放問卷，基於 TOE 模型和文獻梳理，提煉的變數名稱以及問題題項描述如表 1 所示。為保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使用的量表盡可能改編已有文獻的成熟量表。變數指標的測量採用李克特 5 級量表，從平台數字化建設、平台開放度、平台領導力、創新政策支持和企業績效（包括經濟和創新績效）五個方面對調研對象進行企業評估，基於 1 到 5 的打分標準表示從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這種研究方法在管理學中已被廣泛應用於相關變數的關係研究，並取得良好效果。

表 1 變數量表設計

變數名稱	指標	參考文獻
平台數字化建設	與同行相比，本企業擁有更多數字化相關專利 本企業引進一些可以改善工藝或作業流程的新型數字化技術 依靠數字化技術，本企業努力提高已有技術在多個相關業務領域的適用性 本企業經常對已有數字化技術進行改良，以適應當前需要	楊慧琳、張力（2020）、何帆、劉紅霞（2019）

平台開放度	平台組織是扁平化的	Parker(2018)、吳義爽等(2021)
	公司與外部企業建立了合作關係	
	公司與外部企業合作的業務範圍比較廣	
	公司與外部企業合作時涉及到的資源種類多	
	公司與外部企業的交流更為頻繁	
	公司會採取多種方式與外部企業進行交流	
平台領導力	公司經常與多個外部企業合作	陳海權(2020)、張溢等(2020)
	公司調整戰略時，消費者和合作夥伴會追隨我們企業	
	公司能協調合作關係中其他企業的分工或生產任務	
	公司影響其他平台使用者企業的生產或服務行為	
	公司影響其他合作成員之間的合作或對話模式	
	政府設立創新專案專項資金為本企業提供資金補助	
創新政策支持	政府為本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周曉陽等(2022)、曾卓然等(2021)
	政府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支援本企業技術創新、加大對技術創新產品的金融支持、鼓勵和引導擔保機構	
	政府對本企業參與行業技術標準制定發生費用，給予一定比例的資助，建立健全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加大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執法力度	
	政府鼓勵科研機構、高等學校的科技人員兼職、掛職、參與項目合作等形式從事產學研合作等政策	
	政府扶持本企業的技術研發以及鼓勵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創新技術等政策	
	政府為本企業創新提供培育發展載體	
創新績效	與其他企業相比，公司新產品產值占銷售總額比重增加	周亞虹等(2012)、李四海等(2014)
	與其他企業相比，公司新產品的開發速度更快	
	與其他企業相比，公司創新產品的成功率高	
經濟績效	企業的市場份額增長率逐年上升	朱建明等(2015)、李麗娜(2011)
	產品的總體市場競爭力高於同行業主要競爭對手	

(三) 資料收集

為探索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企業績效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在設計正式問卷之前先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高管人員進行訪談，與受訪者進行持續的早期溝通進而來修改完善問卷。本研究採用線上問卷調查平台“問卷星”製作

並發放了電子問卷，調查物件為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高管人員。問卷星是國內一家領先的專業線上問卷調查、測評和投票平台，被廣泛應用於各類學術研究領域。本研究共發放問卷 210 份，回收 208 份。經過資料品質剔除無效回答的問卷後，保留了 205 份，回收率達到了 99%，有效回收率為 97.62%，符合學術研究的傳統標準。通過分析各題項因素負荷量，本研究發現每個變數所含題項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問卷設計合理，無需增刪題項。

五、實證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與正態性檢驗

以下表 2 為本次研究所測量指標描述統計分析和正態性檢驗結果。根據描述統計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各個變數的均值得分均在 3-4 分之間，量表計分方式為 1-5 正向計分，因此可以看出本次研究各個變數之間的影响水準在中等水準以上。

各個測量題項的正態性檢驗採用偏度和峰度進行檢驗，根據 Kline³⁵提出的標準認為，偏度係數絕對值在 3 以內，峰度係數絕對值在 8 以內，則可以認為資料滿足近似正態分佈的要求。根據表 2 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本次研究中各個測量題項的偏度和峰度係數絕對值均在標準範圍內，因此可以說明各個測量題項資料均滿足近似正態分佈，達到了結構方程模型資料分析的要求。

³⁵ Kline N J ,Hunninghake M G ,He B , et al. Synergistic Activation of The Human Cytomegalovirus Major Immediate Early Promoter by Prostaglandin E2 and Cytokines[J]. Experimental Lung Research, 1998, 24(1).

表 2 各個維度描述統計及測量題項正態性檢驗結果

維度	測量 題項	平均 值	標準 差	方差	偏度	峰度	總體 均值	總體標準差
平台數字化建設	A1	3.06	1.16	1.34	-0.09	-0.65	3.27	1.03
	A2	3.23	1.13	1.27	-0.13	-0.72		
	A3	3.36	1.12	1.26	-0.37	-0.57		
	A4	3.45	1.08	1.16	-0.49	-0.23		
平台開放度	B1	3.53	1.01	1.01	-0.50	0.14	3.67	0.90
	B2	3.74	1.02	1.04	-0.68	0.12		
	B3	3.71	1.02	1.05	-0.52	-0.23		
	B4	3.63	0.98	0.97	-0.43	-0.12		
	B5	3.68	0.98	0.95	-0.37	-0.26		
	B6	3.72	0.91	0.82	-0.44	0.24		
	B7	3.72	0.95	0.91	-0.45	-0.07		
平台領導力	C1	3.36	1.07	1.15	-0.33	-0.36	3.36	1.00
	C2	3.35	1.09	1.19	-0.33	-0.37		
	C3	3.38	1.06	1.12	-0.29	-0.46		
	C4	3.34	1.05	1.11	-0.23	-0.33		
創新政策支持	F1	3.21	1.09	1.18	-0.29	-0.34	3.29	0.96
	F2	3.28	1.07	1.15	-0.33	-0.30		
	F3	3.35	1.05	1.10	-0.36	-0.08		
	F4	3.3	1.04	1.09	-0.38	0.07		
	F5	3.34	0.99	0.99	-0.28	0.07		
	F6	3.26	1.00	1.00	-0.19	-0.09		
	F7	3.26	1.01	1.01	-0.27	0.11		
創新績效	Y1	3.32	1.03	1.06	-0.43	0.09	3.24	1.02
	Y2	3.23	1.04	1.07	-0.26	-0.24		
	Y3	3.16	1.09	1.19	-0.29	-0.30		
經濟績效	Z1	3.5	1.00	1.00	-0.52	0.12	3.40	0.97
	Z2	3.36	1.01	1.02	-0.47	0.04		

(二) 信度和效度檢驗

1. 信度檢驗

信度檢驗是對量表的可靠性進行評估，它衡量了在採用相同方法對同一物件進行重複測量時所得結果的一致性程度。本次檢驗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和組成信度 CR 測量資料的一致性和穩定性，並使用 SPSS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各潛在變數的 Cronbach's α 係數和組成信度均大於 0.7，在 0.01 水準上顯著，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

2.效度檢驗

效度即有效性，是指測量工具正確地衡量其所要測量特徵的程度。效度越高表示測量結果越能準確顯示其所要測量的特徵，效度越低則相反。在效度檢驗方面，通過對測量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資料分析，發現各個潛變數的觀測變數因數載荷均超過 0.6，並且達到了顯著性水準，說明潛變數都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此外，其他潛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均小於 AVE 平方根，表明各個潛變數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本研究中樣本資料的信度和效度均通過了檢驗，符合進行下一步研究的條件。

(三) 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 AMOSS 24.0 對問卷資料進行結構方程模型擬合。擬合指標及標準結果詳見表 3。卡方比自由度的比值為 3.086,小於 5，說明模型適配合理；RMSEA 的值為 0.04，小於 0.05；NFI、TLI、CFI、GFI、RFI、IFI 的值也都在 0.9 以上，各項指標均達到了理想值，可以看出模型擬合的結果良好，不需要進行修正。

表 3 模型擬合度檢驗結果

統計檢驗指標	標準	模型	擬合度
CMIN/DF	<5(合理) <3(良好)	3.086	合理
SRMR	<0.05	0.92	良好
GFI	>0.9	0.95	良好
NFI	>0.9	0.96	良好
RFI	>0.9	0.93	良好
IFI	>0.9	0.94	良好
TLI	>0.9	0.97	良好
CFI	>0.9	0.93	良好
RMSEA	<0.08(合理) <0.05(良好)	0.04	良好

表 4 假設檢驗結果

路徑分析		Estimate	S. E.	C. R.	P
平台數 字化建 設	<--> 平台開放度	0.696	0.093	6.504	***
平台數 字化建 設	<--> 平台領導力	0.706	0.105	6.683	***
平台數 字化建 設	<--> 創新政策支持	0.737	0.101	6.814	***
企業績 效	<--> 平台數字化建設	0.846	0.105	7.151	***
平台開 放度	<--> 平台領導力	0.710	0.095	6.811	***
平台開 放度	<--> 創新政策支持	0.711	0.089	6.774	***
企業績 效	<--> 平台開放度	0.607	0.090	6.757	***
平台領 導力	<--> 創新政策支持	0.827	0.107	7.537	***
企業績 效	<--> 平台領導力	0.788	0.107	7.381	***
企業績 效	<--> 創新政策支持	0.838	0.100	7.348	***

注:***表示影響因素在 0.001 水準 (雙側) 上顯著 ($p < 0.001$)

本研究基於 AMOS22 路徑分析來驗證研究假設，分析各影響因素路徑的係數、標準誤差 (S.E)、臨界比 (C.R) 和 P 值，結果匯總於表 4。平台數字化建設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的路徑係數為 0.846，平台開放度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的路徑係數為 0.607，平台領導力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的路徑係數為 0.788，創新政策支持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的路徑係數為 0.838。這說明平台數字化建設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影響最大，其次是創新政策支持，接下來是平台領導力，最後是平台開放度。結果顯示：平台數字化建設、平台開放度、平

台領導力、創新政策支持對天保控股公司績效在 0.001 的水準上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說明假設 1 到假設 5 均通過檢驗。

此外，本研究基於前期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實地調研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存在以下問題。

(四) 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存在的問題與原因分析

1. 存在的問題

(1) 轉型價值目標不清晰，績效提升不明顯。國有平台企業績效是我國經濟發展核心競爭力的體現，肩負著強國建設的重大使命，數字化轉型的價值效益不僅表現在生產運營的優化，還體現在產品服務的創新和新賽道的佈局。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在制定數字化轉型的戰略定位和目標時主要面臨兩個問題。首先，戰略地位不明顯，企業沒有將數字化轉型作為核心內容來推動企業發展戰略；其次，前瞻性佈局缺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點放在提高業務規範性和運行效率上，而沒有充分關注產品和服務創新、培育數位業務以及打造數字化企業的方面。企業的數字化發展戰略與經營業務沒有實現高度融合，企業發展戰略對數字化發展方向的指導作用低下，導致現有的數字業務無法有效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2) 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在國有平台企業數字化轉型和雙迴圈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創新是推動企業形成長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雖然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創新意識和創新投入有所提升，但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其整體創新能力仍然需要進一步增強，這種創新能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該公司數字化轉型的進程。過去十多年來，該企業在推進數字化轉型方面主要依賴於國外技術，從而導致關鍵核心設備、人工智慧底層演算法、高端工業軟體等技術產品的對外依存度較高，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3) 數字化技術服務生態不夠健全。在推進數字化過程中，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對現有的業務系統和業務流程進行優化，卻沒有形成數位協作業務轉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目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資料開發利用的水準和能力低下，部門之間對於資源共建共用、跨部門協同協作等開放意識不強，不同業務之間沒有實現資料的線上交換和集成共用。此外，產業鏈、供應鏈整合協同能力不足，具有互補能力、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夥伴關係並向客戶提供複雜服務的生態系統尚未建立，企業沒有能夠與生態合作夥伴之間實現資源的協同共用，原有利益格局和權力體系較難打破。數字化技術在業務流程優化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難以滿足數字經濟時代企業高品質發展的要求。

(4) 缺乏複合型數字人才。國有平台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對全體員工的思維理念和數字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天保控股有限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對互聯網、大資料、雲計算等數位技術的基礎知識瞭解不夠全面，員工對數字化轉型的理解也存在不足。天保控股有限公司面臨的嚴峻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人才儲備不足，現有從事數字化工作的員工數量無法滿足需求。第二，勝任能力不足，企業前期沒有開展關於懂數字化技術、業務和管理的複合型人才的招聘和培養工作。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順利進行不僅需要具備領導層面的管理人才，還需要更多跨領域、學習能力強、能夠熟練應用數位技術的複合型人才。

2.原因分析

(1) 數字化轉型是一項創新性的工作，同時也是一個長期、持續的試錯過程，其短期內難以見到成效。由於企業缺乏科學、系統的方法體系來指導其制定轉型目標和途徑，所以企業對自己轉型成功持懷疑態度。數字化轉型資金投入大、持續時間長，天保控股有限公司沒有設立清晰的戰略目標、沒有制定實現途徑以

及具體的操作過程，更多的還是集中在如何引進先進資訊系統，沒有從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進行整體規劃。只有在數字化實現跨環節、跨領域整合時，才能充分發揮其價值效益，從而實現量變到質變的跳躍，並帶來爆發式的增長，而天保控股有限公司數字化轉型仍處在向綜合集成跨越階段，價值效益沒有顯現，導致企業數字化轉型動力和信心不足。

(2) 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作為國有平台企業，其體制和機制的固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創新激勵模式和手段比較單一，影響了企業創新力的塑造，同時也弱化了數字化轉型給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帶來的優勢。此外，國有平台企業與政府存在著緊密聯繫，該類型企業是政府政策的積極回應者甚至是直接執行者，這造成了國有平台企業具有比較特殊的地位。由此，國有平台企業在資訊獲取和資源獲取方面處於優勢位置，但同時也削弱了其對市場機制的反應能力，從而導致國有平台企業創新動力不足。

(3) 天保控股有限公司與高校、研究機構、上下游企業、服務商等主體間沒有形成一整套多主體協同發展的合作機制和商業模式。天保控股有限公司沒有充分利用在津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實驗室所具有的相關資源，未來可以加強與學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目前企業團隊的業務知識結構、組織能力和業務邏輯主要基於原來的業務架構，因此企業缺乏足夠的新模式和數位業務運營經驗，導致新的業務模式和商業模式難以實現突破，企業業績增速緩慢。

(4) 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各領域對數字化人才的需求迅猛增加，而我國數字人才供給嚴重不足。我國大部分數字化人才都集中於互聯網大企業，留給其他企業的數字化人才很少。此外，天保控股有限公司沒有建立完善的數字人才培養和賦能體系，企業在外部知識獲取方面管道較為單一，同時內部知識積累和共

建共用的能力也存在不足。因此無法有效地促進員工的創新能力。企業也沒有系統性的對數字人才進行規劃，缺乏數位人才對稱的激勵制度。例如，工資體系與市場脫節，導致數字化人才常常離職，即便研究生、本科生經過幾年的實踐鍛煉後技術水準得到提高並具備了更高的市場價值，但他們的工資收入卻與其技術能力不符合，這也導致了辭職現象的存在。

六、研究結論與案例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為例，對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驅動的因素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與歸納分析，構建了基本理論分析框架，並得出以下結論：

（1）平台數字化建設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績效影響最為顯著。一方面，數字化平台建設能夠使企業重構業務能力和運營體系，有助於企業進行資源整合和共用，發揮集約優勢，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企業可以通過對資料快速提取，並進行智慧化分析，實現資料資源為企業的全面賦能，為產品研發、市場銷售、經營管理等提供科學決策和精準執行，這使得企業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得優勢地位。另一方面，數字化平台的建設有助於企業更好地爭取政府補助和政策支援，從而通過其他手段提高企業的績效水準。

（2）平台開放度和平台領導力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的績效有促進作用。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是孤立的個體，會面臨複雜的市場環境以及需要協調平台生態系統內各種利益關係，企業之間既存在競爭又存在合作。因此，在進行數字化轉

型的過程中，企業需要積極融入市場，通過競爭對手的存在激勵自己不放鬆努力，推動自身持續向前發展。同時，企業也需要與合作夥伴相互支援，共同應對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助力企業度過艱難的發展階段。同時企業領導者要能夠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及時採取針對性的資源配置戰略來處理應對。

(3) 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的提升仍需相關政策的保駕護航。政府提供的創新政策支持對天保控股有限公司績效的影響較大，數字化轉型的順利實施對企業生產效益有明顯的提升作用，但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和國家政策導向，政府關於企業數字化建設以及創新政策方面的補貼其實也是企業的一筆資金來源，可以助力企業擴大生產經營，從而提升企業績效。政府政策支援有多種表現形式，企業積極回應國家政策會給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提供許多優惠和好處。

(二) 案例啟示

1. 加強頂層設計，提高數位治理能力

國有平台型企業的管理人員應該充分領悟到數字化轉型是一種由高層管理人員主導，企業自上而下實施的改革。數字化不僅僅是技術創新，更是企業戰略、領導力、組織架構和思維意識等方面的變革。因此，企業領導者要加強對數字化轉型的戰略謀劃，立足整體，通盤考慮企業如何制定符合自身實際的數字化轉型戰略以及數字化轉型會給企業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管理者還需準確找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切入點，以便從組織結構、資金配置、人才引進等方面提供所需的支持和保障，從而推動數字化轉型的順利實施。同時，企業要適當調整其企業文化，讓其管理理念、組織行為能夠適應數字化發展需要。此外，企業要加強對大資料應用的治理能力，打通企業內部、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資料共用與融

合應用管道，減少組織內“長臂管轄”的效率損耗，提高管理工作效率，減少管理成本，幫助企業業績增長。

2.賦能國有平台型企業數字化建設

從實證分析結果可知平台數字化建設對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影響最大，由此凸顯其在影響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當地政府等有關部門需要出臺及時的引導政策，提供促進企業數字化建設的政策支援，使得企業自發性的培育數位技術，完善數位基礎設施和數位平台建設。國有平台型企業自身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需要加快建設速度，憑藉現有的資訊系統建設成果，加快培育和運用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慧等新一代資訊技術，並且通過建設高效可重複使用的新型數位技術基礎設施，加快形成數位技術賦能平台，並提升核心架構的自主研發水平，以建立安全可靠的數字化網路。在此基礎上，企業要將現有的管道資源等進行資料化和數字化，從而實現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及時感知。同時企業需要提高平台領導能力、擴大平台開放程度，重新調整內部資源以適應外部環境，及時轉變業務發展模式，從而保持企業自身在市場中的優勢競爭地位。

3.建立內外聯動的數字化轉型模式

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驅動不僅包含著企業自身數字化建設能力的提升，也包含著外部環境中應該給予的政策支持。數字化能力建設需要消耗一定的資源，國有平台型企業規模較大，依靠單個企業自身資源提升平台數字化能力的時間較長，也會弱化其在行業中所承擔的平台功能，企業管理者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可能存在進展緩慢、畏頭畏尾等問題。因此，政府應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發揮鼓勵、支援和引導的作用。可以適度減免數字化轉型企業以及開發數字化技術、培養人才等服務機構的稅收，並增加相關方面的補貼和扶持力度。引導國有平台型企業適

當開放平台資源，發揮平台對外開放的正向作用，通過企業自身的數字化建設以及外部環境所提供的公共數位基礎設施，內外兼修，從而推動行業整體數字化建設步伐。此外，相關政府部門要積極營造健康、安全、有序的數位經濟發展環境，規範數位經濟的發展，確保市場整體按照安全有序、公平競爭、健康可持續的規則運行。

4.提高全員數位意識和素養，培養複合型數字人才

目前，企業數字化轉型亟需大量精通數位技術和專業知識的跨學科人才，然而，數位技術崗位的人才缺口較大，這妨礙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由於中國在數位技術領域起步相對較晚，高校培養的相關人才數量有限，導致在數位技術領域很難找到領軍人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政府應考慮推動高校加強數位技術基礎、專業和實踐等課程的建設，提升學生的數字化能力，這是克服人才短缺的關鍵舉措。另一方面，國有平台企業應重新審視數字化人才培養機制，企業可以設立數字化專業人員培訓部門，專門負責培養數字化人才，提高全員の數位素養和數位技能。此外，國有平台企業對數字化人才的激勵力度還不夠，因此，企業必須系統規劃數字化人才的建設，建立數字化人才管理制度，並考慮引入和發展績效評估和激勵機制，以吸引和留住優秀的數字化人才，進而為企業的高品質發展持續貢獻力量。

（三）局限性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樣本容量與指標選取上，本研究基於TOE框架，從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個層次選取5個解釋變數，發放210份問卷，樣本數量比較少。未來的研究中可以擴大樣本容量，同時基於其他視角豐富相關指標，進一步完善前因條件。其次，本研究選取的研究案例為天津市的國有平台

型企業，由於不同地區、以及行業性質不同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未來可進一步探究具體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數字化技術對於國有平台型企業績效的影響。

How does Digital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Platform Enterprises --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ianbao Holdings Co., LTD.

ZHOU Hong LI Zhengxing LI Zheng LIANG Yujie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novation based on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new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or state-owned platform enterprises, digital construction can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ow to use digital empowerment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platform enterprises i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to be solved urgently at this stage. Based on TOE theor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takes Tianbao Holdings Co., Ltd. as the case study object, and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tho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ianbao Holdings Co., LTD. 's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verify that platform digital construction, platform openness, platform leadership, innovation policy support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Tianbao Holding Co., Ltd. has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ch as unclear transformation value goal, insufficient enterprise innovation ability, unsound digital technology service ecology and lack of composite digital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enterpris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tate-owned platform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governance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 enterprise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Establish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d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improve all employees' digital awareness and literacy, and cultivate composite digital talents.

Keywords: Digital Construction; State-Owned Platform Enterprises;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ianbao Holdings Limited

公司治理與資訊環境 ——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的經驗證據

王蕾*

摘要：本文採用滬深兩市上市公司 2003—2020 年間的資料，構建一個相對簡潔而全面的公司治理評分體系，以衡量中國上市公司的治理水準，並從四個角度實證檢驗公司治理與資訊環境之間的關係：首先，考察公司治理水準是否會對分析師的數量產生影響；其次，考察公司治理水準對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的影響；接著，考察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之間的關係；最後，考察公司治理水準是否會對價格發現的及時性產生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公司治理會對資訊環境產生顯著影響，公司治理水準越高，跟進的分析師人數顯著增多，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顯著提高，預測的分散性顯著降低，但是，對價格發現的及時性沒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 公司治理；分析師數量；分析師預測準確性；分析師預測分散性；
價格發現及時性

一、引言

現代企業的發展促進了公司治理的產生：由於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導致代理成本出現，公司治理得以產生。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機制能夠有效緩解代理問題，降低代理成本，促進企業價值的提升。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公司治理受到了許多國際組織和國家的廣泛關注。進行公司治理研究有利於企業進一步完善治理結構，改善運營效率。現有的研究表明，高水準的公司治理能夠降低代理成本，減少財務欺詐發生的可能性，同時能提高價格發現的速度。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不僅能夠吸引較多的資本投入，而且投資者願意以一定的溢價來投資。這樣看來，公司治理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乃至社會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

* 王蕾，南京審計大學對外聯絡辦公室教務辦公室主任，中級經濟師，研究方向為經濟監督和經濟治理。

近幾年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對公司治理來說是變革性的。但是，中國經濟的三個獨特性：國企占比高、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雙重性以及股權分置改革都使得公司治理的效益受到挑戰。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在中國市場上，公司治理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在新興市場上，由於公司的外部治理結構不完善、法律法規不成熟且發揮的作用有限、公司的治理水準也是參差不齊，因而公司治理常常是影響企業價值和績效的重要因素。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顯著增長，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伴隨著東南亞危機，中國經濟的井噴式增長使得學者對中國的公司治理越發感興趣。但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性，中國企業一些獨有的特徵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代理問題。儘管為此政府提出了多項改革措施，但結果仍不盡如人意，尤其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很難走出困境。

以國外資本市場為例的研究表明，良好的資訊環境是增強投資者信心和提高企業價值的基礎，公司治理水準會對企業的資訊環境產生影響，以此影響投資者決策和市場定價的效率。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推動了資本市場的發展，然而伴隨著的是對市場有效性的普遍質疑，因此，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分析中國公司治理水準對資訊環境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國外經驗顯示，較好的公司治理會使得資訊更加可靠，跟進的分析師數量增加，降低分析師預測的成本，減少預測誤差。給定中國股票市場的特殊環境，研究公司治理與資訊環境之間的關係，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試圖通過研究公司治理和資訊環境之間的關係，揭示“好的公司治理”與公司運營、資本市場之間的關係。

二、文獻綜述

學者、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政府都一直很關注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係，基本都認為好的公司治理能夠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緩解代理問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在理論上，Fama 等人（1980）發現公司治理機制有望降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代理成本。與此同時，有關研究也表明好的公司治理也會對分析師數量、預測的準確性和分散性產生積極影響。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國市場的特殊環境下公司治理與資訊環境之間的關係。

（一）關於公司治理對分析師數量影響的研究

從國外研究來看，關於公司治理對分析師數量的影響，Beekes 和 Brown(2006)對澳大利亞的公司做研究，發現好的公司治理會帶來更多的分析師跟進，預測的準確性也更高。同樣的，Beekes 和 Brown(2012)同樣發現在加拿大，好的公司治理也會帶來更多的分析師

跟進，預測分散性更低，準確性更高。

夏范社和何德旭（2021）研究發現，明星分析師能識別公司價值，降低資訊不對稱、提升公司治理水準。孫多嬌和楊有紅（2018）指出分析師的關注度可以反應公司規模，規模更大的公司往往會有更多的分析師跟蹤。李常安、儲一昀和倉勇濤（2016）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也對中國市場進行了分析，發現跟進的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數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即分析師跟進與公司價值顯著正相關。

（二）關於公司治理對分析師預測準確性影響的研究

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從很早就開始了。Mikhail, et. al. (1999) 就發現分析師會利用公司披露的資訊力求準確地預測市盈率。接著，Karamanou 和 Vafeas (2005) 等人進一步發現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通常會使得分析師的預測更為精確並且管理能力預測更頻繁。然後，Bhat, et. al. (2006) 發現了與 2005 年 Karamanou 等人研究的相似結論：公司治理披露對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有積極影響。自此以後的研究更為細化，比如具體到公司治理的某一方面：Xu 和 Tang (2008) 發現當內部控制較弱的時候，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會降低；或者某一變數發生變化對分析師預測準確性的影響：Nowland (2008) 的研究發現，在亞洲引入公司治理準則後，分析師預測的誤差會顯著降低。最後，Yu (2010) 發現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披露的資訊更加可靠，這會降低分析師預測的成本以及誤差。

從國內的最新的研究來看，江媛和王治 (2019) 研究發現公司董事會報告可讀性越好，分析師預測越準確，分析師預測的分歧度也越小。徐鑫和朱雯君 (2016) 發現公司治理水準會顯著影響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與 Nowland (2008) 和 Yu (2010) 的研究類似，他們發現不同的公司治理機制對分析師預測準確性的影響有所不同，具體來說，比如董事會規模、監事會規模、國有股比例以及薪酬激勵政策等會顯著影響上市公司資訊披露品質，從而進一步影響分析師預測精度。

（三）關於公司治理對分析師預測分散性影響的研究

國內外的研究都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數量和預測準確性的關係，關於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分散性這一方面的研究相對匱乏。國際上，Lang 和 Lundholm (1996) 在研究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數量時同時發現，如果要儘量做到預測的精度更高，準確性更高，那麼跟蹤的分析師數量應該增加，而且分析師之間的分歧應該減少；Beekes, et. al. (2012) 在研究加拿大市場上公司治理與分析師之間的關係時也發現，好的公司治理也會使預測分散性更低，準確性更高。在中國，肖土盛等 (2017) 研究發現良好的資訊披露品質能夠顯著降低分析師的預測誤差，而較低的預測誤差可進一步緩解股價

崩盤風險，分析師預測活動在資訊披露品質與股價崩盤風險之間起仲介作用。熊正德等（2005）發現公司的資訊披露越及時、越接近實際情況，分析師預測的分散度越小，因為公司披露的公有資訊會更受重視，這也說明分析師主要資訊來源間接是公司披露的公有資訊。

（四）關於公司治理對價格發現及時性影響的研究

關於價格發現，Ball 和 Brown（1968）指出與收益相關的資訊在實際財務報表公佈日期之前其實已經在股價中顯現出來了。通過價格發現的過程，價值相關的、私密的資訊已經被關聯到公開可見的股票市場價格上了。早先，還沒有對公司治理做出系統研究的時候，Skinner（1994，1997）指出，雖然管理者會傾向於延遲傳遞壞消息，但是由於訴訟風險和名譽成本，壞消息最終還是會公開的。Kothari 等（2009）的研究進一步發現管理者會提供相對及時的資訊，但是會延遲傳遞壞消息。但是，Abdelsalam（2007）等人發現由於外部董事會要承擔名譽成本，因此會鼓勵及時披露相關資訊。

公司治理機制會提高公司發佈資訊的及時性，資訊的可靠性會更強，這會對價格發現的及時性產生有利影響。與此相一致的預測，Brown（2006）和 Beekes, et. al.（2014）等人發現在澳大利亞，好的公司治理使得價格發現及時性更高。雖然 Beekes, et. al.（2012）發現在加拿大的公司中，這兩者的關係較弱。然而使用一個各國的交叉樣本，Beekes, et. al.（2012）等人發現公司會用更高品質的管理來換取治理透明度的提高，這代表著給公司給市場傳遞的資訊會更及時。

Argenti（1976）和 Blackburn（1994）等人發現兩職合一（董事長和 CEO 兼任）對報告的品質和及時性會產生負面影響。Bushee（2000）和 Bushee, et. al.（2003）等人發現股東更多的公司往往傾向於提供更為及時的資訊。公司治理和價格發現的及時性之間的關係將會隨著法律環境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給定中國股票市場的具體特徵，本文預測這兩者是正相關的。

本文以經典的委託代理理論為理論基礎，採用 OLS 和固定效應回歸檢驗，探究公司治理水準與資訊環境之間的關係。通過對中國滬深股票市場上的上市公司 2003 年到 2020 年的資料，構建出四個衡量公司資訊環境和七個上市公司治理水準的指標。根據研究概況和實證檢驗結果得出上市公司治理與資訊環境之間的關係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以第一章的前人的研究作為鋪墊，本章主要介紹由本文論題闡述開的幾個分論題，分別是：①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數量的關係；②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的關係；③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的關係；④公司治理水準與價格發現的及時性之間的關係。根據已有的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並在下一章中完成實證檢驗。

（一）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水準和分析師數量的關係

已有的理論和經驗研究表明，Lang（1996）及 Bushman, et. al（2004）認為當公司治理水準較弱時，公司資訊披露品質較差，市場分析公司的私有資訊成本上升（更容易發生內幕交易），分析師獲取資訊難度會加大，其跟進程度也會下降。但對於採取改進措施的公司，Farbor（2005）市場會給予這些治理改進公司較高的市場價格。

Beeks 和 Brown（2006）對澳大利亞的公司研究發現，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會有更多的分析師跟進，而且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也更高。同樣的，Beeks, et. al.（2012）發現在加拿大，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有更多的分析師跟進，而且預測的分散度更低、準確性更高。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說：

假說一：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通常有更多的分析師跟進。

（二）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準確度的關係

根據上一節的分析概述，當公司治理水準較弱時，公司披露的信息量相對較少，這會增加分析師預測的成本；反之，當公司治理水準較好時，公司主動披露更多的資訊，這有助於分析師的研究判斷，預測的準確性也會提高。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說：

假說二：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分析師預測更為準確。

（三）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分散性的關係

根據以上兩小節的分析，上市公司資訊政策越透明、披露的有效資訊越多，將吸引更多的分析師跟進，對該公司進行分析和預測，而且他們的盈利預測也更為準確，因此相互之間的盈利預測分散度會越小，對預測修正的波動率也越小。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說：

假說三：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分析師預測的分散度更低。

（四）公司治理水準與價格發現的速度的關係

總體而言，筆者預計公司治理機制會提高公司發佈資訊的及時性，資訊的可靠性也會越強，這對價格發現的及時性會產生有利影響。Beeks（2006）和 Beeks, et. al.

(2014) 與此相一致的預測：在澳大利亞，公司治理水準越高，價格發現的速度越快。而在加拿大，Beeks (2012) 發現這兩者的關係並不顯著。因此可以進行合理推斷：公司治理和價格發現的及時性之間的關係將會隨著法律環境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給定中國市場的特殊環境，本文提出第四個假說：

假說四：公司治理水準越高，價格發現的速度越快。

四、實證研究與結果分析

(一) 樣本選取和資料來源

本文選取的研究樣本來自滬深股票市場 2003 年-2020 年的公司資料，其中剔除了缺少資訊環境變數的公司。由於 B 股和 H 股都向國際投資者開放，受到的披露報告的要求與 A 股不同，因此將其剔除。由於金融企業會計和財務的特殊性，本文還剔除了包括銀行、證券公司等內的金融公司。本文樣本公司的公司治理資料、財務資料以及審計資料全部來自於 CSMAR 資料庫。

根據以上標準，最終有 3086 家公司用於研究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數量之間的關係，1275 家公司用於研究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之間的關係，3047 家用於研究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之間的關係，2848 家用於分析公司治理水準與價格發現的及時性之間的關係。其中，用於研究分析師預測準確性的資料大多集中在 2007 年後，2007 年以前的資料缺失較多，所以整體上研究分析師預測準確性的公司樣本相對偏少。

(二) 引數的設計

本文要研究的是公司治理水準與資訊環境的關係，因此重點之一就在於如何構建一個相對合理的公司治理評分體系。為簡化本文的研究又不失一般性，本文基於以往文獻的研究結果，設計了一個相對簡潔而全面的公司治理評分體系。先前的研究已經發現，相關的管理屬性（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董事長和 CEO 的兼任情況以及高管持股比例等）會影響中國上市公司的估值和經營。本文借鑒 Haß、Vergauwe 和 Zhang (2014) 的設計，構造了一個相對簡潔的、涵蓋了其中特徵的公司治理水準評分體系。

表 1 公司治理分數評分標準

屬性	解釋	評分標準
INDIV	獨立董事占董事會總人數的百分比	INDIV>50%得分 1，否則為 0。
BOARDSIZE	該公司董事（包括董事長）的總人數	6<BOARDSIZE<13 得分 1，否則為 0。
DUAL	是否一個人同時擔任董事長和 CEO	DUAL=2，即不存在兼任情況，得分 1，否則為 0。
TOP10RELATION	前十名股東是否存在關聯	TOP10RELATION=1，即不存在關聯，得分 1，否則為 0。
MANAGEMENT	董監高持股比例	1%<MANAGEMENT<30%，得分 1，否則為 0。
FOREIGN	外國投資者持股比例	FOREIGN>0，得分 1，否則為 0。
BIG4	審計方是否來自四大或者四大的境內機構	BIG4=1，即審計方為四大，得分 1，否則為 0。

本文構造了七個變數衡量公司治理的水準，給定某一年，當治理屬性符合一定的標準，那麼就給該變數賦值為 1，否則就為 0。然後把這七類變數加總結合，得出公司治理的水準的得分。

綜上，衡量公司治理水準的分數設計如下：

$$CG = INDIV + BOARDSIZE + DUAL + TOP10RELATION + MANAGEMENT + FOREIGN + BIG4 \quad (1)$$

（三）因變數的設計

1. 分析師數量 (COVERAGE)

為了衡量每家公司每年度有多少分析師跟進 (COVERAGE)，我們去某一特定年份某一公司的分析師的數量作為 COVERAGE 的取值。

2. 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 (ACCURACY)

分析師的預測精度 (ACCURACY) 是用該年度預測的 EPS 的值減去實際 EPS 的值，取絕對值後再除以實際 EPS 值，計算得分析師預測偏差。

3. 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 (DISPERSION)

分散性 (DISPERSION) 定義為標準差除以均值的絕對值。由於均值會對標準差產生較大影響，為了使資料更為合理，去掉變數個體差異較大帶來的影響，本文用標準差除以均值得出的結果。

4. 價格發現的及時性 (TIMELINESS)

價格發現及時性的衡量方法來自於 Beekes 和 Brown's (2006)。具體來說，我們按照如下公式計算價格發現的及時性 (TIMELINESS)：

$$TIMELINESS = ((\sum_{t=-365}^{t=-1} |\ln(P_0) - \ln(P_t)|) - 0.5) / 365 \quad (2) \text{ 其中 } P_t \text{ 是發}$$

佈日的股價，每天觀察，從第-365 天到第-1 天， P_0 是發佈日期 14 天以後的股價。-

0.5/365 是為了識別資訊流做出的調整，這在交易日的過程中反映在收益上。這種衡量方法是直截了當的。如果該公司的股票價格捕捉資訊，收斂於其“最終”價格 P_0 （反映在年內發現的所有價值相關資訊）所花的時間越長，TIMELINESS 的值就越大。TIMELINESS 的值大表明年內價格的時效性低。相反，如果影響價格的所有資訊綜合起來並最終反映在-365 天，TIMELINESS 的值將會最低，也就是價格發現的速度越快。

（四） 控制變數的設計

本文一共設計了 13 個控制變數：國有股占比（STATE）、非流通股占比（NONTRADE）、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公司規模（SIZE）、淨資產收益率（ROE）、公司報告的淨收益（LOSS）、財務杠杆（LEV）、成長機會（MB）、股票收益波動率（RETVOL）、交易量（TRADE）、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券商佣金（INVPRICE）和預測範圍（HORIZON）。

在主體部分的檢驗中，主要分為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分別對四個因變數：分析師數量、預測準確性、預測分散性以及價格發現的及時性與公司治理水準之間的關係進行回歸分析和實證檢驗。在每部分的回歸分析中，均包含了 OLS 回歸和固定效應回歸分析，並用 Hausman 檢驗來分析回歸結果的合理性。

首先，由於通常意義上大型企業會有更高層次的分析報告，因此本文把公司規模（SIZE）作為控制變數，將其定義為年底市值（千萬）的自然對數。

其次，本文還把淨資產收益率（ROE）、公司報告的淨收益（LOSS）、財務杠杆（LEV）和成長機會（MB）設定為控制變數。因為很顯然淨資產收益率、淨收益、財務杠杆以及成長機會都會對公司的市值和分析報告產生影響。作為一個二值變數，當公司報告的淨收益為負時，LOSS 的賦值為 1，否則為 0。

本文還控制股票收益波動率（RETVOL）和交易量（TRADE），其中 RETVOL 用於每年 360 多天的每日股票收益率的標準差，TRADE 被定義為該年交易總股數（千萬）的自然對數。此外，本文還考慮了中國 2007 年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 對資訊環境的影響，因此 2007 年以後虛擬變數（IFRS）的值為 1，之前的為 0。

此外，對於模型（1），股價越高的公司，跟進的分析師可能會越多，因此本文採用該年平均股價的倒數（INVPRICE）來衡量其與分析師數量之間的關係。對於模型（3），還要控制其預測範圍（HORIZON）的長度，將定義為最近的預測日期到該年的 EPS 公告之日起的自然對數。之所以要考慮預測範圍，是因為隨著財務報表發佈日期的臨近，全年逐步釋放的盈利相關資訊會逐步健全，因而預測的精度會提高。

最後，作為一個穩健性檢查，本文還附加考慮了三個所有權變數，以此來控制那些沒有被包含在綜合 CG 分數中的治理特徵，這些特徵雖然沒有包含在 CG 治理分數中，但是同樣會影響到資訊環境。這三個變數是國有股股數占總股數的比重 (STATE)，非流通股股數占總股數的比重 (NONTRADE)，以及第一大股東持股股數占總股數的比重 (TOP1)。

表 2 研究變數定義

變數		變數定義
1、被解釋變數		
分析師數量	(COVERAGE)	當年跟進研究該公司的分析師的數量
分析師預測準確性	(ACCURACY)	ACCURACY= 預測 EPS-實際 EPS /實際 EPS
分析師預測分散性	(DISPERSION)	DIPERSSION= 當年預測值的標準差/均值
價格發現及時性	(TIMELINESS)	$TIMELINESS = ((\sum_{t=-365}^{t-1} \ln(P_0) - \ln(P_t)) - 0.5) / 365$
2、解釋變數		
公司治理分數	(CG)	通過表 4-1 計算每家公司每個年度的治理分數
3、控制變數		
公司規模	(SIZE)	年底市值 (千萬) 的自然對數
淨資產收益率	(ROE)	ROE=淨利潤/淨資產
公司報告的淨收益	(LOSS)	二值變數：該年度公司報告的淨收益，若為負，LOSS=1；否則 LOSS=0
財務杠杆	(LEV)	LEV=(淨利潤+所得稅費用+財務費用)/(淨利潤+所得稅費用)
成長機會	(MB)	MB=總資產增長率
股票收益波動率	(RETVOL)	RETVOL=最近 250 個交易日對數收益率估計出來的波動率，計算年化值
交易量	(TRADE)	TRADE=年內該股票的交易總股數 (千萬) 的自然對數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	二值變數：2007 年以前賦值 0；2007 年後賦值 1
平均股價	(INVPRICE)	INVPRICE=該年平均股價的倒數
預測範圍	(HORIZON)	HORIZON=預測日期到今年 EPS 公告之日起的自然對數
國有股占比	(STATE)	STATE=國有股數量/總股數
非流通股占比	(NONTRADE)	NONTRADE=非流通股數/總股數
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	(TOP1)	TOP1=第一大股東持股數/總股數

(五) 模型構建

為了對本文提出的四個假說 β_0 進行實證檢驗，本文主要借鑒了 Haß、Vergauwe 和 Zhang (2014) 的方法，構造了以下適用於本文的模型：

$$COVERAGE = \beta_0 + \beta_1 CG + \beta_2 SIZE + \beta_3 ROE + \beta_4 LOSS + \beta_5 LEV + \beta_6 MB + \beta_7 RETVOL + \beta_8 TRADE + \beta_9 IFRS + \beta_{10} INVPRICE + \varepsilon \quad (3)$$

$$ACCURACY = \beta_0 + \beta_1 CG + \beta_2 SIZE + \beta_3 ROE + \beta_4 LOSS + \beta_5 LEV + \beta_6 MB + \beta_7 RETVOL + \beta_8 TRADE + \beta_9 IFRS + \beta_{10} HORIZON + \varepsilon \quad (4)$$

$$DISPERSION = \beta_0 + \beta_1 CG + \beta_2 SIZE + \beta_3 ROE + \beta_4 LOSS + \beta_5 LEV + \beta_6 MB + \beta_7 RETVOL + \beta_8 TRADE + \beta_9 IFRS + \varepsilon \quad (5)$$

$$TIMELINESS = \beta_0 + \beta_1 CG + \beta_2 SIZE + \beta_3 ROE + \beta_4 LOSS + \beta_5 LEV + \beta_6 MB + \beta_7 RETVOL + \beta_8 TRADE + \beta_9 IFRS + \varepsilon \quad (6)$$

模型中 β_0 代表常數項， $\beta_1 - \beta_{10}$ 代表係數。

(六) 實證檢驗

1. 描述性統計

表 3 構成 CG 指數的各項管理指標的描述性統計

	均值		百分位					
	N=42440	1%	5%	25%	50%	75%	95%	99%
1、獨立董事比例	0.370	0.273	0.333	0.333	0.333	0.400	0.444	0.571
2、董事會規模	8.750	5	6	7	9	9	12	15
3、董事長和CEO是否存在兩職合一的情況	1.629	0	0	1	2	2	2	2
4、前十大股東是否存在關聯	2.101	0	0	2	2	3	3	3
5、董監高持股比例	0.227	0.000	0.000	0.000	0.167	0.397	0.950	1.260
6、外國投資者股權比例	0.05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7、審計方是否來自四大或者四大在中國的分支機構	0.06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表 4 滿足 CG 加分標準的各項管理指標的描述性統計

	COVERAGE sample	ACCURACY sample	DISPERSION sample	TIMELINESS sample
1、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達50%以上	2%	2%	2%	2%
2、董事會規模在6-13人之間	89%	77%	89%	90%
3、董事在和CEO不存在兩職合一的情況	72%	72%	71%	74%
4、前十大股東不存在關聯	4%	3%	3%	3%
5、董監高持股比例在1%-30%之間	19%	20%	19%	19%
6、外國投資者股權比例大於0	5%	6%	6%	5%
7、審計方來自於四大或者四大在中國的分支機構	7%	7%	7%	6%

表 3 和表 4 主要描述了構成 CG 指數的各項管理指標的描述性統計。其中表 3 主要是對原始資料做出描述性統計，比如在這些樣本公司中，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的平均值為 37.0%，以及董事會的平均規模是 9 人左右。其中兩職合一和前十大股東關聯這兩項都是二值變數，當董事長和 CEO 由同一人擔任時，即原始數值為 1 時，該項賦值為 0，若董事長和 CEO 不存在兩職合一的情況，即原始數值為 2，該項得分為 1；當前十大股東不存在關聯，即原始數值為 1 時，該項得分為 1，當前十大股東存在關聯或者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即原始數值為 2 或者 3 時，該項得分為 0。

表 4 是滿足加分標準的各項管理指標占比的描述性統計。從表中可以看出，就本文選擇的治理屬性而言，在四個樣本中，獨立董事比例在 50% 以上的只占所有樣本的 2%，董事

會規模有 89%以上的公司符合加分要求。同時也可以看出，兩職合一的情況在中國並不是
 很普遍，四個樣本中的比例均在 71%及以上，說明在大部分情況下，董事長和 CEO 都不是
 由同一人擔任的。而各個樣本中“前十大股東不存在關聯”這一項基本都在 4%及以下，說
 明樣本中的大部分公司前十大股東多多少少都存在關聯。四個樣本中的董監高持股比例均
 符合加分要求。

表 5 CG 得分及其指標賦值後的描述性統計

變數	均值 N=42440	標準差	百分位				
			1%	25%	50%	75%	99%
CG	2.017	0.779	0	2	2	2	4
INDIV	0.017	0.130	0	0	0	0	1
BOARDSIZE	0.935	0.246	0	1	1	1	1
DUAL	0.693	0.461	0	0	1	1	1
TOP10RELATION	0.092	0.289	0	0	0	0	1
MANAGEMENT	0.164	0.370	0	0	0	0	1
FOREIGN	0.053	0.224	0	0	0	0	1
BIG4	0.063	0.242	0	0	0	0	1

表 6 CG 及其指標的相關係數

	[2]	[3]	[4]	[5]	[6]	[7]	[8]
CG	[1] 0.127	0.294	0.603	0.379	0.454	0.263	0.314
INDIV	[2]	-	-	0.006	-	0.002	0.02
BOARDSIZE	[3]	0.108	0.007	0.024	-	-	0.028
DUAL	[4]		0.003	0.002	0.025	-0.01	-
TOP10RELATION	[5]			0.035	-	-	0.034
MANAGEMENT	[6]				0.002	0.043	
FOREIGN	[7]				-	0.022	0.005
BIG4	[8]				0.046		0.012

表 5 和表 6 主要展示了得分匯總後的各項指標的描述性統計以及各個指標間的相關係
 數。從表 5 的描述性統計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分數 CG 的均值是 2.020，從均值來看董事會
 規模（BOARDSIZE）和 CEO 的雙重性（DUAL）這兩個指標貢獻最大，即大部分公司都滿足這
 兩項的加分標準，這與表 4 的分析結果一致。從表 6 可以看出，公司治理得分 CG 與每個指
 標都正相關，而且各個指標間相關性都較小，後一種結果表明，本文選取的七個指標展現
 了公司治理機制的不同方面，進一步說明瞭指標設計的合理性。

表 7 是資訊環境（因變數）與控制變數的描述性統計。從因變數來看，平均每家公司
 每年有 14.410 個分析師跟進，平均的預測偏差為 5.0%，預測分散性的平均值為 31.4%。從

表中最後兩項可以發現，CG 分數大於均值比 CG 分數小於均值有更多的分析師跟進（ $15.590 > 13.140$ ），預測的偏差更小（ $0.032 > 0.045$ ），即準確性更高，預測的分散性更低（ $0.283 < 0.313$ ），價格發現的速度更快（ $0.046 < 0.050$ ）。四個資訊環境變數（分析師數量、分析師預測準確性、分析師預測分散性、價格發現及時性）都與前文的假說一致。這些特徵表明公司治理水準高的公司能夠緩解代理問題，從而提高公司資訊透明度，改善資訊環境。

表 7 因變數與控制變數的描述性統計

	均值	中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高CG	均值：低CG
COVERAGE	13.830	8.000	14.990	1.000	116.000	15.590	13.140
ACCURACY	0.041	0.010	0.085	0.000	0.877	0.032	0.045
DISPERSION	0.305	0.274	0.156	0.000	1.000	0.283	0.313
TIMELINESS	0.049	0.045	0.025	0.003	0.308	0.046	0.050
SIZE	1.551	1.479	1.101	-3.590	8.520	1.737	1.491
ROE	0.046	0.069	0.333	-5.924	9.467	0.053	0.044
LOSS	0.086	0.000	0.280	0.000	1.000	0.068	0.092
LEV	1.502	1.060	2.111	-1.991	49.430	1.446	1.521
MB	0.255	0.0841	1.076	-1.000	46.930	0.312	0.237
RETVOL	0.475	0.453	0.149	0.042	3.129	0.491	0.470
TRADE	7.014	7.078	1.298	-6.026	12.320	7.127	6.977
INVPRICE	0.107	0.082	0.150	0.000	6.178	0.096	0.111
HORIZON	5.868	5.976	0.331	3.135	6.351	5.884	5.863
STATE	0.302	0.285	0.231	0.000	0.971	0.260	0.314
NONTRADE	0.392	0.406	0.267	0.000	1.000	0.387	0.394
TOP1	0.354	0.331	0.154	0.003	0.850	0.348	0.356

表 8 給出了因變數和控制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CG 和資訊環境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也證實了本文在表 7 中的發現：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跟進的數量的相關係數為正（0.111），即公司治理水準越高，跟進的分析師數量越多，說明兩者可能存在正相關關係；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偏差的相關係數為負（-0.056），即公司治理水準越高，分析師預測的偏差越低，準確性越高，說明兩者可能存在負相關關係；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的相關係數為負（-0.062），即公司治理水準越高，分析師預測的分散度越小，意見更統一，說明兩者可能存在負相關關係；公司治理與價格發現的速度的相關係數為負（-0.088），即公司治理水準越高，資訊反映到價格上的速度就越快，價格發現的速度就越快，說明兩者可能存在負相關關係。下一節將對這些關係進行實證分析與檢驗。

表 8 因變數與控制變數的相關係數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COVERAGE [1]	-	-	-	0.11	-	-	0.03	0.48	0.03	-	-	-	-	0.16	0.20	-	0.43
	0.14	0.05	0.08	1	0.08	0.10	7	9	9	0.00	0.08	0.01	0.15	3	2	0.20	4
	8	2	9		3	1				8	1	1	6			7	
ACCURACY [2]		0.22	0.01	-	-	-	-	-	-	0.22	0.17	-	0.02	0.07	0.03	0.20	-
		4	3	0.05	0.01	0.05	0.04	0.11	0.01	9	3	0.04	9	2	8	7	0.08
				6	9	3	3	8	1			4					2
DISPERSION [3]			0.34	-	-	-	-	-	0.00	0.10	0.15	0.02	0.23	-	-	-	-
			7	0.06	0.08	0.02	0.17	0.13	0	1	7	1	4	0.00	0.07	0.05	0.00
				2	6	8	5	5						3	6	1	3
TIMELINE [4]				-	0.21	0.24	-	-	0.02	0.02	0.00	0.49	-	-	-	-	-
SS				0.08	5	0	0.01	0.23	8	4	0	2	0.09	0.33	0.21	0.15	0.07
				8			9	3					0	6	6	1	6
CG [5]					0.00	-	-	0.02	-	-	-	0.02	-	-	0.07	-	0.06
					7	0.00	0.02	6	0.00	0.03	0.01	8	0.01	0.02	3	0.05	8
						6	4		2	0	2		9	6		0	
STATE [6]						0.68	0.51	0.01	0.01	0.00	-	-	0.09	-	-	0.00	-
						6	2	6	0	5	0.01	0.02	7	0.06	0.19	2	0.10
											5	2		4	2		6
NONTRADE [7]							0.35	-	-	-	-	0.06	0.19	-	-	-	-
							1	0.01	0.00	0.00	0.04	6	4	0.22	0.17	0.13	0.09
								9	3	2	4			8	0	9	9
TOP1 [8]								0.24	-	0.01	-	0.08	-	0.01	-	0.02	0.01
								5	0.03	4	0.04	2	0.08	2	0.00	8	8
									3		8		8		6		
SIZE [9]									0.00	-	-	0.07	-	0.56	-	-	0.23
									0	0.00	0.07	3	0.18	8	0.04	0.07	6
										2	3		3		2	3	
ROE [10]										0.00	-	0.00	0.00	-	0.01	-	0.00
										4	0.01	4	8	0.03	1	0.02	9
											1			0		9	

LOSS	[11]	0.11 6	- 0.01 2	0.00 7	0.01 3	0.01 9	0.04 0	0.00 2
LEV	[12]		- 0.02 1	0.01 5	0.06 3	0.02 2	0.11 1	- 0.04 4
MB	[13]			0.06 6	- 0.06 5	0.00 0	- 0.08 6	- 0.02 2
RETVOL	[14]				- 0.00 4	- 0.15 3	- 0.25 4	- 0.14 9
TRADE	[15]					- 0.00 8	0.35 4	0.05 9
IFRS	[16]						0.11 5	0.38 3
INVPRICE	[17]							- 0.10 5
HORIZON	[18]							

2. 實證結果與分析

在上一小節中的描述性統計中，發現有些解釋變數之間可能存在如下的相關關係：

(1) 公司治理水準 (CG) 與分析師數量 (COVERAGE) 存在正相關關係；(2) 公司治理水準 (CG) 與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存在負相關關係 (ACCURACY)；(3) 公司治理水準 (CG) 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 (DISPERSION) 存在負相關關係；(4) 公司治理水準 (CG) 與價格發現的及時性 (TIMELINESS) 存在負相關關係。下面將對以上的相關關係進行實證檢驗，並用 Hausman 檢驗來驗證 OLS 回歸和固定效應回歸哪個更適合該模型。

(1) 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數量的檢驗

表 9 分析師數量與公司治理水準的回歸分析 (假說 1)

COVERAGE	(1) OLS	(2) OLS	(3) OLS	(4) OLS	(5) Fixed-effects	(6) Fixed-effects	(7) Fixed-effects	(8) Fixed-effects
CG	1.195*** (0.109)	1.207*** (0.196)			0.786*** (0.177)	0.884*** (0.309)		
INDIV			1.894** (0.770)	-0.632 (1.158)			0.880 (0.975)	0.598 (1.195)
BOARDSIZE			1.910*** (0.369)	0.651 (0.564)			1.255 (0.795)	1.792 (1.348)
DUAL			0.787*** (0.197)	1.216*** (0.331)			1.732*** (0.356)	2.189*** (0.585)
TOP10RELATION			0.547** (0.245)	0.838** (0.425)			0.461* (0.240)	0.339 (0.420)
MANAGEMENT			1.870*** (0.259)	1.626*** (0.591)			-0.0125 (0.467)	-1.402 (1.088)
FOREIGN			1.788*** (0.425)	3.197*** (0.752)			0.177 (0.649)	2.662* (1.516)
BIG4			0.864** (0.396)	0.922 (0.568)			0.681 (0.769)	-1.061 (1.325)
SIZE	8.207*** (0.160)	6.746*** (0.242)	8.204*** (0.160)	6.671*** (0.245)	6.664*** (0.299)	4.144*** (0.428)	6.694*** (0.297)	4.058*** (0.421)
ROE	0.575* (0.298)	0.974*** (0.336)	0.567* (0.298)	0.968*** (0.335)	0.406 (0.306)	0.688* (0.356)	0.401 (0.305)	0.688* (0.358)
LOSS	- 4.081*** (0.546)	-3.741*** (1.003)	-4.121*** (0.547)	-3.844*** (1.012)	-3.944*** (0.572)	-3.635*** (1.174)	-4.034*** (0.573)	-3.798*** (1.189)
LEV	- 0.172*** (0.0390)	-0.180*** (0.0563)	-0.165*** (0.0391)	-0.176*** (0.0566)	-0.176*** (0.0417)	-0.147* (0.0768)	-0.172*** (0.0415)	-0.140* (0.0767)
MB	- 0.807*** (0.0893)	-0.603*** (0.132)	-0.805*** (0.0887)	-0.574*** (0.125)	-0.695*** (0.111)	-0.391*** (0.131)	-0.685*** (0.112)	-0.416*** (0.133)
RETVOL	- 7.854*** (0.725)	-4.759*** (1.095)	-8.143*** (0.728)	-4.719*** (1.117)	-2.881*** (0.762)	-1.779 (1.211)	-2.877*** (0.768)	-2.148* (1.258)
TRADE	- 2.215*** (0.145)	-1.891*** (0.233)	-2.164*** (0.147)	-1.848*** (0.236)	-1.888*** (0.188)	-0.602* (0.332)	-1.952*** (0.190)	-0.673** (0.330)
IFRS	5.612*** (0.218)	5.589*** (0.300)	5.611*** (0.220)	5.655*** (0.306)	8.051*** (0.388)	9.724*** (0.495)	7.996*** (0.392)	9.757*** (0.494)
INVPRICE	-	-15.77***	-25.37***	-15.84***	-10.77***	-7.031*	-11.13***	-7.972**

	25.71***							
	(2.066)	(2.334)	(2.085)	(2.366)	(2.295)	(3.756)	(2.300)	(3.753)
STATE		0.753		1.246		-1.568		-1.305
		(0.970)		(0.998)		(2.114)		(2.127)
NONTRADE		-3.478***		-4.255***		3.133		2.739
		(1.037)		(1.059)		(2.043)		(2.028)
TOPI		-7.672***		-7.075***		-3.181		-3.086
		(1.263)		(1.268)		(3.976)		(3.989)
Constant	13.69***	15.63***	13.00***	15.80***	9.273***	2.718	8.820***	2.181
	(0.708)	(1.459)	(0.783)	(1.516)	(1.030)	(3.100)	(1.279)	(3.304)
Observations	17,800	5,682	17,755	5,655	17,800	5,682	17,755	5,655
R-squared	0.326	0.377	0.360	0.379	0.256	0.320	0.257	0.326

表中括弧內的數字為穩健估計的 t 值；*、**、***分別表示顯著性水準為 10%、5%和 1%。

表 9 列出了公司治理對分析師數量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被解釋變數是某年跟進某家公司的分析師的數量 (COVERAGE)，解釋變數是對每家公司每年公司治理水準的分數 (CG)，控制變數是公司規模、淨資產收益率、公司報告的淨收益、財務杠杆、成長機會等。

表 9 的第 (1) 列至第 (4) 列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的結果，第 (5) 列至第 (8) 列是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從回歸結果來看，不管是 OLS 回歸還是固定效應回歸，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一般有更多的分析師跟進，即在第 (1)、(2)、(5)、(6) 列中，代表公司治理水準的 CG 的相關係數都是顯著為正的 (在 1%水準上顯著)，這說明瞭較高的公司治理水準會使得分析師對公司更加感興趣，跟進的分析師的數量會增加。這與本文的假說一一一致，由於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其資訊透明度也較高，投資者獲取的資訊數量和品質優於治理水準較差的公司，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在資本市場上的受關注度，因而有更多的分析師對其市場表現和價格變動進行跟進分析。

從固定效應回歸來看，作為主要的控制變數之一，公司規模 (SIZE) 也對分析師數量產生顯著影響，公司規模每增加一單位，分析師數量會增加 1 個以上。淨資產收益率 (ROE)、公司報告的淨收益 (LOSS)、財務杠杆 (LEV) 等控制變數也會對分析師數量產生顯著影響。淨資產收益率 (ROE) 每增加一單位，跟進的分析師數量會增加 8 個以上；公司報告的淨收益 (LOSS) 如果為負，每變化 1 單位會使得分析師數量減少 4 個；財務杠杆 (LEV) 每增加一單位也會使得分析師數量減少。

從規模來看，似乎分析師對大企業更加感興趣。這是因為一般來說，大企業的管理模式、生產經營模式會比小企業更加成熟完善，其未來的發展道路也為更為明朗和穩定，不出意外的話，而分析師選擇研究跟進大公司也會提高自身的預測精度。從一些財務指標來看，分析師更加偏愛淨資產收益率高、淨收益大於零、財務杠杆低的企業。這與本文的預測一致，公司的淨資產收益率越高、淨收益越大，這兩項表現越好，說明公司是盈利的，

這必然會增加其在資本市場上的關注度，分析師也對其更加感興趣。而要是財務杠杆越大，說明公司承受的財務風險也越大，不穩定性越高，因此分析師的數量也會減少。從股價來看，分析師也更加偏好像股價高的企業。

從 Hausman 檢驗的結果來看，P 值都為 0，說明拒絕原假說，即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好。因為固定效應模型控制了隨年份變化但不隨公司變化的因素，使得回歸的結果更加準確。

綜上所述，分析師數量與公司治理水準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因此，本文的假說 1 得到證實。

(2) 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準確性的檢驗

表 10 主要列出了對本文假說 2 的實證檢驗結果。與假說 1 相似，對假說 2 也進行了四個 OLS 回歸和四個固定效應回歸。從表中可以看出，在 OLS 檢驗時，公司治理水準 (CG) 與分析師預測的偏差 (ACCURACY) 成顯著的負相關關係 (在 5% 水準上顯著)，即公司治理水準越高，分析師預測的偏差 (ACCURACY) 越小，準確性越高。因此，本文的假說 2 得到證實。

表 10 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與公司治理水準的回歸分析 (假說 2)

ACCURACY	(1) OLS	(2) OLS	(3) OLS	(4) OLS	(5) Fixed- effect	(6) Fixed- effect	(7) Fixed- effect	(8) Fixed- effect
CG	- 0.00507*** (0.000782)	-0.00287** (0.00140)			- 0.00313*** (0.00109)	-0.00229 (0.00225)		
INDIV			-0.00486 (0.00355)	-0.000699 (0.00675)			0.00524 (0.00566)	0.00727 (0.0133)
BOARDSIZE			-0.00629** (0.00290)	-0.00754 (0.00572)			-0.00152 (0.00391)	-0.0110 (0.00912)
DUAL			- 0.00616*** (0.00168)	0.00120 (0.00332)			-0.000649 (0.00286)	0.00142 (0.00546)
TOP10RELATION			- 0.00834*** (0.00150)	-0.00223 (0.00289)			- 0.00781*** (0.00176)	-0.00146 (0.00282)
MANAGEMENT			-0.00137 (0.00143)	-0.00562** (0.00252)			0.000984 (0.00303)	-0.00731 (0.00969)
FOREIGN			-0.00104 (0.00203)	-0.000687 (0.00334)			-0.00306 (0.00272)	0.00489 (0.00501)
BIG4			- 0.00611*** (0.00176)	-0.00398 (0.00334)			-0.00437 (0.00316)	-0.0124* (0.00636)
SIZE	-0.0134*** (0.000775)	-0.0121*** (0.00135)	-0.0135*** (0.000785)	-0.0120*** (0.00138)	-0.0120*** (0.00145)	-0.0148*** (0.00282)	-0.0124*** (0.00145)	-0.0150*** (0.00286)
ROE	0.000336	-0.000835	0.000380	-0.000762	0.00197	0.00248	0.00206	0.00233

	(0.00119)	(0.00169)	(0.00119)	(0.00170)	(0.00215)	(0.00354)	(0.00217)	(0.00359)
LOSS	0.191***	0.230***	0.191***	0.231***	0.201***	0.226***	0.201***	0.227***
	(0.0280)	(0.0565)	(0.0281)	(0.0563)	(0.0317)	(0.0671)	(0.0317)	(0.0669)
LEV	0.00440***	0.00484***	0.00443***	0.00476***	0.00390***	0.00425***	0.00385***	0.00432***
	(0.000727)	(0.00120)	(0.000728)	(0.00120)	(0.000836)	(0.00133)	(0.000834)	(0.00132)
MB	-	-0.000625	-	-0.000616	-0.00174**	-0.00200*	-0.00172**	-0.00203*
	0.00106***	(0.000367)	0.00107***	(0.000432)	(0.000820)	(0.00118)	(0.000823)	(0.00118)
RETVOL	0.0152***	-0.00722	0.0141***	-0.00740	0.00575	-0.00128	0.00696	-0.000955
	(0.00474)	(0.00732)	(0.00484)	(0.00734)	(0.00548)	(0.0104)	(0.00554)	(0.0106)
TRADE	0.0118***	0.0123***	0.0121***	0.0119***	0.0137***	0.00924***	0.0133***	0.00930***
	(0.000762)	(0.00148)	(0.000774)	(0.00149)	(0.00137)	(0.00265)	(0.00137)	(0.00267)
IFRS	0.0163***	0.0104***	0.0159***	0.0104***	0.00925***	0.00977***	0.00969***	0.00898***
	(0.00294)	(0.00366)	(0.00296)	(0.00374)	(0.00281)	(0.00333)	(0.00282)	(0.00331)
HORIZON	-0.0182***	-0.0141***	-0.0186***	-0.0146***	-	-0.00189	-	-0.00141
	(0.00335)	(0.00450)	(0.00337)	(0.00453)	0.00994***	(0.00602)	0.00987***	(0.00597)
STATE		0.00319		0.000714		0.0125		0.0137
		(0.00792)		(0.00841)		(0.0179)		(0.0179)
NONTRADE		-0.00323		-0.000961		-0.0127		-0.0149
		(0.00745)		(0.00803)		(0.0158)		(0.0160)
TOP1		-0.000408		-0.00190		-0.0512*		-0.0530*
		(0.00840)		(0.00852)		(0.0303)		(0.0306)
Constant	0.0623***	0.0419	0.0660***	0.0489*	0.00531	0.0172	0.00359	0.0216
	(0.0200)	(0.0288)	(0.0204)	(0.0294)	(0.0229)	(0.0425)	(0.0236)	(0.0437)
Observations	12,122	3,313	12,095	3,297	12,122	3,313	12,095	3,297
R-squared	0.326	0.128	0.104	0.128	0.092	0.128	0.093	0.130

表中括弧內的數字為穩健估計的 t 值；*、**、***分別表示顯著性水準為 10%、5%和 1%。

從 OLS 的回歸結果來看，公司治理水準 (CG) 每提高一個單位，分析師的預測偏差就會顯著降低 0.5% 左右，預測的準確性得到提升。這是因為一般來說，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資訊發佈會更加及時，更加完善。因而分析師獲取的資訊的品質會優於其他公司，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

從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來看，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與公司治理水準存在負相關關係，但是並不顯著。這是因為固定效應模型控制了隨年份變化但不隨公司變化的因素，比如經濟危機的影響。既然不顯著，說明 CG 不是影響分析師預測準確性的主要因素。而且重要的是，從 Hausman 檢驗的結果來看，P 值均大於 5%，說明 OLS 的回歸結果要優於固定效應回歸，所以分析結果時應該參考 OLS 的回歸結果。

其中控制變數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 出現共線性，查看原始資料發現，用於研究分析師預測準確性的資料大多集中在 2007 年後，2007 年以前的資料缺失較多，而 IFRS 的賦值原則剛好是以 2007 年為分界線，2007 年以前賦值為 0，2007 年以後賦值為 1，從而導

致了共線性。

與上一小節檢驗分析師數量與公司治理關係的結果一致，從第一大股東持股占比（TOP1）來看，與公司治理水準（CG）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係（第二列）。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對公司的控制能力就越強，這會導致個人專制主義，降低公司治理水準，從而降低分析師的數量和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

（3）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的檢驗

表 11 主要列出了本文對假說 3 的實證檢驗結果。與上文採用的模型相同，本節彙報了 OLS 回歸和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從 OLS 的檢驗結果來看，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顯著負相關（1% 置信水準），公司治理水準（CG）每增加一個單位，分析師們的預測的分散性就會降低 1.3% 左右。這是因為公司治理水準越高，治理結構更加完善，各方監督更多，資訊披露的準確性會提高，因而在同等條件下會提高分析師的預測準確性，從而分析師整體的分散性降低。

從固定效應回歸來看，公司治理水準與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也是負相關，即公司治理水準越高，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越低。但是這一結果並不顯著。但是從 Hausman 檢驗的結果來看，P 值為 0，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優於 OLS 的結果，因此雖然 OLS 的結果更加顯著，但是在分析時應更應該參考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即公司治理水準（CG）每提高一個單位，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就會降低 0.2%-0.5% 不等。固定效應的結果更好，說明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可能會受到隨年份變化但不隨公司變化的因素的影響，比如經濟危機、證券業的發展狀況等因素。

表 11 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與公司治理水準的回歸分析（假說 3）

	(1) OLS	(2) OLS	(3) OLS	(4) OLS	(5) Fixed- effect	(6) Fixed- effect	(7) Fixed- effect	(8) Fixed- effect
DISPERSION								
CG	-0.0127*** (0.00129)	- 0.00759*** (0.00242)			-0.00166 (0.00203)	-0.00546 (0.00389)		
INDIV			-0.0179** (0.00705)	-0.00698 (0.0124)			-0.00376 (0.0101)	0.0128 (0.0213)
BOARDSIZE			-0.00496 (0.00478)	-0.0105 (0.00766)			0.00872 (0.00666)	0.000285 (0.0143)
DUAL			-0.0206*** (0.00260)	0.00163 (0.00499)			0.00124 (0.00456)	0.00972 (0.00802)
TOP1ORELATION			0.00162 (0.00314)	-0.00442 (0.00536)			0.00190 (0.00354)	-0.0133** (0.00619)
MANAGEMENT			-0.00549** (0.00260)	-0.00626 (0.00592)			-0.0191*** (0.00495)	-0.0290* (0.0176)
FOREIGN			-0.0126***	-0.0129*			0.00310	-0.0102

BIG4			(0.00415)	(0.00728)			(0.00631)	(0.0127)
			-0.0320***	-0.0309***			-0.00977	-0.0226*
			(0.00355)	(0.00610)			(0.00721)	(0.0134)
SIZE	-0.0143***	-	-0.0137***	-0.00577**	0.000665	0.00511	0.00129	0.00515
		0.00636***						
	(0.00131)	(0.00245)	(0.00132)	(0.00249)	(0.00273)	(0.00466)	(0.00274)	(0.00467)
ROE	-0.00497*	8.49e-05	-0.00457	0.000277	-0.00279	-0.00358	-0.00245	-0.00315
	(0.00289)	(0.00441)	(0.00288)	(0.00439)	(0.00304)	(0.00730)	(0.00307)	(0.00721)
LOSS	0.129***	0.0962***	0.130***	0.0962***	0.101***	0.0745**	0.102***	0.0792**
	(0.0153)	(0.0296)	(0.0154)	(0.0300)	(0.0172)	(0.0328)	(0.0172)	(0.0329)
LEV	0.00818***	0.00970***	0.00820***	0.00962***	0.00548***	0.00705***	0.00555***	0.00693***
	(0.00107)	(0.00179)	(0.00107)	(0.00177)	(0.00104)	(0.00153)	(0.00102)	(0.00153)
MB	0.00531***	0.00442*	0.00520***	0.00436*	0.00203	0.00183	0.00213	0.00175
	(0.00182)	(0.00238)	(0.00183)	(0.00241)	(0.00162)	(0.00260)	(0.00162)	(0.00259)
RETVOL	0.270***	0.242***	0.264***	0.240***	0.185***	0.214***	0.184***	0.211***
	(0.0109)	(0.0222)	(0.0110)	(0.0222)	(0.0110)	(0.0204)	(0.0110)	(0.0206)
TRADE	0.00634***	0.00662***	0.00735***	0.00643***	0.00189	0.00100	0.00208	0.000115
	(0.00129)	(0.00247)	(0.00131)	(0.00248)	(0.00214)	(0.00414)	(0.00217)	(0.00416)
IFRS	0.0342***	0.00969*	0.0316***	0.00796	0.0207***	0.0167**	0.0193***	0.0167**
	(0.00352)	(0.00505)	(0.00357)	(0.00512)	(0.00477)	(0.00699)	(0.00484)	(0.00706)
STATE		-0.0218*		-0.0258*		-0.00278		-0.00306
		(0.0129)		(0.0133)		(0.0274)		(0.0277)
NONTRADE		-0.0170		-0.0132		-0.00376		0.00142
		(0.0126)		(0.0132)		(0.0251)		(0.0254)
TOP1		-0.103***		-0.104***		-0.103**		-0.108**
		(0.0158)		(0.0160)		(0.0424)		(0.0427)
Constant	0.138***	0.188***	0.132***	0.188***	0.175***	0.204***	0.165***	0.199***
	(0.00866)	(0.0185)	(0.00949)	(0.0191)	(0.0123)	(0.0343)	(0.0131)	(0.0357)
Observations	17,012	5,327	16,969	5,302	17,012	5,327	16,969	5,302
R-squared	0.110	0.127	0.113	0.130	0.051	0.077	0.052	0.080

表中括弧內的數字為穩健估計的 t 值；*、**、***分別表示顯著性水準為 10%、5%和 1%。

(4) 公司治理水準與價格發現的及時性的檢驗

關於公司治理水準與價格發現的及時性之間的關係，本文同樣進行了 OLS 回歸和固定效應回歸，表 12 彙報了回歸結果。從 OLS 的回歸結果來看，公司治理變數與價格發現的及時性變數呈負相關；從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來看，加入了國有股、非流通股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三個變數後，公司治理變數的係數符號發生了變化，但在統計上均不顯著。從 Hausman 檢驗的結果來看，P 值為 0，說明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優於 OLS 回歸。因此在具體分析時應參考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再次分析固定效應回歸，似乎國有股、非流通股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這三個控制變數對價格發現的及時性有較為顯著的影響，使得公司治理變數的係數符號由負變正，使其符合以往研究的結論。而這三個控制變數也正是中國市場的獨有特徵，說明國有股占比過高、股權分置改革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是中國股市區別於國外股市的重要特徵。

國外研究顯示，公司治理水準越高，相關資訊反映到價格上的速度越快。而在中國，

這個結果之所以不顯著，而且甚至相關係數都是相反的，筆者推測主要是中國股市發展相對不成熟導致的。中國股市波動異常劇烈，政府也有目的的運用股市政策，使得中國股市有“政策市”的特徵。李翠玲（2009）研究發現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的投機性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股市波動劇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從這個角度分析，中國股市更多的受到除公司治理和資訊披露水準以外的因素影響，投資者的投機性使得股價不能及時準確的反映其內在價值，相關資訊對股價的影響速度也會受到影響，本文暫無法系統地做出研究。

表 12 價格發現的及時性與公司治理水準的回歸分析（假說 4）

TIMELINESS	(1) OLS	(2) OLS	(3) OLS	(4) OLS	(5) Fixed- effect	(6) Fixed- effect	(7) Fixed- effect	(8) Fixed- effect
CG	-0.00136*** (0.000222)	-0.000794* (0.000413)			0.000315 (0.000348)	-0.000343 (0.000688)		
INDIV			-0.00348*** (0.00113)	- (0.00206)			-0.00468** (0.00193)	-0.00161 (0.00341)
BOARDSIZE			-0.00118 (0.000799)	-0.00270** (0.00130)			-0.00128 (0.00158)	-0.000972 (0.00304)
DUAL			-0.00364*** (0.000468)	-0.000700 (0.000920)			-0.000908 (0.000788)	0.00214 (0.00140)
TOP10RELATION			0.00549*** (0.000384)	0.00156** (0.000707)			0.00458*** (0.000427)	-0.00104 (0.000833)
MANAGEMENT			-0.00278*** (0.000505)	-0.00146 (0.00131)			- (0.000971)	0.00367 (0.00296)
FOREIGN			-0.00150* (0.000766)	-0.00215 (0.00144)			0.00377*** (0.00120)	0.000784 (0.00314)
BIG4			-0.00350*** (0.000624)	-0.000357 (0.00104)			- (0.00134)	-0.00501* (0.00286)
SIZE	-0.00243*** (0.000227)	- (0.000460)	-0.00231*** (0.000227)	- (0.000466)	-0.00583*** (0.000478)	- (0.000800)	- (0.000475)	- (0.000803)
ROE	0.000944 (0.000601)	0.000632 (0.000895)	0.00106* (0.000596)	0.000621 (0.000894)	0.00174** (0.000676)	3.66e-05 (0.000927)	0.00185*** (0.000679)	-9.26e-05 (0.000950)
LOSS	-0.00421** (0.00197)	-0.00607 (0.00474)	-0.00388** (0.00197)	-0.00604 (0.00487)	-0.00438** (0.00222)	-0.00331 (0.00365)	-0.00374* (0.00221)	-0.00241 (0.00350)
LEV	- (0.000384***)	-0.000102 (0.000191)	- (0.000356***)	-9.49e-05 (0.000192)	- (0.000169)	-2.38e-05 (0.000309)	- (0.000168)	-1.24e-05 (0.000309)
MB	5.24e-05 (0.000189)	0.000161 (0.000264)	2.55e-05 (0.000188)	0.000165 (0.000264)	0.000239 (0.000249)	0.000191 (0.000299)	0.000229 (0.000250)	0.000201 (0.000303)
RETVOL	0.0668*** (0.00223)	0.0857*** (0.00552)	0.0655*** (0.00225)	0.0853*** (0.00555)	0.0623*** (0.00235)	0.0893*** (0.00492)	0.0605*** (0.00236)	0.0887*** (0.00493)
TRADE	- (0.000757***)	0.000265 (0.000447)	- (0.000226)	0.000298 (0.000454)	-0.000571 (0.000418)	-0.000160 (0.000798)	-7.97e-05 (0.000415)	-9.23e-05 (0.000803)
IFRS	-0.0101***	-	-0.0109***	-	-0.00692***	-0.00121	-	-0.00134

		0.00734*** (0.000527)		0.00766*** (0.000778)		0.00775*** (0.000611)		
STATE		0.00944*** (0.00248)		0.00845*** (0.00263)		0.0138** (0.00543)		0.0142*** (0.00547)
NONTRADE		0.00408* (0.00236)		0.00494* (0.00253)		0.00605 (0.00506)		0.00554 (0.00508)
TOP1		-0.00641** (0.00262)		-0.00637** (0.00268)		-0.0205*** (0.00710)		-0.0197*** (0.00707)
Constant	0.0417*** (0.00154)	0.0197*** (0.00333)	0.0429*** (0.00170)	0.0214*** (0.00352)	0.0424*** (0.00236)	0.0217*** (0.00566)	0.0432*** (0.00276)	0.0202*** (0.00652)
Observations	14,153	4,281	14,121	4,261	14,153	4,281	14,121	4,261
R-squared	0.179	0.292	0.189	0.293	0.143	0.273	0.152	0.275

表中括弧內的數字為穩健估計的 t 值；*、**、***分別表示顯著性水準為 10%、5%和 1%。

五、結論

通過採用四個不同的變數來解釋資訊環境，本文主要考察公司治理的品質與資訊環境的幾個方面之間的關係。使用中國上市公司2003年—2020年的資料作為樣本，筆者發現，治理水準較好的公司會有更多的分析師跟蹤研究，翔實的預測報告也會更多一些。

本文主要考量公司治理水準與資訊環境之間的關係，後者通過分析師數量、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分析師預測的分散性以及價格發現的及時性來衡量。其內在含義是公司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能夠增強分析是所得資訊的可靠性，加強資訊披露，減少欺詐，提高預測頻率。因而更好的公司治理能夠提高價格發現的及時性，因為治理水準較高的公司更傾向於及時發佈消息，而且這類消息更為可信。最後，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如下：

與國內外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公司治理水準越高，跟進的分析師的數量就越多，分析師預測的偏差更小，預測的準確性提高，預測的分散性降低，分析師的預測更為一致。從價格發現的及時性來看，雖然國外研究的結論是公司治理水準使得價格發現的速度更快，但是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並沒有直接的證據支持這一結論，這一點可能是因為中國股市和中國經濟的特殊性導致的。總體來說，提高公司治理水準對公司的資訊環境研究有顯著影響，對提升公司價值具有重大意義。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stock market

WANG L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03-2020 data of two cities, to build a relatively concise and comprehens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rating system,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nd empirically from the Angle of fou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irst, investigate whether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affect the number of analysts;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 on the accuracy of analysts' forecasts is investigated.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dispersion of analysts' forecasts is investigated. Finally, whether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an impact on the timeliness of price discovery is investiga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the number of analysts who follow up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 accuracy of analysts' forecasts will improve significantly, and the dispersion of forecasts will decrease significantly. However, i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imeliness of price discovery.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 Number of analysts; Accuracy of analyst forecasts;
Analysts forecast dispersion; Price discovery timeliness

Z世代擇業觀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李錦昊 王瓊勝 蔣瑩*

摘要：Z世代作為新興一代，未來將成為新時代社會勞動力的主體力量，研究Z世代擇業觀現狀及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以Z世代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和專家訪談法，探索其擇業觀並分析家庭、教育、社會文化等因素與Z世代擇業觀的內在聯繫。研究發現Z世代在職業選擇時以薪酬水準、職業發展、行業前景和興趣愛好為主要偏好，這些偏好不僅體現了Z世代的群體特點，並與家庭、教育、社會文化因素緊密相關。研究發現有助於推動Z世代樹立清晰的擇業導向，為引導未來社會就業提供借鑒。

關鍵詞：Z世代；擇業觀；成長背景

一、引言

Z世代作為獨特一代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關注。Z世代(Generation Z)指出生於1995—2009年的人，因其成長生活環境的獨特性與多樣性，呈現出諸多與其他世代人群不同的擇業觀念，例如：更加關注工作生活平衡度、重視自我發展、興趣至上等。這些擇業觀念不僅體現主體勞動力就業價值選擇和個人發展傾向，而且與中國經濟發展趨勢息息相關。因此，分析Z世代擇業觀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 李錦昊，南京財經大學管理學學士，研究方向涉及企業管理、商業模式分析、人力資源管理；王瓊勝，南京財經大學管理學學士，研究方向涉及組織行為學；蔣瑩，南京財經大學管理學學士，研究方向涉及心理學。

目前對 Z 世代的研究分佈在群體特徵、消費理念、就業分析等方面，就業分析的研究多在就業情況、就業心態、就業指導服務方面，對於 Z 世代的擇業觀關注較少。本文聚焦未來社會主體力量——Z 世代，採用問卷調查與專家訪談法，探索 Z 世代擇業觀現狀並圍繞家庭、教育，社會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該群體呈現出相應擇業觀的原因。研究討論對深化 Z 世代擇業影響因素內容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為未來就業和個人職業發展提供了一定實踐啟示。

二、Z 世代特點及其成長背景分析

（一）Z 世代特點

Z 世代生活在物質基礎充實、精神空間豐富的狀態中，生存和安全需求已經滿足，更傾向於追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表現出與之前世代人群不同的特點，具體如下：

1. 追求自我

Z 世代勇於追求自我實現而不受束縛，無論在集體生活還是個人決策中，他們愈加擁合理性精神，敢於平視權威。包容的家庭及社會環境讓他們更有底氣去嘗試興趣愛好。

2. 多元發展

系統性上升教育使 Z 世代從有限認知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形成了學習型思維模式，加強了對不同知識領域的探索；同時體育、藝術等多元化課外活動也拓展了個人發展的新方向。並且，伴隨互聯網普及，Z 世代的資訊獲取能力和途徑得到增強，該群體對新事物的包容度、接收力明顯提高，從而表現出多元化思維模式、渴望多元化發展。

3. 中庸心態

目前青年人以“佛系”“躺平”為代表的社會心態氾濫已成為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¹。他們以豁達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不過於計較得失。在就業選擇上，他們逐漸強調工作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就業選擇不再僅僅寄希望於一份高薪、穩定的工作，而是更注重享受工作和生活。

4. 矛盾思想

從工作視角來看，Z世代受過良好教育，多數不願意從事技術性較低的職業，他們對高薪酬水準、好公司環境有一定程度的追求。然而，現實導致Z世代擇業不盡其意，不僅不同擇業偏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排斥（譬如追求放棄高薪、返鄉支教），而且因為沒有真實瞭解社會狀態，其擇業理想和就業現實存在矛盾性落差。

（二）Z世代成長背景分析

1. 家庭因素

家庭作為個人社會化的第一領域，是個體學習處理社會關係的第一課堂²。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家族式家庭往往是較為理想的家庭模式，但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計劃生育推進，中國戶均規模不斷縮減^②，家庭結構產生深刻變化。具體而言：核心家庭、單親家庭、重組家庭等新型家庭結構不斷增多。這些變化使得Z世代父母對子女的關注度與重視度不斷提升，Z世代家庭地位逐漸中心化，但這種“關注”同時也會造成家庭矛盾增多，家庭關係出現惡化，長久來看，會導致Z世代自主性降低，缺乏合作意識，更加注重自我。

¹ 覃鑫淵，代玉啟。“內卷”“佛系”到“躺平”——從社會心態變遷看青年奮鬥精神培育[J]. 中國青年研究, 2022(2):5-13.

² 黎娟娟，黎文華.Z世代大學生多重矛盾性社會心態解析[J]. 中國青年研, 2022(7):104-110, 30.

2. 教育因素

受全民教育及高校擴招影響，Z 世代普遍成為中國學歷最高的一批人，相應地，Z 世代面臨的學歷歧視、學歷壓力問題凸顯。2022 年，中國高等院校畢業生達 1000 萬以上，相較於 2010 年同比增長 58.6%。與高校畢業生同步增加的，是越來越高的就業門檻，越來越多的企業門檻從大專提到本科再到研究生。就業競爭，學歷“內卷”似乎已經成為了 Z 世代普遍需要面對的問題，他們不得不重新定位自我與規劃個人職業發展路徑。

Z 世代教育形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互聯網時代，他們學習的知識會更加全面。同時，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及場所也是 Z 世代教育的一大特徵，他們更多接受翻轉課堂、小組學習、VR 互動等教育新形式，這些方式有助於培養他們的主動思考能力與動手實操能力。最後，Z 世代不再像其他青年世代“光靠學習”，而是呈現出發展的多樣性，尊重他們的個性成為父輩們教育時的“口頭禪”³。

3. 社會文化因素

社會穩定與經濟發達是 Z 世代面臨的鮮明時代特徵，這對於 Z 世代成長成熟及自尊自強均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但他們沒有經歷過社會的重大變遷，成長過程中缺乏社會性“受挫經歷”，在“明天會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強”的家庭和社會期待之下^①，Z 世代個人預期及社會理想化程度較高，導致他們經常出現預期偏差的矛盾心理。

伴隨社會穩定發展，互聯網也為 Z 世代成長提供了重要資訊文化媒介。據 QuestMobile 資料庫數據顯示，2022 年 Z 世代網路月活躍人數已達 3.42 億，該群體的生活方式、消費文化具有明顯的數位化特徵。

³ 何紹輝. Z 世代青年的形成背景與群體特徵[J]. 中國青年研究, 2022(8):14-20.

一方面，在網路中，Z世代從現實中解放出來，以跨圈層、跨地域、跨組織的可交流的青年文化話語為基礎，自由自在地結成新的消費、話語同盟⁴。他們追求新潮，多元的理念與包容的社會形態，相比於其他世代，Z世代更樂意接受新的文化事物，打破傳統觀念，不願被傳統與強權束縛，看重平等與溝通。對文化的包容性與他們個體獨有的精神追求，塑造了時代背景下，一個敢於挑戰，自主的Z世代社會形象。另一方面，互聯網文化具有一定失真性，在不斷追求互聯網+的同時，他們也很容易被網路中負面資訊所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們的行為朝偏離客觀情況及非理性方向發展。

（三）人群特點、成長背景對Z世代擇業觀的影響

伴隨著當下家庭結構及規模發生改變，Z世代更加崇尚自由發展，他們在擇業時愈加看重自我價值能否得到實現。另外，興趣至上，他們擇業時會偏向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而不受所學知識、專業的束縛。教育及社會文化的多元使Z世代擇業方向更加多元化，他們不僅僅只希望得到一份工作，而更加看重公司對他們個人能力的多方培養。同時，伴隨著社會穩定發展，越來越多的Z世代敢於創業。當下，依託於互聯網發展出了多種新業態，電子商務、網路主播等新興行業快速興起，也為Z世代提供了更多的職業選擇，但互聯網發展對部分傳統行業的擠壓也會加重Z世代的擇業焦慮感。

⁴ [4] 敖成兵. Z世代消費理念的多元特質、現實成因及亞文化意義[J]. 中國青年研究, 2021(6):100-106.

三、研究設計與分析

(一) 研究設計

1. 問卷設計與調查

為了解 Z 世代擇業觀現狀和潛在原因，本研究設置調查問卷，主要內容涉及：

- (1) 基本資訊，包括性別、年齡、當前狀態、學校層次、就讀學校所在省份；
- (2) 不同擇業觀，該部分要求受訪者排序，並採用綜合得分計算，即 $(\sum \text{頻數} \times \text{權值}) / \text{本題填寫人次}$ ；
- (3) 擇業觀影響因素，主要通過李克特量表分析家庭、教育和社會文化因素等方面影響。

本研究通過線上調查方式隨機發放問卷，共發放 308 份問卷。問卷設置了篩選題項，要求受訪者屬於 Z 世代群體（1995—2009 年出生），最終剔除掉重複作答、填寫不完整的無效問卷後，獲取有效問卷 274 份（89%）。經統計，本次調查中男性占總人數比例為 36.5%，女性為 63.5%，在校學生占總人數比例為 90%，應屆畢業生及在職人員佔比 10%。調查對象家庭所在地主要為西南地區、華中地區、東部沿海地區，西北地區，覆蓋面較廣。

2. 專家訪談

本研究通過專家訪談，深入瞭解 Z 世代當下實際擇業傾向及形成原因。具體而言，選取 3 位行業和高校專家（1 位業界資深管理者、2 位高校就業指導專家）進行訪談。一方面，向業界管理者諮詢當下 Z 世代擇業價值取向，瞭解 Z 世代離職原因以及企業如何留住新時代年輕人，同時向高校就業指導專家諮詢對 Z 世代的看法和高校對 Z 世代擇業就業的培養路徑，最終對 Z 世代擇業觀及其背景、未來就業選擇形成較為深入的看法；另一方面，請專家們評價調查問卷，並根據專家指導和回饋修改完善問卷內容。

(二) 研究分析

1. Z世代擇業觀現狀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Z世代的擇業偏好綜合得分在前四位的分別是薪酬水準、職業發展、行業前景和興趣愛好，而專業匹配度的偏好最低（圖 1）。與此同時，擇業的首要考慮因素排名前三位的是薪酬、興趣愛好和職業發展，分別佔比 28.1%，26.28%和 22.26%，明顯高於工作生活平衡度、公司環境等其他要素（圖 2）。此外，有近 39.78%的人把專業匹配度這一因素排在了所有擇業觀的最後一位（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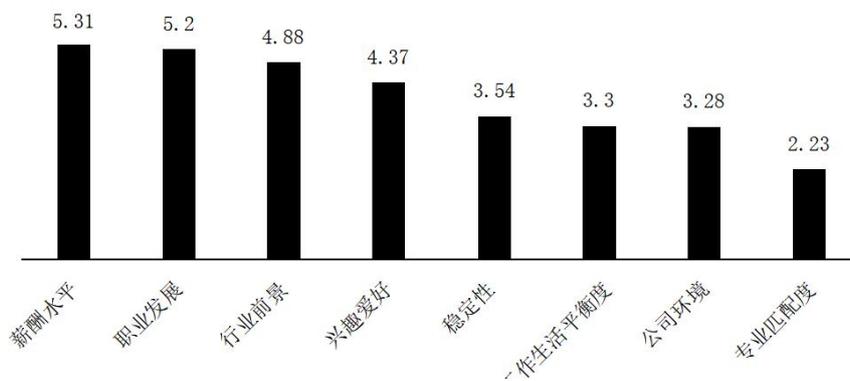


圖 1 Z世代對不同擇業觀綜合得分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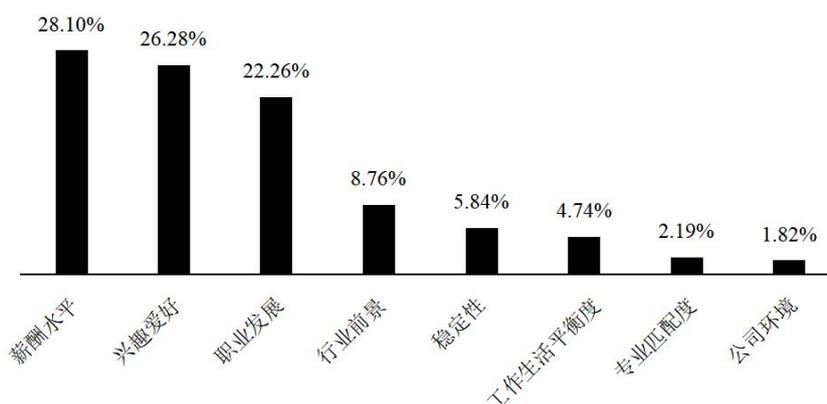


圖 2 擇業觀第一位的人數佔比

從調查結果來看，薪酬水準依然是Z世代擇業的首要考慮因素。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社會對於物質利益仍然過度關注，整個社會處於一種急功近利和浮躁的

氛圍下⁵，這對 Z 世代的價值觀產生了影響；同時，受通貨膨脹及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生活成本不斷提高，也成為 Z 世代十分看重薪酬水準的客觀原因。

除薪酬水準外，長久發展和興趣愛好也成為 Z 世代擇業時十分看重的因素。隨著全民義務教育普及和高校擴招，Z 世代受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其認知水準也隨之提高，對自身長久職業規劃和發展更加重視；同時，經濟飛速發展和新興行業湧現，導致 Z 世代感受到了行業的興衰變遷，他們更加看重行業發展前景。此外，結合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當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後，高層次需求就會產生。由此推斷，伴隨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Z 世代對精神層面的追求更加迫切，更加重視和發展自身興趣愛好；Z 世代作為追求個性的一代，他們受傳統觀念束縛較少，做事情喜歡“由著性子來”，從而在擇業時會更加注重工作與個性的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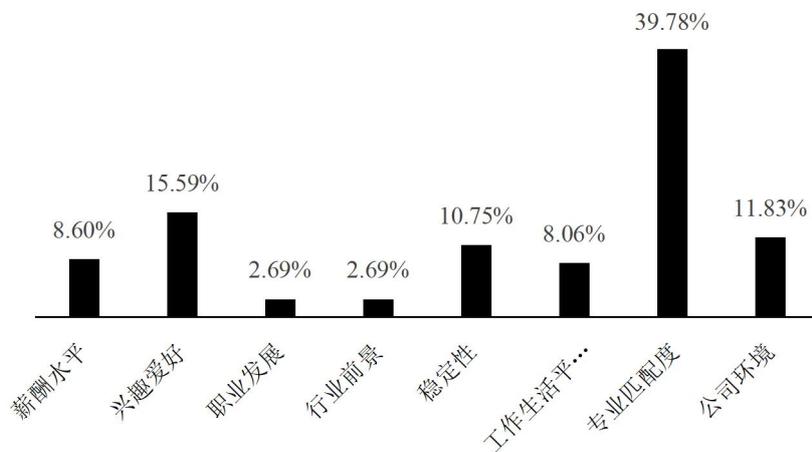


圖 3 擇業觀最後一位的人數佔比

此外，約 40% 的受訪者在擇業時對專業匹配度偏好較低。一方面由於高等教育培養模式與大學生就業供求的結構性矛盾，加之高校實踐性就業指導缺乏，使大部分專業學生畢業後無法找到與專業對口的崗位，出現“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另一方面，Z 世代更加注重工作帶來的新鮮感和價值感，希望在更多的崗位和空

⁵ [5]郭亞林. 碩士生的擇業動機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D]. 南京師範大學. 2014(2)

間中尋找新的職業選擇，他們也更加認同“技能才是硬通貨”的觀點，渴望成為多面手、多職業、跨界的“斜杠青年”。

2. Z世代擇業觀影響因素分析

(1) 家庭因素對Z世代擇業觀的影響。

①父母受教育水準對Z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父母受教育水準的差異對Z世代擇業觀有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父母受教育水準在本科及以上的人群在擇業時更看重興趣愛好，而父母受教育水準在專科及以下的人群擇業時更看重薪酬水準（圖4）。父母受教育水準較高的家庭往往擁有更多家庭文化資本，即一個家庭佔有的能夠對子女發展產生影響的氛圍、興趣、修養等方面的資源⁶。在這種家庭環境下成長的子女會潛移默化受到父母文化積累和資源的影響，有著更高的眼界，更加注重自身興趣愛好和自我價值實現。反之，受教育水準較低的父母，他們更在乎子女是否能找到一份高薪、穩定且體面的工作，受父母期望的影響，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子女在擇業時會更看重薪酬水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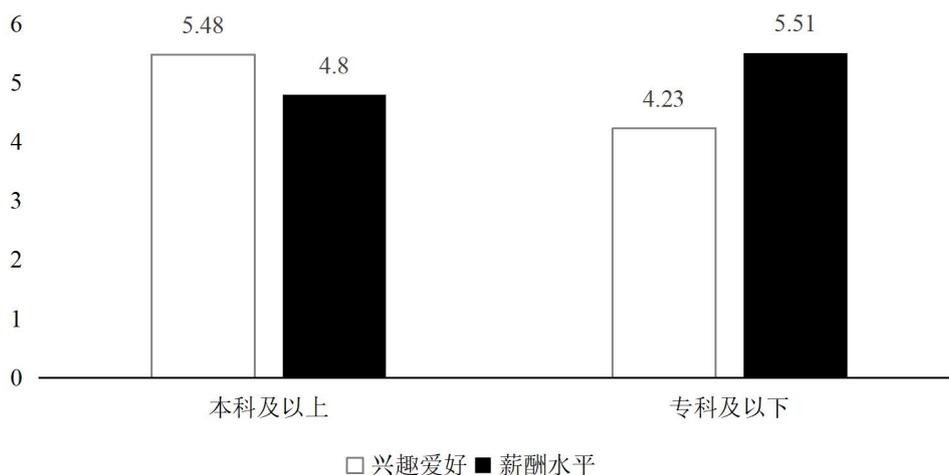


圖4 父母教育水準對Z世代擇業觀的影響

②家庭經濟狀況對Z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問卷中把家庭經濟狀況劃分為

⁶[6]李全生. 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J]. 東方論壇(青島大學學報). 2003(1):8-12

了四個部分，分別是低收入家庭、小康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調查結果顯示，隨著家庭經濟收入提高，Z世代對興趣愛好的重視程度也逐步提高，綜合得分分別為 3.86、4.6、4.67、7.5，對穩定性的重視程度在逐步降低，綜合得分分別為 4.14、3.8、2.46、1.33（圖 5）。由此推斷，高收入家庭下成長的子女依賴家庭經濟資源，從小能接觸到更多領域知識，可以廣泛發展自身興趣愛好，他們也不需擔心工作和收入變動等不穩定因素，更不用考慮家庭經濟負擔，就業緊迫感較低。在這種條件下，他們擇業時會更加關注自身興趣，對於穩定性偏好較低。低收入家庭下成長的子女，他們面臨家庭經濟責任和生活壓力，就業迫切感更強，擇業時會更加注重風險因素，如被辭退、工作調動等，所以更傾向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等穩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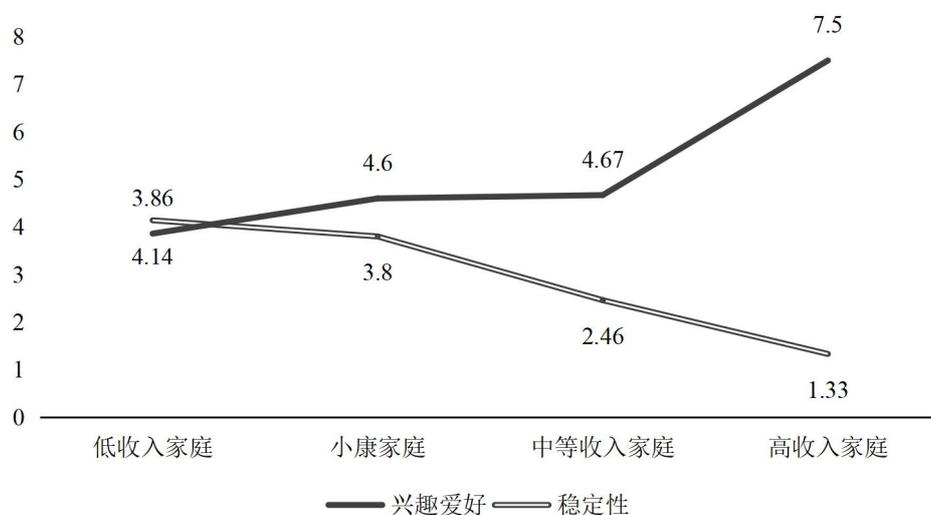


圖 5 家庭經濟狀況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

③家庭關係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問卷中設置了“父母是否經常發生矛盾衝突”以及“你對於家庭關係是否滿意”等問題，分析結果顯示，父母經常發生矛盾衝突以及對家庭關係不太滿意的子女在擇業時更加看重公司環境，綜合得分為 3.56；反之，綜合得分為 2.91。由此可見，家庭關係對子女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從小在和諧家庭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得到了充分滿足感

和幸福感，家庭和諧關係使他們對環境中的矛盾衝突不太敏感，因此在擇業時對公司環境考量較少。相反，從小在衝突的家庭環境下成長的孩子，他們十分渴望穩定和諧的環境，排斥環境中矛盾衝突等不利因素，這間接影響他們的擇業觀念，使其在擇業時更加看重公司人際關係是否和諧，是否有職場內鬥、職場 PUA 等現象。

(2) 教育因素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

①學校層次差異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學校層次人群在擇業觀上有較顯著差異，尤其體現在薪酬水準、興趣愛好的偏好上。由圖 6 可以看出，雙一流院校學生對興趣愛好、薪酬水準都比較看重，而專科院校學生薪酬水準偏好較低，本科院校學生對興趣愛好的重視程度相比之下較低。本研究認為，名校效應對解釋上述差異具有關鍵作用。高層次學校能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綜合學習平臺和更優質的朋友圈。學校層次越高，得到國家、地方或社會各界給予的教學資源越豐富，學校的人才實力、學術氛圍、管理制度等也會優於普通院校。在較好的學歷背景下，Z 世代認為自己未來有能力取得更高薪酬，而同時在校期間他們也有更多機會探索、發展個人興趣，因此在擇業時會更加關注薪酬水準和興趣愛好。普通本科院校的學生由於相對缺乏更好資源，選擇機會受限，對於興趣愛好的追求較低；專科院校獲取社會資源的實力相較於本科院校來說比較有限，並且隨著學歷貶值，專科學生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越來越小，在職業選擇中他們會因為文憑含金量低而存在“心理包袱”，產生自卑和自我懷疑心理⁷，導致了在擇業時對薪酬期望不高。

⁷ 陸慧. 論專科生的文化資本積累與擇業[D]. 華中師範大學,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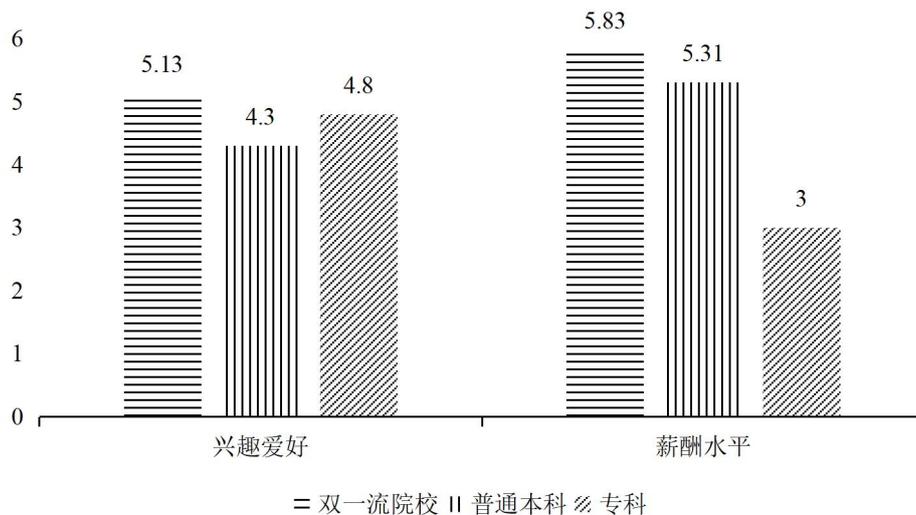


圖 6 不同學校層次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

②自我提升途徑偏好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約 76% 的 Z 世代受訪者認可越高的學歷水準越能獲得高薪資，反映了當前大部分人群選擇繼續深造的內在原因。同時，有 53.3% 的被調查者傾向選擇工作實踐來提升自我競爭力，這部分人在擇業時更看重薪酬水準；而 46.7% 的被調查者傾向選擇學習深造來提升自我競爭力，這部分人在擇業時更看重職業發展。由此可見，選擇工作實踐來提升自我的人群偏向於實用主義，認為競爭力由薪酬水準所體現，渴望在工作中得到較高收入和回報；傾向於選擇學習深造的人群，一方面由於職業特性（比如醫生就業門檻較高），只有高學歷才能帶來更好的職業發展，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學習深造可以更加明晰自己未來的發展選擇。

③學校和專業認同差異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問卷中設置了問題“您對所讀的學校和專業很滿意”和“您認為自己所讀的學校和專業可以幫助您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和專業認同度更高的受訪者更注重專業匹配度，綜合得分為 3.2；學校和專業認同度較低的受訪者，其專業匹配度綜合得分為 1.87。由此推斷，學校的教學水準、綜合實力以及專業優勢、學科排名等因素直接影響受訪者對學校和專業的認同感。學校和專業認同度高的受訪者在

擇業時，一方面相信自己所讀專業有較好發展前景，能獲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帶來更高的職業價值；另一方面，專業認同感高的人在學習專業技能和課程知識時往往更加認真，他們期望在擇業時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學習優勢。相反，對學校和專業認同度較差的人更傾向從事非本專業工作。

④學校就業指導滿意度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問卷中設置了“您認為過往接受了很多就業輔導和幫助”、“您認為過往接受的就業輔導可以幫助您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等問題。研究結果顯示，對學校就業指導更瞭解且滿意的人群佔比約 24%，他們在擇業時更看重職業發展和行業前景，綜合得分分別為 5.75，5.22；對學校就業指導不太瞭解且不太滿意的人群佔比約 43%，他們在擇業時更看重薪酬水準和公司環境，綜合得分分別為 5.46，3.83（見圖 7）。這一現象反映高校對於學生就業指導的欠缺，主要體現在就業指導教師隊伍專業化水準不足，對就業指導重視程度不高。由此推斷，就業指導欠缺，導致指導效果不理想，部分學生不能樹立清晰擇業觀，在擇業時較為功利化，更看重薪酬水準和公司環境；對就業指導比較滿意的人群，由於接觸到更多行業知識、就業技巧和工作經驗，形成比較清晰的職業生涯規劃和職業發展目標，更加注重自身未來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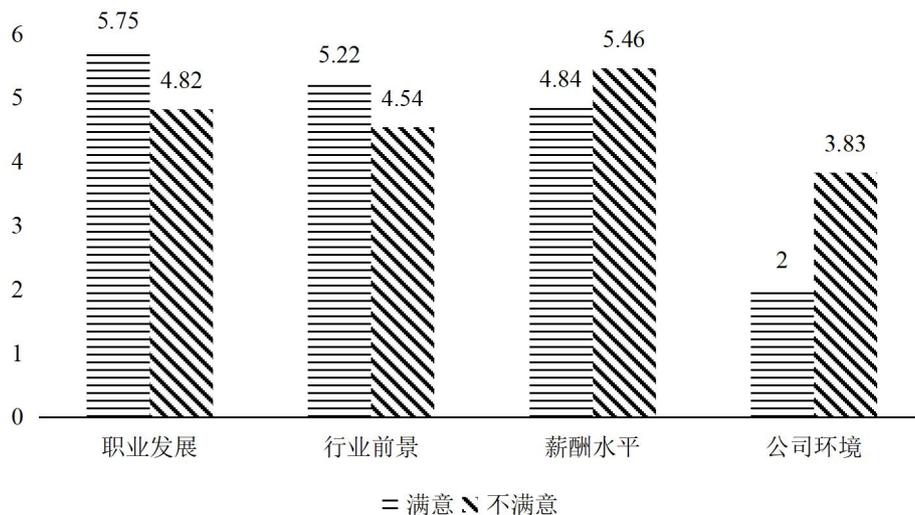


圖 7 學校就業指導滿意度對 Z 世代擇業偏好的影響

(3) 社會文化因素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

①政治因素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問卷中設置了“您對國家政治方面的大事比較瞭解”和“您希望更多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研究結果顯示，約 50% 的 Z 世代表示對國家政治大事比較瞭解，也希望更多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這部分人群擇業時更看重未來職業發展，綜合得分為 5.39。由此發現，Z 世代對國家時事表現出更加積極的態度，在穩定的國家環境下，公務員、“三支一扶”、大學生村官等越來越成為 Z 世代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為人民服務的主要途徑，這些崗位不僅有利於個人長遠職業發展，也有助於實現社會價值。

②社會觀念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18.35% 的 Z 世代容易受傳統觀念影響，他們在擇業時更注重行業前景和工作生活平衡度，綜合得分分別為 4.99，3.78；55% 的 Z 世代在擇業時不容易受傳統觀念的影響，這部分人更看重興趣愛好，綜合得分為 4.52。由此可以推斷，即使社會上仍有“男怕入錯行”、“鐵飯碗”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但在快速變化發展的時代，新興職業、新興行業不斷湧現，大部分 Z 世代更加注重個性發展，他們敢於跳出傳統就業觀念的束縛，追逐人生理想。

③地區經濟發展對 Z 世代擇業觀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有約 75.16% 的受訪者傾向大城市就業，這部分人更看重薪酬及專業匹配度。他們認為，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多，發展空間與機會多，有更多適配自己專業領域的工作；24.84% 的受訪者更傾向小城市就業，這部分人擇業更看重穩定性，他們認為，小城市工作壓力小，工作更加穩定，同時生活成本低，生活節奏慢，幸福指數高。

四、研究總結與討論

(一) 研究總結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對 Z 世代擇業觀進行深入分析，發現 Z 世代在職業選擇時以薪酬水準、職業發展、行業前景和興趣愛好為主要偏好，這些偏好既體現出 Z 世代的群體特點，並與家庭、教育和社會文化因素等方面緊密相關。

(1) 家庭方面。隨著家庭經濟收入提高，Z 世代擇業時對興趣愛好的重視程度逐步提高。父母受教育水準在本科及以上的 Z 世代在擇業時更看重興趣愛好，而父母受教育水準較低的 Z 世代更看重薪酬水準。父母經常發生矛盾衝突及對家庭關係不太滿意的 Z 世代在擇業時更加看重公司環境。

(2) 教育方面。不同學校層次的人群在擇業觀上有比較顯著的差異，雙一流院校學生擇業時更看重興趣愛好、薪酬水準，本科院校學生擇業時對興趣愛好的重視程度較低，而專科院校學生的薪酬偏好較低。同時，Z 世代認可越高的學歷水準能夠獲得越高的薪資收入。另外，對學校和專業認同感更高的學生擇業時更注重專業匹配度，對學校就業指導更瞭解且滿意的人群在擇業時更看重職業發展和行業前景。

(3) 社會文化方面。Z 世代總體比較關心國家時事，在擇業時更看重未來

職業發展。而且該群體對多元文化的接受使其在擇業時更看重興趣愛好。同時，渴望留在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更看重薪酬與專業匹配度，傾向於小城市就業的人更看重穩定性。

（二）研究意義與實踐啟示

從青年迄今表現出的擇業心理來看，一種具有較強的世俗性、務實性特徵，以及開放化、多元化取向的趨勢已經呈現出來⁸，因此，立足 Z 世代群體特點和擇業觀現狀，從家庭、教育，社會文化方面，深入討論該群體擇業偏好的原因，一方面突破現有研究重點關注 Z 世代就業情況、就業心態和就業指導服務方面的內容，另一方面拓展了 Z 世代擇業影響因素的研究內容，為未來擇業提供實踐參考。

首先，就社會而言，需要創造就業崗位，積極引導該群體樹立符合時代發展和國家戰略的擇業觀，鼓勵 Z 世代將個人價值融入到國家發展中。

其次，就企業而言，需要認識 Z 世代的求職需求轉變，將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將企業發展和員工多元化需求相結合，塑造和諧上進的企業氛圍，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才。同時，企業可以改變傳統短期激勵和物質激勵的思維，通過建設完善的培訓系統、公正透明的考核、合理的晉升通道，利用長期激勵和非物質激勵提升 Z 世代從業者的積極性，刺激他們的主動性、創造力，達到雙方共贏。

第三，就高校和個人而言，高校應進一步強化就業指導和職業生涯輔導，在政策、資金、人員上積極投入，從根本上關心大學生就業問題，通過安排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建設優質職業輔導隊伍、設立職業諮詢室等多種途徑為學生提供職業生涯規劃服務，引導學生選擇合適的職業發展道路。Z 世代除在擇業教育引導

⁸ 沈傑. 後單位制時代: 中國青年擇業心理的多元化取向[J]. 中國青年研究, 2002(3):40-44.

下，還需要在實踐中體會崗位內容，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通過嘗試不同職位以探索新內容、新領域，通過職場曆練豐富自身知識、提升自身眼界，客觀理性地分析自身職業需求。

（三）研究展望

Z世代擇業觀問題較為複雜，本文只聚焦幾個方面進行著重討論，難免在不足之處，本文重點圍繞家庭、教育和社會文化因素分析Z世代擇業觀具體影響內容，在影響機制解釋方面還存在不足，有待進一步深入驗證。未來研究可從更多角度探究Z世代擇業觀及其影響因素，運用更加科學嚴謹的統計工具分析數據，進一步驗證目前研究結果。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neration Z's Career Choice Perspective

LI Jin-Hao, WANG Qiong-Sheng, JIANG-Ying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generation, Generation Z will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the new era's workforce in the future, and 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career choice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takes Generation Z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ir career choice perspective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analyzing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between factors such as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and Generation Z's career choice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Generation Z mainly values salary levels, career development, industry prospec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their career choice,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ir group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factors including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Generation Z to establish a clear career orient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guiding future employment in society.

Key words: Generation Z; Career Choice Perspective; Background of Growth

新冠肺炎疫情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評估

—基於雙重差分模型

范凱煊 羅瑩瑩 徐天琪*

摘要：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暴發，對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造成了不能忽視的影響。本文利用泰爾指數定量分析了我國西部與中部、東部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探討了新冠疫情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疫情起到了加大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了在疫情環境下國家、社會和個人的發展建議及發展方向。

關鍵詞：新冠疫情；居民收入差距；泰爾指數；雙重差分模型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從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在世界經濟遭受了巨大的影響的同時，還促成了全球收入差距的不斷加大。就國家來說為減輕疫情對國民經濟的打擊，政府採取了各種程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用其促進國民經濟恢復發展的同時，卻使得人民收入與財產更多地向頂層集中，貧富分化問題進一步加劇，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一些負效應，最終拉大了本國的收入差距。¹我國在疫情暴發期間，防控政策一定程度上導致勞動力閒置、企業訂單積壓，尤其對進出口貿易造成一

* 范凱煊，武昌理工學院工商管理在讀；羅瑩瑩，廣東理工學院會計學在讀；徐天琪，山東大學經濟類專業在讀。

¹ 呂昊旻，趙雪情. 新冠疫情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極端分化[J]. 世界知識, 2022(4):54-55.

定的衝擊。從微觀層面來看，許多企業陷入停擺狀態，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失業與不充分就業等現象出現。而低收入人群的個人收入來源愈發不穩定，實際收入減少。早在 1992 年，鄧小平就在“南方講話”中，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質，是解釋人類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人類生產性，廢除奴役，克服二極分離，最後到達共用富足”。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明確提出了，要“越來越積極有為地推進共同富裕”。在未來 2035 年的經濟遠景目標中就明確提出了中國要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 GDP 完成一般發達國家水準的，社會中等收入人群明顯增長，基本社會公共服務條件得到均等化，城市地區發展差異、城鄉居民共用生存水準差異明顯縮小的總體目標。因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問題能否解決涉及共同富裕是否能夠更好地實現，也是未來我國實現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前提。

（二）研究意義

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影響著群眾的社會心理，關係到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由於疫情的突發性導致部分人群收入減少，居民收入差距是否因疫情而擴大急需得到驗證。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將使得大眾勞動積極性下降，制約其消費能力，社會成員間不滿情緒頻發，使得社會穩定性受到威脅。收入不平等也會通過消費和增長驅動力來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收入差距過大還會導致社會的財富過於集中，影響政治、經濟的合理發展。因此，如何應對這一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對我國經濟的衝擊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何在控制疫情、穩定經濟的前提下縮小社會收入差距就顯得尤為重要。所以，本文就上述問題做出相關實證分析研究，為縮小收入差距，精準進行社會治理提供相關建議。

二、文獻綜述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引發了全球性經濟衰退與返貧潮，對我國國民經濟也帶來較大衝擊。這也進一步導致收入結構產生一系列“反常”的變動。相比規模性返貧，我國當前更需警惕與應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規模性反彈所致的規模性返貧致貧風險：比如企業內聚集性疫情將直接造成感染員工在崗時間減少、甚至離崗；疫情嚴重影響中小企業和工商企業經營運轉，這對於進城務工或經營管理人員的就業連續性產生較大的影響；部分地區存在的過度防疫也會進一步影響低收入人口或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由此導致規模性因疫返貧致貧以及貧困人口“淨增長”。²

世界銀行研究指出，疫情加重了全球收入不平等，以及對不同地區和類型人口群體造成不同程度的因疫返貧和致貧。從新冠疫情衝擊的收入結構變動機理及結構特徵看，儘管疫情衝擊導致相對弱勢群體陷入突發或暫時貧困，但這種衝擊在整體或局部上對全體人群的收入結構轉變，也會產生突發或暫時貧困的“慢性化”和“永久化”。此次疫情暴發對世界經濟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ED）2020年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其成員國該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下滑4.9%，總體經濟的回落也進一步引發了全球性經濟衰退與返貧潮，對我國國民經濟也帶來較大衝擊。³

對於國外情況，呂昊旻、趙雪情指出，疫情影響下，由於美國的超寬鬆貨幣政策與失業率的攀升使得居民收入不平等逐漸加劇^[1]。于春海、章凱麗二人就疫

² 顧天安姚曄. 重大疫情危機下勞動者收入如何保障?—工資支付分擔機制的國際比較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 公共行政評論, 2021, 14(5):101-118.

³ 王晨旭. 新冠肺炎疫情下韓國稅收優惠政策效應分析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 稅務與經濟, 2022(6):48-55.

情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做出了相關論述，對美國政策導向做出了相關探。⁴楊解樸就德國的收入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和教育機會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問題，提出疫情正在加速一些已經存在的的不平等趨勢。⁵胡澎就疫情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提出疫情對低收入群體的衝擊較大。⁶姜茗予提到日本優先考慮保障民生，尤其是保障收入，並權衡各種政策的利弊以穩定收入結構。⁷甯賦魁對韓國強化稅收政策對企業員工就業的保障作用，完善已就業人群的就業保障體系，從而穩定企業員工的收入做出了相關分析。⁸薛嘯岩認為新冠疫情對中國消費受到了嚴重衝擊，為應對複雜經濟環境對國內人民收入的不利影響，應加以政策扶持。⁹

錢學鋒和高婉二人認為疫情以及中國為防疫所採取的措施衝擊力國內市場的供給側和需求，並對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¹⁰於長革表示本輪經濟下行主要因為新冠疫情的外力影響、有效需求遭到抑制所致，應採取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恢復和平穩增長。¹¹謝玲紅、魏國學從對農村收入差距進行了一系列分析，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對其內部收入差距產生了長期影響。¹²張紅宇基於新冠疫情的背景，對農業農村經濟所面臨產業安全問題、就業安全問題、收入安全問題、

⁴ 于春海，章凱麗。“疫情經濟學”能重振“美國夢”嗎？[J]. 文化縱橫，2022(1):8-11.

⁵ 楊解樸. 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國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表現、原因及影響[J].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6(9):57-67+103.

⁶ 胡澎. 新冠疫情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兼談“後新冠”時代日本社會的走向[J]. 日本問題研究，2020，34(4):24-33.

⁷ 薑茗予. 新冠疫情下日本政府對企業與個人的支援政策及啟示[J]. 現代日本經濟，2022，41(6):66-77.

⁸ 寧賦魁. 疫情下的韓國經濟和應對策略及中韓經貿合作重點領域展望[J]. 東疆學刊，2022，39(1):35-40.

⁹ 薛嘯岩. 後疫情時代中國免稅經濟發展的前景、問題及政策建議[J]. 宏觀經濟研究，2022(10):57-65+175.

¹⁰ 錢學鋒，高婉. 新冠肺炎疫情與中國物價[J]. 財經問題研究，2021(11):3-17.

¹¹ 于長革. 應對新冠疫情衝擊和經濟下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取向[J]. 地方財政研究，2020(4):22-25.

¹² 謝玲紅，魏國學. 共同富裕視野下縮小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現實挑戰與路徑選擇[J]. 經濟學家，2022(9):119-128.

貿易安全問題做出了相關探討並提出了相關解決措施。¹³李柳穎表示，在疫情的衝擊下，農村地區的封村封路，使村民難以外出務工、農產品陷入滯銷，幾乎斷絕了收入來源，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大。¹⁴李立紅與張凌等人也提出，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方面受到的衝擊大於中高級階層，收入差距在疫情以後擴大了，也就是說疫情後富人更富、窮人更窮了，疫情導致了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加大。¹⁵

在疫情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方面。趙恢林表示疫情對線下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影響更大，由於小型實體製造公司很難產生收益，難以承擔租金、設備等的運轉壓力以至於倒閉。並利用新凱恩斯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我國異質性企業就業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及其傳導機制。¹⁶張廣現探討了在疫情背景下匯率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路徑，認為疫情對中國經濟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¹⁷楊子暉、陳雨恬等人基於風險結構框架，進一步探討了疫情期間全球資本市場的共振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對完善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相適應的宏觀治理應對機制與風險防範對策提出了相關建議。¹⁸

近期的相關研究說明疫情下居民收入問題正在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探討疫情下收入差異的變化，為疫情下經濟社會治理提供有效對策，消除和諧社會發展的障礙和隱患，有著積極意義和作用。

¹³ 張紅宇. 2020年農業農村經濟面臨四大問題——由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形勢判斷[J]. 中國農村金融, 2020(11):42-44.

¹⁴ 李柳穎. 疫情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與思考[J]. 河北金融, 2022(5):54-56+66.

¹⁵ 李立紅, 張凌, 惠滢. 通往共同富裕的路怎樣越走越寬[N]. 中國青年報, http://news.cyoul.com/gb/articles/2021-03/23/content_4jw4zIW17.html

¹⁶ 趙恢林. 疫情衝擊、收入差距與財政政策援助[J]. 財經論叢, 2021(8):24-37.

¹⁷ 張廣現. 淺析人民幣匯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兼評《匯率變動、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一文[J]. 雲南財經大學學報, 2020, 36(6):2+113.

¹⁸ 楊子暉, 陳雨恬, 張平淼. 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下的宏觀經濟衝擊、金融風險傳導與治理應對[J]. 管理世界, 2020, 36(5):13-35+7.

三、研究設計

(一) 模型設立與指標選取

本研究關注疫情是否進一步拉大了高中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泰爾指數作為可以有效衡量群體個體或區域之間收入差距的指標，對高收入群體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變動相對敏感，泰爾指數越大說明其收入差距越大。相對基尼係數等其他指標，泰爾指數具有如下優點：(1) 泰爾指數可以測度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差異對整體性差異的貢獻率；(2) 泰爾指數中指標的資料單位不受限定；(3) 指標測度結果和規模體系具有獨立性。

因此提取各省份的泰爾指數，以雙重差分模型（DID 模型）進行對比，將低收入西部城市作為控制組，將高收入城市作為實驗組，檢測二者之間的泰爾指數變化情況。

本文採用泰爾指數衡量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具體計算方法如下。¹⁹

泰爾指數 T 的計算方法為：

$$T = \sum_{i=1}^N y_i \log \frac{y_i}{p_i}$$

泰爾指數 L 的計算方法為：

$$L = \sum_{i=1}^N p_i \log \frac{p_i}{y_i}$$

總差異的泰爾指數計算方法為：

$$T_P = \sum_i \sum_j \left(\frac{Y_{ij}}{Y_i} \right) \log \left(\frac{Y_{ij}/Y}{P_{ij}/P} \right)$$

其中，N 為省份的個數， y_i 為 i 省份收入與總體收入的比值， p_i 為 i 省份人口數占總體人口數的比值。將泰爾指數進行一階分解，可以把全國總差異水準分解

¹⁹ 馬越. 我國收入差距對消費升級影響的計量研究[D]. 吉林大學, 2022.

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間各省市差異與區域內各省市的收入差異，同時將東、中部區域的收入與西部區域的收入進行差異對比。其中在總差異的計算中， Y_{ij} 為*i*區域第*j*省份的收入， Y_i 為*i*區域的總收入， Y 為全國的總收入； P_{ij} 為*i*區域第*j*省份的人口， p_i 為*i*區域的總人口， P 為全國的總人口。

表 1 實驗組與控制組劃分

實驗組	控制組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東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海南省	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四川省、甘肅省、陝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貴州省、雲南省、青海省、重慶市

雙重差分法一般用於對於公眾政策或項目的實施效果的定量評估，通常一項實驗的基本要素包括政策處理，實驗組與控制組等。控制組目的在於控制已知結果，作為試驗處理的一組的參照標準來進行比較。本文將基於雙重差分模型的模型機理，將其應用於疫情對居民收入差距影響效果的定量評估中。考慮到新冠疫情暴發於 2020 年初，所以將 2000 年至 2019 年的資料作為控制組，2020 年與 2021 年的資料作為實驗組。

筆者重點關注於新冠疫情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將各省區和直轄市的泰爾指數作為因變數。

在簡單差分法中，計算受到疫情影響的地區平均值的前後差值的公式為：

$$y_{treat, after} - y_{treat, before}$$

*treat*代表了實驗組即受到疫情影響較大的地區，*before*代表了實驗組受疫情影響之前，*after*代表了實驗組受疫情影響以後。這個公式計算出了實驗組受政策影響前後的變化值，並且將這些變化歸因於疫情所造成的影響。但是簡單不能很好地說明的說明疫情造成的影響，由此，筆者引入雙重差分的思想。雙重差

分模型 (DID 模型) 面對面板資料時可以較大程度上避免內生性問題所帶來的影響：疫情相對於經濟主體而言是外生的，不存在逆向因果問題。同時，其固定效應估計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遺漏變數偏誤問題，使研究更加科學，能更準確地估計出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雙重差分模型具體公式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treat + \beta_2 time + \beta_3 treat \cdot time + \varepsilon$$

y 為各省份與直轄市在 21 年間的泰爾指數。 $treat$ 為分組虛擬變數，表示個體固定效應， $treat = 1$ 代表省份受到疫情的影響較大，該類省份屬於實驗組（中部城市與東部城市）； $treat = 0$ 代表省份受疫情的影響較小，屬於控制組（西部城市）。 $time$ 為疫情的時間虛擬變數，表示時間固定效應， $time = 1$ 代表政策實施之後（2019-2020 年）； $time = 0$ 代表政策實施之前（2000-2018 年）。 $treated = treat \cdot time$ 為分組虛擬變數和時間虛擬變數的交互項。 ε 為殘差項。

（二）樣本和資料來源

本文以中國 31 個省區和直轄市作為研究物件，選取 2000-2021 年為研究時間段，建立面板資料模型，所有檢驗均採用 stata17.0 操作。文中所有資料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公開資料，收集了關於 21 年期間的國民生產總產值，總就業人員，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產值與其對應的就業人員，通過以上資料，計算出相關合理化指數（即幹春暉泰爾指數），以合理化指數進行後續分析。

四、疫情對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描述統計分析

通過描述統計模型分析可知，Control 指控制組，Treated 指處理變數，即實驗組，基期 Before 代表實驗前，After 代表實驗後；表格中展示 Treated 和 Control

兩項交叉匯總資料情況。從上表可知，treated 和 Control 的兩兩組合共形成 4 個交叉儲存格，4 個格子的樣本量均大於 0，符合雙重差分模型的基本資料格式要求。

表 2 描述性統計圖

	Before 基期	After 實驗後	匯總
Control(控制組)	160	16	176
Treated(實驗組)	460	46	506
匯總	620	62	682

(二) DID 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下表 3 為 DID 模型結果匯總，模型匯總表格展示差分效應值資料，包括實驗前和實驗後，以及雙重差分 (Diff-in-Diff) 的效應值等；(Diff-in-Diff) 的效應值，Diff 效應值為 0.010 且呈現出 5% 水準的顯著性 ($p < 0.1$)，說明本次選取的時間序列資料具有顯著性，而其中 2020 年為轉捩點即疫情確實對於泰爾指數起到一定的作用。試驗前，Diff 效應值為 $-0.114 < 0$ 且呈現出 1% 水準的顯著性，意味著實驗前實驗組效應值明顯低於控制組效應值，實驗後控制組和實驗組效應值有著顯著性差異。針對實驗後(基期)，Diff 效應值為 $-0.105 < 0$ 且呈現出 5% 水準的顯著性，意味著實驗前實驗組效應值明顯低於控制組效應值。這與我們上述的研究設想相符合。

表 3 DID 模型結果匯總

Time	項	效應值 Y	標準誤	t	p
Before	Control(控制組)	0.344			
	Treated(實驗組)	0.230			
	Diff(T - C)	-0.14	0.013	-8.653	0.000**
After	Control(控制組)	0.275			
	Treated(實驗組)	0.171			
	Diff(T - C)	-0.105	0.042	-2.506	0.012*
Diff-in-Diff		0.010	0.044	0.220	0.026*

R²: 0.119, 調整 R²: 0.115

* p<0.05 ** p<0.01

(三) 平行趨勢檢驗

DID 模型通常需要進行平行趨勢檢驗，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的前提是在所研究因素實施之前，所有樣本收入結構具有相同變化趨勢，而疫情衝擊的收入結構變化效應可能會受到多種因素干擾，為避免干擾因素的影響，因此對模型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其檢驗方法有多種，包括 t 檢驗法、圖示法、交互項回歸法等。

下表 4-5 為 t 檢驗法平行趨勢檢驗，即針對實驗前資料時，處理變數與被解釋變數進行 t 檢驗，如果沒有呈現出顯著性則說明滿足“平行趨勢”檢驗，反之則說明不滿足“平行趨勢”檢驗；下表顯著性水準為 0.825，並沒有呈現出顯著性，對控制組樣本進行匹配處理並通過 logit 模型匹配得分，從而選擇與實驗組較為相似的對照組樣本重新進行 DID 分析。若所有變數在匹配後標準化偏差均明顯變小，表明匹配後兩組樣本無顯著差別，即證明兩者在匹配後不存在顯著差異且可進行 DID 分析，說明滿足了平行趨勢的檢驗。

表 4 t 檢驗(Before)

項	Control(控制組) n =160	Treated(實驗組) n =460	Diff	T	P
Y	0.344	0.23	-0.114	-9.711	0.825

* p<0.05 ** p<0.01

下表格展示實驗後,處理變數與研究變數進行t檢驗的結果;下表p值為0.01,呈現出5%水準的顯著性,則說明實驗後,控制組和實驗組有著顯著性差異。

表 5 t 檢驗(After)

項	Control(控制組) n =16	Treated(實驗組) n =46	Diff	t	p
Y	0.275	0.171	-0.105	-3.561	0.001**

* p<0.05 ** p<0.01

(四) OLS 回歸分析

之後對於該模型利用 OLS 回歸進行效應量檢驗;下表 6 可知, *treated*、*time*、*treated time*作為引數進行 OLS 回歸分析,從下表可以看出,模型 R 方值為 0.119,意味著*treated*、*time*、*treated time*可以理解為收入差距的 11.9%的變化原因。對模型進行 F 檢驗時,發現模型通過 F 檢驗($F = 30.504$, $P = 0.000 < 0.05$),也即說明*treated*、*time*、*treated time*至少有一項對收入差距產生影響關係,以及模型公式為收入差距 = $0.344 - 0.114 * treated - 0.069 * time + 0.10 * treated time$ 。總結分析可知:*treated time*會對收入差距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以及*treated*、*time*會對收入差距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由此可說明疫情對於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確實起到一定的影響。

表 6 OLS 回歸分析

	回歸係數	標準誤	t	p	R ²	調整 R ²	F
常數	0.344	0.011	30.272	0.000			
Treated	-0.114	0.013	-8.653	0.000			F (3 ,
Time	-0.069	0.038	-1.824	0.069	0.119	0.115	678)=30.504
							, p=0.000
Treated * Time	0.10	0.044	0.220	0.026			

五、結論與建議

論文以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為時代背景，從收入差距擴大的負面影響來研究控制居民收入差距的可行性與意義。²⁰從人類歷史上的經歷中不難看出，人均收入差別的出現必然會破壞社會平衡；而居民收入差別的出現必然會導致勞工之間在勞務交易市場中爭奪的不平等。而這些不平等也是城市居民對市場經濟發展機會不平等的主要方面，同時由於勞務交易市場的不平等所導致的收入差異也可以形成社會收入分配分化的"馬太效應"；居民收入差異的出現不利於擴大勞動供給，從而不利於國民經濟發展；權力上的平等並非無條件的，如果僅僅出現了收入差異，也會破壞權力平等；而收入差異過大時，會對社會資源配置效益和生產效益提高，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除上述影響之外，在疫情背景下對城鎮居民工資水準影響最大，對農民工薪資標準的影響則更為嚴重，同時也擴大了城市的人均收入差異，我們針對收入差距帶來的後果，為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著重就國家層次進行分析，提出以下幾點針對性對策。

(一) 充分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

²⁰ 林幼平，張樹.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綜述[J]. 經濟評論, 2001(4):56-60.

政府要加強調節收入結構的力量，繼續推進農村經濟振興策略，以推動達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在經濟高品質發展提高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政府必須發揮經濟政策的調節作用。一要在落實創新發展的理念中，推進社會共同富裕。二要在推動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過程中優化社會收入結構。不斷完善數位經濟體制，提高數位經濟治理水準，進一步發揮數字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動能效應。

（二）優化收入分配制度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時也要健全財稅制度，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解決分配上不公平的地方問題。收入有基礎，分配有保障，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實現。一是毫不動搖地穩固和發展公有制企業，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造，進一步健全混合所有制股權結構，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工資、人事管理、利潤分配機制等變革，以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運行效率與積極性；二要指導民企的發展，構建現代公司體制，進一步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增強民企的綜合實力；三是要健全以按勞分配制為基礎、各種利潤分配方式相輔相成的根本分配制度，對於形成我國獨具特色的企業收入分配體系。

（三）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涉及“總量”和“結構”兩方面。首先，為了減輕政府收入結構變動的壓力，當局可適當增加政府赤字規模率，以降低財政收支，從而增加政府財政開支，一定程度上可以擴大人民總體需求，提升消費信心，再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機會緩解了疫情造成失業等的就業緊張的局勢。在調節收支結構規模的同時也需要注重收支分配結構的改變。加強增減稅能力，其要階段性的為政府減少稅降費，緩建政府尤其是小微公司和個人的生活困難。再其次，對東中西區的禽流感重災區企業，應予以更多、更大幅度的稅費減免；另外，也要積

極利用國有債的正向功能，一方面要按照疫病防治需求增加國有債餘額，一方面要吸引國債資金進入與防疫有關的重要領域和關鍵行業，使得疫病防治經費真正的執行到位。

（四）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既要具有一般性，又要具有針對性。首先，公開市場運行的短期內總體目標是穩住市場經濟，而長期目標則是恢復經濟發展，因此金融機構在對流通領域加大信貸投放的同時，還應注重利用專項信貸的手段強化對小微企業的定向扶持，並以此定向推動相關中小企業的復工複產。其次，把握好政府降利的方式與強度，要以結構性政策為主，針對經濟受疫病衝擊後的不同階段，對不同的經濟地區採取不同的貨幣政策，以提高政府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準確性。更具體說來，通過降低利率緩解疫情重大災區的服務業和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經濟負擔。並逐步加強對珠三角、長三角等重製造業、服務業人口密集地區進行更大的貸款扶持。

（五）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安全網，如果缺少社會保險的穩定，就不能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同時，它又是社會公正的調節器，社會公正主要表現在利益層面，社區人員間並不是過分懸殊的貧富差距，只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總收入分配機制和行業競爭關係的相互聯繫，一定會產生了社區人員間在總收入劃分的不勻等，或差別懸殊，這就需要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來調節。公共服務民心，連接民心。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的重大舉措。因此，為了有效應對疫情背景下收入鴻溝的形成，並促進建立可持續的人民滿意的社會保險體系和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就一定要在改革創

新的基層服務提供方式上下功夫，建立符合社會扁平化服務要求的基礎供給制度，要構建起涵蓋全民、城鄉統籌的現代社會保險制度，不斷完善社會保險法律法規。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the income gap of residents

FAN Kaixuan LUO Yingying XU Tianqi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has had a noticeable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il index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in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income gap.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pidemic has played a role in widening the income gap among resident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COVID-19 income gap among residents; Thiel index;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鋼鐵行業數位化轉型下的財務風險研究—以 C 鋼為例

黃志林 李芊芊*

摘要：隨著數位化資訊化高速發展，數位化轉型是鋼鐵行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在數位化轉型下也存在一定的財務風險，如果加強財務風險管理，可對鋼鐵行業乃至整個製造業產生積極效應。本文描述了我國鋼鐵行業數位化轉型現狀並分析其存在的財務風險，通過分析 C 鋼轉型前後存在的內外部財務風險，為整個鋼鐵行業在數位化轉型下抵禦財務風險提供可行建議，以促進鋼鐵行業穩健發展、順利完成轉型，推動國民經濟增長。

關鍵詞：鋼鐵行業；數位化轉型；財務風險

一、前言

自 2006 年以來，我國製造業出口占商品的比重就趕超日本，越居世界第一。我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階段，製造業將長期內居於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地位。隨著資訊技術的不斷發展，傳統製造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方式必須變革，而防範其轉型過程中的財務風險尤為重要。

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在 2012 年首次提出了“數位化轉型”這一概念，2016 年杭州 G20 峰會發佈《G20 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指出數字經濟的三個階段——資訊數位化、業務數位化、數位化轉型，2021 年十四五規劃綱要提

* 黃志林，南昌大學科學技術學院會計系學生，研究方向涉及企業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領域；李芊芊，南昌大學科學技術學院會計系講師，研究領域涉及內部審計與風險管理、會計資訊披露等方向。

出“迎接數位時代，啟動資料要素潛能，推進網路強國建設，加快建設數位經濟、數位社會、數位政府，以數位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自此數位化轉型從企業層面上升為國家戰略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認為數位化轉型是利用新一代資訊技術，構建資料的採集、傳輸、存儲、處理和回饋的閉環，打通不同層級與不同行業間的資料壁壘，提高行業整體的運行效率，構建全新的數字經濟體系²。鋼鐵行業作為典型的傳統製造業，面臨著製造業共有的困境，如人口紅利削減、資源短缺、產業結構失衡、環境成本上升、供需不對稱等。對此，鋼鐵行業進行數位化轉型刻不容緩。對於這場全球化的變革，安妮特等人利用話語心理學分析了瑞典鋼鐵行業的數位化轉型理念³；迪恩等人專注於將數位技術應用與管理策略結合創新，通過比較德國、挪威及英國鋼鐵行業資料，分析其參與“綠色”創新的影響⁴；韓朋君從企業經營管理角度提出在數位化時代應該利用好資訊化工具打造智慧鋼鐵⁵；李新創院士結合中國鋼鐵實際發展情況從“雙碳”視角下提出鋼鐵行業數位化發展的相關建議⁶。

在數位化轉型背景下，鋼鐵行業間的競爭愈演愈烈，轉型過程中的財務風險不可忽視。本文將對整個鋼鐵行業進行總體財務風險分析，以C鋼鐵集團破產危機為例映射傳統鋼鐵製造業全流程數位化轉型下的財務風險。

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引自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傳統產業數位化轉型的模型和路徑[R]. 2018-03.

³ Hallin A, Lindell E, Jonsson B,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ower relations. 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 of digitalization in the Swedish steel industry[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2, 38(1): 101183.

⁴ Stroud D, Evans C, Weinel M. Innovating for energy efficiency: Digital gamification in the European steel industry[J].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20, 26(4): 419-437.

⁵ 韓朋君. 打造智慧冶金，助力鋼鐵企業數位化轉型[J]. 冶金財會, 2019, 38(09):23-25.

⁶ “雙碳”戰略下，鋼鐵行業數位化發展如何破局[J]. 大數據時代, 2022(01):36-44.

二、財務風險指標體系

（一）企業財務風險

企業財務風險作為企業特有風險，主要表現為在特定時期內企業負債比重過高導致無法償債的風險。出現財務風險後若不及時採取有效措施，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企業破產清算。在風險控制過程中，選擇合理有效的措施控制財務活動，能降低財務風險，保證企業的利益及正常運營。

（二）財務風險衡量指標

財務風險指標是針對企業廣義的財務活動，通過設置相應的敏感性指標觀察其一定時期內的變化並對其未來可能面臨的財務風險進行監測預報的財務分析方法。秉持著預見性、靈敏性、配合性和穩定性原則，設定並分析財務風險指標指數識別企業潛在財務風險，為管理者針對企業經營管理決策提供依據。衡量企業財務風險的指標主要有：

1. 償債能力

償債能力指企業償還到期債務的能力，主要衡量指標包括速動比率、現金流量比率和資產負債率等。速動比率靜態反映企業短期償債能力，比率越高，則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越強。現金流量比率動態反映企業短期償債能力，比率越高，企業償付流動負債的能力越強。資產負債率反映企業長期償債能力，一般為40%~60%，當比率高於100%則企業資不抵債，有瀕臨破產的風險，若比率過低則企業機會成本上升，未充分發揮財務杠杆效力。

2. 營運能力

營運能力反映企業的資金運轉狀況及經營管理水準，主要衡量指標包括應收

賬款周轉率和存貨周轉率等。應收賬款和存貨作為企業重要的流動資產，變現能力較強，若周轉率太低會則佔用企業大量資金，影響企業資金周轉，使企業財務風險增加。

3.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指企業獲取利潤的能力，主要衡量指標包括淨利潤率和總資產報酬率等。企業的籌資、投資、經營活動和稅收政策都會導致淨利潤發生變化，通過淨利潤率和總資產報酬率能反映企業投入產出比狀況和對股權投資的回報能力和銷售業務獲取利潤的能力，比率越高，則說明企業盈利能力越強。

4. z-score 模型⁷

z-score 作為企業財務風險綜合評價指數，在 1968 年由 Altman 教授提出。面對單變數指標的局限性，z-score 以多變數綜合描述企業財務風險水準。對於製造業上市公司， $z = 1.2x_1 + 1.4x_2 + 3.3x_3 + 0.6x_4 + 0.999x_5$ ⁸， $z < 1.81$ 為危機區， $1.81 \leq z < 2.675$ 為灰色區， $2.675 < z$ 為安全區；對於製造業非上市公司， $z = 0.717x_1 + 0.847x_2 + 3.107x_3 + 0.420x_4 + 0.998x_5$ ， $z < 1.23$ 為危機區， $1.23 \leq z < 2.9$ 為灰色區， $2.9 < z$ 為安全區。對於企業來說，z-score 越高，說明企業的經營管理狀況好，獲利能力強，財務風險低。

⁷ Edward I. Altman. Financial ratios,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68, 23(4). pp. 589-609.

⁸ $x_1 = (\text{流動資產} - \text{流動負債}) / \text{總資產}$ ， $x_2 = \text{留存收益} / \text{總資產}$ ， $x_3 = \text{息稅前利潤} / \text{總資產}$ ， $x_4 = \text{股票市價} / \text{負債帳面價值}$ ， $x_5 = \text{銷售收入} / \text{總資產}$ 。

三、案例分析—C 鋼

(一) 公司介紹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C 鋼）於 1997 年 8 月 11 日登記註冊，同年 10 月 17 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1998 年 12 月 7 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准，成為外商投資企業，2007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上市⁹。2017 年年底，C 鋼在經營不善的情況下完成司法重整，企業性質由國有控股轉變為混合所有制。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加工、銷售板材、型材、線材、棒材、鋼坯、薄板帶等。

(二) 公司困境回顧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C 鋼合併報表營業收入為 44.14 億元，營業總成本為 97.99 億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 -46.85 億元，母公司收入為 38.89 億元，淨利潤為 -46.84 億元；C 鋼合併報表資產總額為 364.38 億元，負債總額為 365.45 億元，淨資產為 -1.07 億元；母公司資產總額為 364.38 億元，負債總額為 366.38 億元，淨資產為 -2 億元。因連續兩年虧損，C 鋼股票於 2017 年 4 月 5 日被上交所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經債權人申請，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 2017 年 7 月 3 日依法裁定受理 C 鋼重整案¹⁰。其破產重整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 產品價格下跌，原材料價格上漲

在鋼鐵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為優化產品結構，我國粗鋼產量持續下降，但鋼鐵供過於求的矛盾依然突出。由於我國鋼鐵產業呈現出技術水準低、集中度低、內部惡意競爭等特徵，導致市場需求疲軟，進一步使產品價格下降。而 C 鋼生

⁹ 重慶鋼鐵，引自 <http://www.cqgt.cn/#page1>

¹⁰ (2017)渝 01 破申 5 號《民事裁定書》

<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pcws/wsxq?id=D86B1081349A5589C14AF87EFF0CA5D4>

產的產品並沒有較大優勢，銷售價格降幅顯著，2016年平均銷售價格僅為1914元/噸。另一方面，鋼鐵鍛造的原材料，如鐵礦石、廢鋼、生鐵、煤炭等價格不斷上升，且多數鐵礦石需要依賴海外進口。面對這種情況，C鋼連年主營業務成本高於主營業務收入，使得C鋼盈利能力下降，財務風險增加。

2. 融資困難，負債率持續增加

鋼鐵行業舉債發展普遍，從圖1可以看出，C鋼的資產和負債規模相當，2011-2016年資產負債率均在80%左右，到2016年末，更是達到100.29%的峰值，其中C鋼資產主要以非流動資產為主，占比93.28%，負債以流動負債（主要是短期借款）為主，占比71.50%，面臨嚴重的資不抵債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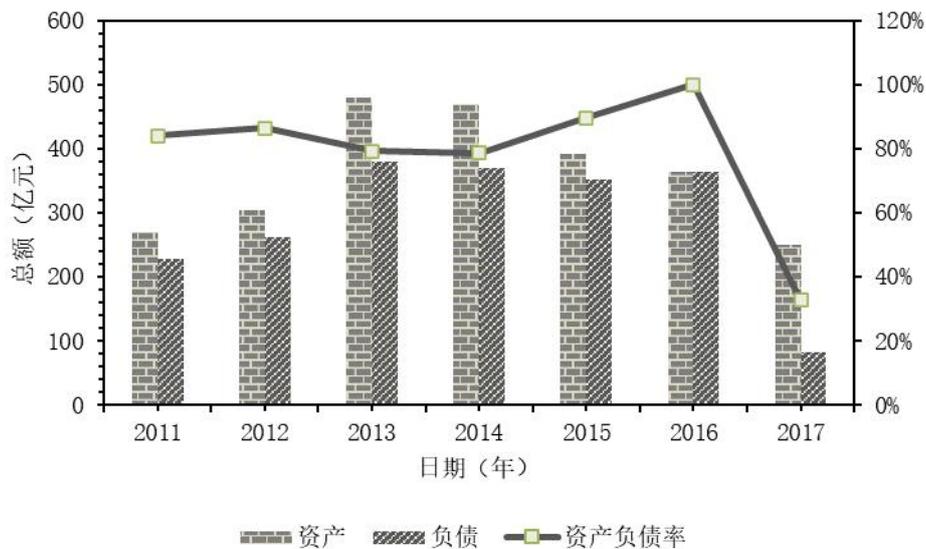


圖1 2011-2017年C鋼資本負債結構

資料來源：C鋼2011-2017財報

從2011-2016年現金流量表資料來看，如表1所示，C鋼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整體呈上升再下降趨勢，至2016年末已經連續2年為負，一定程度上說明了C鋼已經入不敷出；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持續為負值，主要是購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非流動資產引起，說明C鋼在廠房設備上投入高，資金周轉慢；其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來自舉債，而現金流出主要是償還債務，到

2016 年末，C 鋼籌資活動淨現金流高達 14.23 億元，此時其維持經營的主要方式是對外舉債，經營風險過大。

表 1 2011-2016 年 C 鋼現金流量表資金活動

現金淨流量（億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經營活動	4.51	53.15	19.55	27.97	-16.78	-4.49
投資活動	-24.60	-17.94	-20.85	-15.59	6.13	-2.64
籌資活動	17.73	-14.28	-27.45	-16.12	9.47	14.23

資料來源：C 鋼 2011-2016 財報

3. 內部控制冗餘

在管理決策方面，C 鋼控股股東為國有獨資企業重慶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但實際最高決策權在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決策鏈條長、效率低。在人員聘任方面，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直接由行政任命產生，不完全符合人員選聘的任人唯賢、用人所長原則，一定程度上會挫傷內部成員的工作積極性，增加代理成本¹¹，使得企業治理效率低。

（三）轉型後風險研究

2017 年 11 月 1 日，C 鋼管理人與重慶市長壽鋼鐵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壽鋼鐵）簽訂協定，長壽鋼鐵成為該破產重整的重組方。至 2017 年年末，C 鋼已通過債轉股、拍賣資產等方式清償債務完成破產重整¹²，自此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積極貫徹“提規模、調結構、降成本”的生產經營方針，實現高效率、低成本的發展。破產重整後，C 鋼的各項財務指標都有較大的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也有所提升。到 2020 年，C 鋼圍繞“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鋼鐵引領者”戰略目標，全面佈局智慧製造，啟動 5G+工業互聯網應用項目，推動數位化轉型¹³。

¹¹ 代理成本是指股東與經理人之間訂立、管理、實施那些或明或暗的合約的全部費用。由於資訊的不對稱，股東無法知道經理人是在為實現股東收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還是已經滿足平穩的投資收益率以及緩慢增長的財務指標。

¹²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3/id/3219395.shtml>.

¹³ 上游新聞，“智”在巴渝|“傳統製造”邁向“數位智造”重慶鋼鐵啟動 5G+工業互聯網應用項

在轉型過程中，其可能面對的財務風險仍不可忽視。

根據 C 鋼 2017-2022 年三季度財務報告，如圖 2 所示，從償債能力來看，C 鋼資產負債率整體處於 40% 左右，低於鋼鐵行業平均負債率水準，到 2021 年末為 47.96%；速動比率及現金流量比例均低於 1，總體上 C 鋼短期償債能力較弱，長期償債能力較強。從營運能力來看，C 鋼應收賬款周轉率較高，與存貨周轉率成反比關係，一定程度上會限制銷售量的擴大，影響企業的盈利水準，但自 2020 年後加速下降，新冠疫情引起的產能下降及資金不活躍是其影響因素之一。從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來看，C 鋼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進行數位化轉型，對接客戶，淨利潤率和總資產報酬率開始回升並增長，但比率變動波動性較大，獲利不確定性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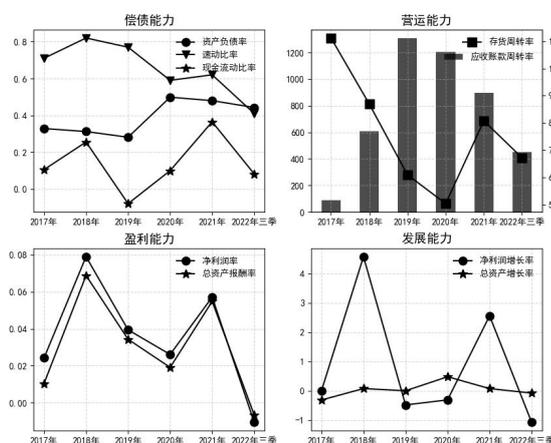


圖 2 C 鋼 2017-2022 年三季度財務能力分析

資料來源：C 鋼 2017-2022 年三季度財報

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簡稱寶鋼）作為數位化轉型的龍頭之一，採取 EVI（Early Vendor Involvement）模式，聚焦客戶需求，全面介入客戶從研發到量產的各個環節，創造客戶價值¹⁴。通過對比 C 鋼和寶鋼 2017 年-2022 年三

目 [EB/OL]. (2020-9-7)[2022-11-18]. https://www.sohu.com/a/416925695_120388781.

¹⁴ 寶鋼 EVI 的創新商業模式 [N]. 世界金屬導報，2015 年 11 月 9 日。

季度的 z-score，如表 2 所示，可以發現 C 鋼 z-score 要低於寶鋼，寶鋼均處於灰色區，而 C 鋼 2020 年以來，z-score 降至 0.777，財務風險較大，到 2022 年第三季，其 z-score 仍未跳出危機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鋼鐵行業固有的短期償債能力弱，且 C 鋼面臨債務危機不久，以前年度虧損較多，使得未分配利潤負值較大，企業積累利潤少。

表 2 2017-2022 年三季度各公司 z-score 對比描述

鋼企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三季
C 鋼	1.412	1.918	1.974	0.777	1.277	0.783
寶鋼	2.019	2.079	1.944	1.970	2.035	1.742

資料來源：C 鋼與寶鋼 2017-2022 財報

除此之外，C 鋼潛在的財務風險還包括以下兩方面：

(1) 內部風險。數位化轉型是一個長期漸進的綜合工程，C 鋼整體核心技術與工藝資料來源較不完善，一些關鍵軟體、底層作業系統等核心技術被國外企業壟斷，在數位化轉型過程中，需要墊付較大的資金成本和時間成本，使得短期償債風險增加，現金流動性降低，存在一定的數位化轉型失利風險。

(2) 外部風險。隨著國家“雙碳”戰略的施行，C 鋼的環保成本隨之上升。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鋼鐵市場競爭激烈，焦炭、鐵礦石等原材料市場價格變化幅度大，截止 2021 年下半年焦煤價格最高為 4100 元/噸，接近于鋼材當年平均售價。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 C 鋼 2021 年度減利 77.52 億元。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不斷反復、房地產市場調整、國內消費需求減弱導致下游產業需求放緩，給企業經營帶來風險。

四、鋼鐵行業財務風險的防範建議

(一) 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品質

產業數位化轉型的興起，對以往的傳統鋼鐵企業的產業結構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國鋼企應該在傳統鋼鐵行業結構的基礎上對現有行業的產業結構進行細分優化，使我國的鋼鐵產業符合我國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需求，達到企業財務風險防範的目的。“十四五”是我國鋼鐵工業整體實現“由大到強的”的產業結構品質變革的關鍵時點，我國應該從：嚴格執行禁止新增產能、推動鋼鐵行業低碳綠色發展、促進鋼鐵行業兼併重組、鼓勵鋼鐵行業優化佈局、提升鋼鐵行業發展品質水準這五點來推動產業的整體結構改革，促進企業產業結構的良性發展¹⁵。在產能控制上，堅定減產能、控產量、重品質的改革理念，淘汰規模小、產量低、成品品質差的劣質爐，在大氣污染重點防治區嚴禁增加鋼鐵產能總量，未完成鋼鐵產能總量控制目標的省（區、市），不得接受其他地區出讓的鋼鐵產能，符合條件的企業積極推進鋼鐵企業產能置換¹⁶的實施。在低碳發展上，遵循迴圈經濟¹⁷發展思路，採用全生命週期的理念進行生態化設計，延長鋼鐵的使用壽命，拓寬鋼鐵的使用場景。2021年中國鋼鐵企業的碳排放約占中國總體碳排放的15%，是國內碳排放最高的製造行業¹⁸。為了達到減少碳排放達到碳中和的總體目標，提升鋼鐵迴圈使用效率，我國鋼企可以從產能升級和替換、原輔料優化、國內回收等幾個重要方面來著手實施，通過一系列的多流程多環節的優化，減少環境履

¹⁵ 衛雅琦, 馮延召. 網易新聞. “十四五”鋼產業結構怎麼調? 國家發改委明確五個方面 [EB/OL]. (2021-6-19) [2022-11-20].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CS5SVF00514TVLI.html>.

¹⁶ 產能置換：是指通過市場化手段，淘汰落後產能，實現產業升級，進而控制行業產能。

¹⁷ 迴圈經濟：指以資源節約和迴圈利用為特徵、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強調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回饋式流程。其特徵是低開採、高利用、低排放。

¹⁸ 華強森等. 麥肯錫. “中國加速邁向碳中和”鋼鐵篇：鋼鐵行業碳減排路徑 [EB/OL]. (2022-10-12) [2022-11-20]. <https://www.mckinsey.com.cn/>.

約成本，達到減排目標。在兼併重組上，本著企業主體、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原則，加大推進企業高品質兼併重組的進行，由企業帶頭實行，政府提供公平公正公開的平臺，保持合併流程的合法化和透明化，打破鋼企“小、散、亂”的舊格局，提升產業集中度。

（二）加強營運建設，提高投資效益

受市場環境制約，鋼鐵類產品的銷售量經常出現波動，易引起產品滯銷，為減少市場週期性的影響，在產品的生產計畫上做好市場調研、市場需求分析，合理安排庫存，保持產品出入庫動態平衡以達到防止庫存積壓，提高企業變現能力的目的。

應收賬款產生的壞賬對一個企業的資金鏈的流動性影響巨大。為避免壞賬帶來的財務風險，企業可以側重於應收賬款風險的識別，在應收賬款形成的事前、事後和事中形成有效的科學管控，對各個企業的違約風險利用以往經驗，結合該企業近期發展狀況，對不同企業基於償債能力進行評級分類，以此來綜合判定本企業的應收賬款安全程度。

在企業的營運中，面對投資風險給企業資金鏈帶來的影響，在鋼鐵企業購買海外礦場等投資行為中，管理者應該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整體評估，預測企業對投資風險的承受能力，在戰略層面整體把握住投資時機、投資方向等關鍵要素，對企業財務安全負責。

（三）加快數位化轉型，建立規範內控體系

以 C 鋼的數位化轉型為例，企業可採取設立專項基金，成立數位化轉型部等專門組織等措施，通過企業負責人親自下場領導，加速推進數位化轉型的建設進程，達到從整體上優化企業、活化企業的目的。

對於 C 鋼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短期償債能力較弱的問題，企業應該注意預留足夠的流動資產來保證短期債務的償付，避免大量的資金用於投資長期資產使得企業出現債務違約風險，使該企業的流動速率和速動比率更加接近標準水準。同時進一步加強企業資產負債率的管理，繼續保持良好的資產負債比例，促進企業的穩步發展。

在企業的內控調整上，下放行政權、決策權，以能力、品德等指標來決定企業領導層的人選，縮短決策鏈條，提高決策的效率。同時將管理人員的回報與企業的績效掛鉤，採用股權激勵等政策充分調動管理人員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在內控建設工作的具體開展上，著重從規章制度、組織結構、程式設計、實施步驟、實施方式、能力建設等方面入手，穩步開展工作。在工作中優先強調流程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在工作中遇到問題該怎樣處理，出現麻煩該找誰解決，發生損失該由誰來承擔，都應該制定嚴格的制度體系，從人、物、責三個方面進行落實，建立起結構完善、制度標準的內控體系，以建成符合數位化轉型後需求的內部控制體系，預防過程中的財務風險。

五、結論

對於傳統鋼鐵製造業來說，在大資料資訊化時代，數位化轉型是必然選擇。無論是轉型前還是轉型過程中的鋼鐵企業都需要進行財務風險管理，面對鋼鐵行業轉型下存在的如運營、籌資、投資等過程中的內外部風險，本文提出相關建議，包括完善產業結構、提高產品品質、加強營運建設、增強重大事件的防範意識等，以提高鋼鐵企業資金的安全性，助力企業順利完成數位化轉型。

Research on financial risk of steel industry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Take C steel for example

ZHILIN HUANG QIANQIAN L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eel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certain financial risk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f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is strengthened, it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teel industry and even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teel industry and analyzes its existing financial risks.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nancial risk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 Steel, it provide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entire steel industry to resist financial risks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steel industry,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teel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nancial risk

關於非營利性組織參與社區養老治理的研究

程研 謝欣彤*

摘要：目前我國呈現嚴峻的人口老齡化態勢，社會面臨老年人口養老、醫療等挑戰，在傳統的社區養老模式下，日益增長的老年養老需求無法滿足，亟需提高養老服務的供給與品質。非營利組織作為社會治理的協力廠商機構，在參與社區養老治理中，能有效承接政府政策體系，利用社區資源，以更貼近基層群眾、更多元、更靈活的服務方式滿足老年群體的生活需求，助力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整合，深化社區多元共治格局，推進社區養老治理規劃。然而，在發展健全過程中，參與社區養老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在供給平衡、管理體制、運行效率，人員組織和安排等方面仍存在欠缺和不足。本篇文章將結合實際案例和理論分析，從以上方面提供應對挑戰的有效路徑，聚焦於如何提高非營利組織管理的有效性，為促進我國非營利組織與社區互動機制的成熟提供可行性建議，從而助力實現習總書記十九大報告中“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弱有所扶”的目標，保障和發展基層人民民主。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管理；社區養老；社會福利；公共資源；人力資源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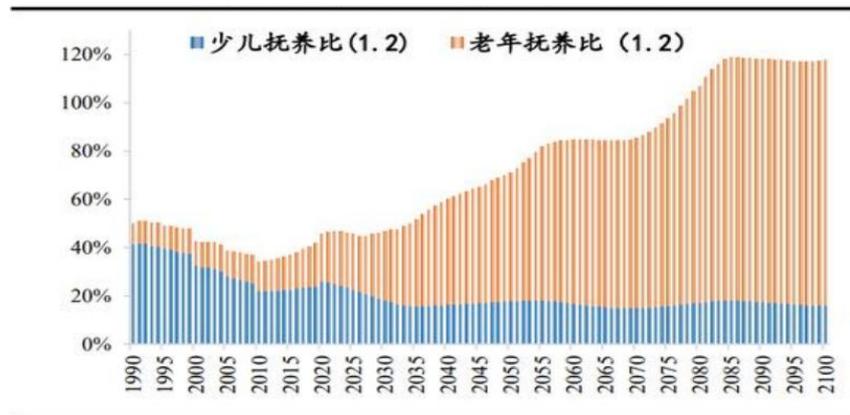
一、前言

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規模擴大，政府當前面臨巨大的老齡服務供給壓力。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60歲以上人口達到約2.64億，占總人

* 程研，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謝欣彤院校；謝欣彤，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口 18.7%，相比十年前上升 5.44 個百分點，且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將持續面臨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的嚴峻趨勢，老年撫養比持續上升，社會養老負擔不斷加重。

表 1 老年撫養比上行（假定生育率 1.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年鑒》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

面對如何安置規模龐大的老年人口，當前主要有三種方式：傳統以子女照顧和贍養老人的家庭養老，以養老院等為老人提供日常起居護理的機構式養老，以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社區建立養老中心為主要方式的社區養老。在計劃生育政策下，目前主要承擔社會養老責任的人群，主要是以獨生子女為主的小型家庭結構；而隨著城鎮化過程加快，愈多年輕人遠遷異地就業，無暇撫養老人，家庭養老受到嚴重的現實衝擊；加之機構養老在我國發展尚未健全，養老機構品質層次不齊，面臨設施不完善、選址和定價不合理、專業護理人才不足等局限性。近年來，新型社區養老模式日益受到推崇，即在政府主導下，社區與非營利組織協同建立養老服務中心，為獨居老人提供醫療服務和日常起居護理。

非營利組織作為有別於政府和市場營利組織以外提供公共服務和產品的第三部門，在社區治理以及公共資源的提供發揮卓越作用，可有效緩解日益增長的老齡服務需求與供給的矛盾，減少政府財政支出和負擔。關於非營利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起源，英國學者羅斯是最早提出福利多元主義的學者，1986年在福利多元理論中，他提出建立以國家、市場、私人和家庭為三分體系的多元福利基本

框架，並突出多元主體在提供公共福利和資源方面的協同作用；後伊瓦斯對該分析框架有所補充，他將不同主體置於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背景下考慮，主張將原有的國家、社會及家庭三方具體化為對應的經濟組織、價值和社會成員關係；學者詹森（1999）對福利多元主義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和發展，他利用四分法將福利供給者四分為國家、市場、家庭和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並強調家庭及協力廠商組織在福利供給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國家、市場和協力廠商組織的協同合作，更有助於提供符合公民需求的、高效的、全面的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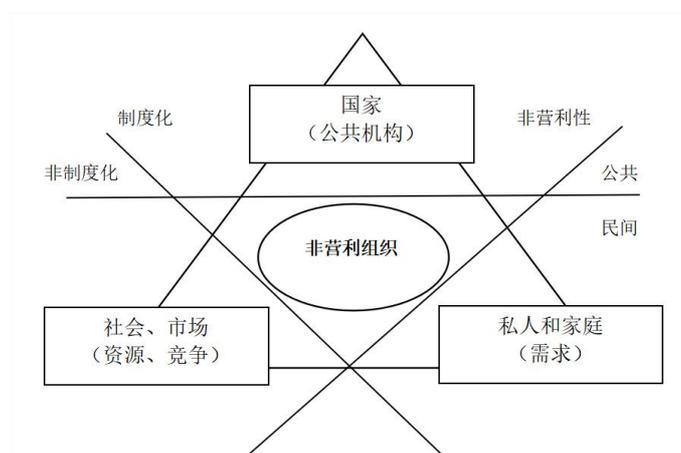


圖 1 福利三角框架下的非盈利組織

此外，公共行政領域的代表人物克裡斯託福也主張多元主體共治，權力應從政府最終走向社會，政府應將與協力廠商及社會組織合作中所面臨的供給壓力分攤到各個市場和非營利組織中，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效率。同時，這也與當代社會積極推進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政策密切聯繫在一起。現代社會中的福利供給主體是多元化的，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供給者，而是供給服務的協助者。在社會組織的協調參與下，由社會成員親身參與社會福利供給。

在我國，借鑒西方多元共治體系的經驗，非營利組織進入社會公共服務領域正式開始於 2003 年，在中國主要城市進行試點經營，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簽訂合同。至 2013 年，政府已將社會治理議程的重點轉移到社區層面，發揮社會組織

作為社區參與者的角色，結合社區在養老服務中已有的生動實踐，形成以老年人家庭為核心、社區為依託的社區養老體系。非營利組織與社區建立合作關係，政府為其建設提供資金支持，這種多元化社區養老模式將成為未來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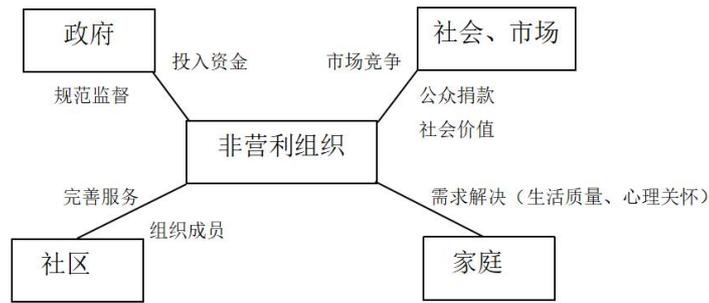


圖 2 多元體系下的社區養老模式

二、我國養老的發展歷史及不同養老形式的界定

(一)我國養老服務的發展歷史

從 1949 年新中國成立至今，這 73 年亦是我國養老事業改革創新、由初步發展到逐漸成熟的漫長過程，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四個階段：

1. 第一階段：孕育發展階段（1949-1977 年）

在計劃經濟的政策背景下，政府主要針對生活困難的老年人解決其照護問題，成立社會福利性養老機構，出現最早一批城市和農村養老機構，對入住的機構的老年優撫對象（包括無親屬照顧的烈屬老人、退伍孤老軍人）提供生活照顧型養老服務。此時，養老服務處於萌芽階段，位於社會福利領域，但並未形成獨立的社會概念和服務形式，

2. 第二階段：探索發展階段（1978-1999 年）

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政府繼續完善由其主導下的養老服務，同時關注社會當前面對的養老問題，誕生了一系列與養老服務相關的老齡工作機構及法律法規；

¹關於養老機構的管理條例²正式出現，並於1982年成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老齡養老服務和機構得到規範化發展，由中央到地方的網路化體系初步形成；養老品質也逐步提升；養老服務的範圍得到拓展³，服務方式由單一化生活照護向日常居住、醫療康復、生活護理、娛樂活動等多元化轉變。

3. 第三階段：體系化發展（2000-2011年）

1999年，根據聯合國制定的標準，我國正式步入人口老齡化國家，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黨和政府積極採取一系列應對方案。從2000年起，社會各界逐漸意識到老年化的問題，開始重視居家養老服務，同時國家積極開展老齡工作，加強老年服務的頂層設計，建立並逐步發展養老服務體系。

4. 第四階段：快速發展時代（2012年至今）

隨著我國養老服務進入新時代，政府堅持在“保基本、兜底線”的基礎上，繼續開展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工作，並且高度重視政策法規在體系中的作用，推動健全滿足群眾多元化需求的老年服務產業，以標準化、品質化的規範體制來推進養老服務的市場化改革。

（二）老齡化社會中養老的三種模式

1. 家庭養老

¹ 我國政府於1982年制定了歷史上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

² 1998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關於加快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意見》；民政部等制定《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範》《農村敬老院管理暫行辦法》等一系列有利於養老服務機構發展和管理規範的制度。

³ 養老服務物件從傳統“三無”（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人和撫養人）向社會上有養老需求的老人和家庭開放。

家庭養老是我國最傳統的養老模式，即以家庭為單位，由各自成員承擔贍養老人責任的社會分散型養老模式。這種以家庭血緣關係為紐帶的養老模式，在法律責任和道德義務層面上要求贍養者盡責，滿足傳統家庭對三代同堂的美好夙願，仍是我國目前主要的養老形式。但隨著社會老年撫養比上升，養老負擔加重，一對夫婦需要承擔兩家老人的贍養負擔，且易導致家庭糾紛。家庭養老對於久病臥床的老年家庭而言，醫療條件不足，為子女帶來的經濟壓力較大。

2. 機構養老

機構養老其最顯著的特點是“集中養老”，老年人由養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以及托老所等社會專業的養老機構看護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家庭養老中缺少的功能。但多數機構醫養結合程度較低，專業人員隊伍缺乏；且大部分機構建設在主城區之外，超出老年人原有的生活區域，資源配置效率低。

3. 社區養老

社區養老，即以家庭為核心及主要單位，社區為依託，依靠社區服務的資源，以法律法規和制度為保障，引入專業的社會力量參與，向社區居民供給專業性的社區養老服務，是一種複合型社會養老方式。它在養老地點、服務供給主體上，綜合家庭養老與機構養老兩種模式的優點，更契合老年人的生活習慣，通過打造和睦的鄰里關係，能給予老年群體所需的親情慰藉和精神依託，從而滿足不同年齡段的老年人對於基本養老服務，如康復理療、健康醫療保健、娛樂愛好、社區互動等多元化的養老服務方式的需要。非營利性組織參與社區養老的“融合式養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覆蓋面更廣，推行方式更為可行，且與其他養老模式實現資源優勢互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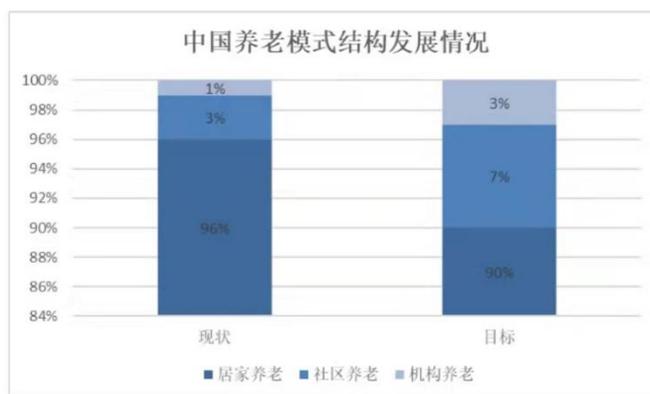


圖 3 我國目前三種養老模式的比列結構分佈

資料來源：千際投行《2021 年養老產業發展研究報告》

三、目前非營利組織參與社區養老的現存問題

社區養老作為新型的養老模式，為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品質和生活品質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徑。目前，非營利組織主要通過委託承包的方式參與社區養老，即政府機構為社區養老中心建設提供經費，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向社會公示服務的價格、數量等具體資訊，非營利組織以競標的方式承包政府委託的服務專案，在後期運營中招收志願者，通過社區福利志願活動，以多種援助方式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不足。非營利組織由於其福利性質，只收取維持日常運營的低廉費用。同時，競標的方式有助於不同非營利組織在價格競爭中，以更低的價格達成協議，提高服務的效率和品質。政府以行政手段加以管理和監督，為非營利組織在制度和法律層面提供了有力保障。

因而，政府、市場、社區以及非營利組織成員在整個服務體系中發揮著多元化主體作用。但由於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時長較短，參與社區養老的管理機制尚未完善，從主體角度介入，可發現在其實際運營過程中存在明顯供求平衡問題，組織內部管理問題以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互動機制方面存在不足。

(一) 參與社區養老的非營利組織存在資金供應缺乏問題，與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形成不平衡

我國作為世界上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老齡化是我國的重要國情之一。受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下降、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等因素的影響，我國老齡人口數量持續加速增長，根據有關學者推測，205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口規模將超過一億，這為中國現行的養老服務帶來了巨大壓力。

非營利養老機構作為基本養老服務的提供者，在我國起步較晚，發展速度較為緩慢，隨著人口和資源問題的凸顯，供應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且目前我國的社區養老主要依靠政府資助，個人繳納的費用不高，所獲慈善捐助較少，欠缺社會力量的參與和投資。據統計，中央財政於2012年至2020年，累計投入271億元支援社會養老服務設施建設，養老服務補貼和失能老年人補貼分別惠及535萬、81.3萬老年人，補助額度的上升加重了財政收支負擔，而現實需求得到養老服務的人數規模以及對服務設施標準化的要求仍然與日俱增，呈現明顯的不平衡與資金缺口。

表2 養老服務體系的財政性資金規模及缺口（單位：億元）

年份	政府承担的养老投资需求	公共财政支出	财政性资金总计	资金缺口
2013	1153	111.8	240	-913
2014	1210	122.4	284	-926
2015	1193	133.4	332	-861
2016	1267	181.3	420	-847
2017	1257	196.6	490	-767
2018	1216	212.5	570	-645
2019	1142	229	662	-480
2020	1040	246.2	766	-274

注：政府承担的养老投资需求的详细测算请参见2014年11月24日宏观经济信息文章

資料來源：經濟預測部(2015年)

(二) 當前社區非營利組織在服務供給與老年人健康與精神需求之間存在較大鴻溝

表 3 社區養老服務的需求、供給內容及占比

社區養老服務需求		社區養老服務供給			
需求內容	老年人需求比例	生活類服務	社區提供比例	醫療康復類服務	社區提供比例
上門看病	38.10%	法律或維權	33%	健康講座	37.50%
上門做家務	12.10%	殯葬	21.80%	上門看病	35%
康復護理	11.30%	托老	15.60%	心理諮詢	15.50%
心理諮詢或聊天解悶	10.60%	家政	15.20%	康復	12.30%
健康教育	10.30%	老年餐桌	5.90%	上門護理	7%
日間照料	9.40%	陪同購物	2.20%	陪同看病	5.60%
助餐	8.50%	老年婚介	1.60%	家庭病床	4.50%
助浴	4.50%	——	——	康復輔具租賃或出售	3.90%
老年輔具用品租賃	3.70%	——	——	——	——

資料來源：《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2015年)

表 4 社區養老服務供需差異基本情況表

變量	自評生活質量			
	性別	生活質量好、很好	一般、不好、很不好	總人數
個人護理服務 (認為供需)一致		2788 (46.4)	917 (36.7)	3705
	不一致	3219 (53.6)	1584 (63.3)	4803
家訪服務	一致	2946 (49.0)	1074 (42.9)	4020
	不一致	3061 (51.0)	1427 (63.3)	4488
心理諮詢服務	一致	2749 (45.8)	944 (37.7)	3693
	不一致	3258 (54.2)	1557 (62.3)	4815
日常購物服務	一致	3012 (51.1)	1058 (42.3)	4070
	不一致	2995 (54.2)	1443 (57.7)	4438

續表 4 社區養老服務供需差異基本情況表

變量	自評生活質量			
	性別	生活質量好、很好	一般、不好、很不好	總人數
社會和娛樂服務	一致	3016 (50.2)	1142 (45.7)	4158
	不一致	2991 (49.8)	1359 (54.3)	4350
法律援助服務	一致	3110 (58.2)	1154 (46.3)	4264
	不一致	2897 (48.2)	1347 (53.9)	4244
醫療和保健服務	一致	3496 (58.2)	1307 (52.3)	4803
	不一致	2511 (41.8)	1347 (53.9)	1598
社會關係服務	一致	3452 (57.5)	1311 (52.4)	4763
	不一致	2555 (42.5)	1190 (47.6)	3745

資料來源：中國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CLHLS)

根據 CLHLS 調查⁴，資料呈現了社區養老服務供需⁵差異與老年人生活品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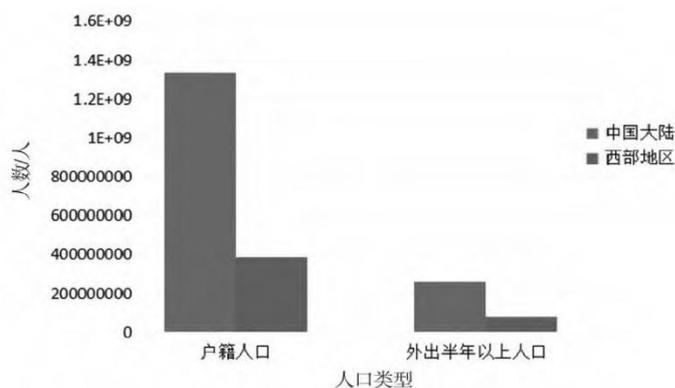
⁴ 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是由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研究院組

的關係，即在社區提供的養老服務方式與需求達成一致時，老年人生活品質明顯得到提高。但存在的問題是：在各項服務中，除法律援助服務、醫療保健服務和社會關係服務以外，評估認為供需一致的總人數要遠遠低於供需不匹配的總人數；而在個人護理服務⁶、家訪服務、心理諮詢服務、日常購物服務、社會與娛樂服務等方面，仍需改進供給匹配度，提高服務品質，問題的原因可能在於部分社區養老機構的服務類型單一，供給數量不足，或服務品質不理想。其中，在個人護理服務以及心理諮詢服務方面，供需鴻溝最為明顯。

（三）參與社區養老的非營利組織面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困境

非營利組織在社區養老方面受較大的區域限制。在西部貧困的農村地區，農村老人普遍對土地和家鄉有強烈的歸屬感，不願跟隨子女移居城市，城鎮化帶來的農村空心化導致年輕勞動力流失，農村家庭的空巢化日趨嚴重，老齡化養老服務需求極為迫切。

表 5 中國大陸與西部地區人口類型對比示意圖



在欠發達地區如西部地區，資源設施相對較落後，非營利機構的服務能力和品質水準有所下降，以陝西省延安市為例，養老機構普遍規模較小，專業人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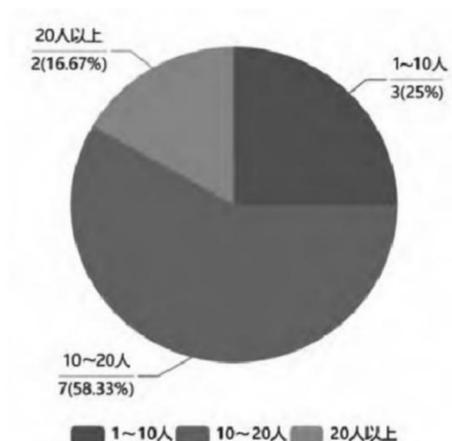
織的老年人追蹤調查，範圍覆蓋全國 23 個省市自治區，調查對象為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和 34-64 歲成年子女，最近一次追蹤調查為 2017-2018 年。

⁵ 本研究中老年人社區養老服務主要包括 8 種類型：個人護理服務、家訪服務、心理諮詢服務、日常購物服務、社會與娛樂服務、法律援助服務、醫療保健教育服務、社會關係服務。

⁶ 本研究中的個人護理主要是指社區護理機構對老年人的日常照顧。

量較低。

表 6 陝西省延安市養老機構服務人員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宋晨翔、王亞男、李和平，《西部地區中小城市養老服務行業供需現狀調查與分析——以西部地區延安市為例》

相較於擁有充足財力和相對健全管理體制的地區，如發達省份和中部、東部一二線城市，在富有支持性的整體環境下，資金投入相對充足，非營利組織的服務能力較強。而在西部農村地區，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幾乎處於空白狀態，社區養老服務資源投入效率低。且由於農村地區居住較分散，碎片化明顯，建設集中式的社區養老中心難度較大。

（四）社區非營利組織在管理體制和運行效率方面存在不足

社區非營利養老機構的內部治理能力決定其內部管理效率以及對外部資源的整合利用能力，關係到提供服務的品質高低和社會效益。行政力量的過度干預反而不利於非營利養老機構治理能力的提升，最終對社會效益產生負面影響。

長期以來，非營利組織依賴於政府資金進行建設，受到街道辦事處的管理和監督。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關以及基層行政組織，代表基層政府行使部分管理的權力，管理社區各項行政事務，促進基層社區建設。在發展前期，由於非營利組織自身尚未完善，街道辦事處承擔社會服務職能，行政力量的規範和監

督有利於促進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養老的協同發展。而發展到一定時期，非營利組織在合法條件下具有自治性，在養老服務中心運作過程中，行政力量的過多包攬和干預，反而不利於非營利組織內部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在社區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品質和效率。

因而，在非營利組織健全過程中，應加強自身績效評估和監督體系，減少對於行政力量的過度依賴，依據市場狀況調節供給，促進效率最大化。

(五)社區非營利組織在人員組織和安排層面尚未實現人力資源專業化管理

目前，社區非營利養老服務組織還在摸索中發展，一方面人員結構單一，專業人才匱乏，面臨人員在數量、品質方面的不足。由於資金有限，很大一部分服務人員為志願者、下崗工人或文化水準較低的人群，在醫療、保健、教育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往往沒有能力被非營利組織高薪聘請，組織人員的流動性較大，大部分留任時期不長。符合期望的人員需要具備一定條件，如在老年人的護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經驗和專業知識，能夠對老年人的身體狀況及時判斷等。護理人員隊伍的落後不利於提升社區非營利組織養老機構的服務品質，最終直接影響其效益和聲譽。

另一方面，社區非營利組織缺乏先進的管理人才。組織中優秀的管理人員能夠對內在和外在因素進行計畫、組織、協調和控制，提高非營利組織的可信任度、凝聚力和社會價值。而這方面的管理人員，在我國大多由該社區居委會主任或書記兼職擔任，缺乏對非營利組織架構的認知理解以及專業性的管理技能。目前社區非營利組織在招收人才過程中關注社工們的志願熱情和責任感，但忽視人員的管理創新技能，必定會影響組織的專業化程度和長遠發展。

(六)社區非營利組織在與政府的協同過程中面臨合法性危機和權力問責機

制不健全

當前，相關於社區非營利養老組織方面的法律法規尚未健全。非營利組織在我國須遵守的法律包括：1998年國務院頒佈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⁷《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些條例中存在明顯不合理之處，條例中存在對非營利組織自身經營方面的法律規定，但在協力廠商評估、人員保障、財務制度等方面法治化程度不高，同時欠缺對相關主體和行政部門進行行為約束的明確條文，在實際對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和裁量方面具有隨意性。由此，在權力問責方面便難免滋生問題。

依據問責的內涵，非營利組織問責的實質即對利益相關者負責，包括公眾、媒體、志願者、捐助者、董事會以及政府監管部門，以向社會公開的途徑向多部門報告解釋作為和結果由誰承擔責任，並根據結果接受評判獎懲，旨在提升組織績效，維護公共利益和公眾信任。廣義的問責包括外部權力部門對非營利組織的監督和制約，也包括其自覺的責任意識。正如利特 (Leat, 1988) 在《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Theory and Practice》一書中所述，就非營利組織問責所涵蓋的方面，應包括合理籌畫資金的財務問責(fiscal accountability)，按照正確程式與規則運營的過程問責(process accountability)，保證運營品質和行動目標一致的計畫問責(program accountability)以及行動效率和組織安排的優先性問責(accountability for priorities)，以更周全的問責機制保障非營利組織使命的實現，鞏固公眾的信任。然而，參考目前非營利組織相關的法律，並未從以上多方面加強對權力問責體系的規範和管理。

⁷ 1998年《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登記管理機關對未經批准擅自開展社團籌備的、未經登記擅自以社團名義記性活動的和被撤銷登記後繼續以社團名義活動的均按照未登記社會團體進行取締，沒收非法才正常。

四、對於非營利性組織參與社區養老治理的建議

鑒於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社區發展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在組織內部管理和外部運行環境方面，我們針對性地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一)推動建立多位一體的監督機制，提升非營利組織管理透明度

非營利組織的監督體系包括政府的監督機制、社會監督以及行業監督。完善監督體系和評估機制，有利於促進非營利組織達成使命和目標，實現更高的績效。由於基層社會治理面較廣，人員和事務較繁雜，更加需要多部門的協同監督。在政府層面，相關部門應制定較完備的行動指南，包括監督非營利組織自身的成立和建設過程是否合法、是否遵守社區養老的相關規定，從業人員是否遵守行為準則，組織活動是否存在不正當的競爭行為等。在社會監督層面，應督促非營利組織定期公開財務報表，解釋和說明資金流動去向，邀請獨立的審計機構進行審核，發揮網路和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從而促進資金落實於提供更優質的資源及服務，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利潤指標及商業模式。在行業監督層面，非營利組織協會應定期組織人員對社區非營利機構進行實地探訪，檢驗實際專案落實與目標描述的一致性，將非營利組織信用資訊于網站和平臺上公示，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督體系。

(二)促進非營利組織明確使命和目標，健全績效評估體系

美國公共管理學家 Peter F. Drucker 於《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一書中指出，由於非營利組織欠缺利潤底線，從業人員大多僅在善意激勵下去工作，對需求和成果重視程度不夠，往往造成效率低下，實際與預期相差較大，且非營利組織自身也可能出現志願失靈的現象，

即志願活動中因出現志願者意願不足、資源難以動員，甚至內部交易以及腐敗現象而難以繼續維持。造成這些狀況的原因往往是非營利組織成立之初的使命不明確、績效評估不到位，從而導致的利潤不足和最終效率不理想。因而，非營利組織首先應通過自我定位，明確其存在與發展的使命與目標，並通過制定量化的標準去衡量實際績效是否與目標一致，在績效評估中明確風險較大的服務方式，並制定相應地發展戰略。非營利組織的公益性和有效性可通過服務惠及的人數及滿意度、社會捐贈款項以及從業人員的參與度衡量，明確和記錄季度業績，有利於及時調整社區非營利組織提供的養老服務方式，使有限的財力人力，發揮最大效用。

（三）完善非營利組織相關立法，加強政策扶持

規範的法治環境是促進非營利組織長遠發展的必然要求之一。但在目前，規範非營利組織的法律主要為國務院頒佈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1998）、《基金會管理辦法》（1988），仍未出臺一部完整的非營利組織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尚未健全。同時在特定領域，如提供養老醫療服務的非營利組織，應在相關條文中對公益法人的行為和追責有明文規定。具體可從以下法律層面加以完善：

在我國憲法規定中，公民享有結社自由，限制性條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同時不得損害國家、社會、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及權利”，但對於具體的自由程度以及法律如何保障其實現，還有所欠缺。同時，我國法律對於社會團體的登記條例十分嚴格，大大限制了結社需求，也造成現實中仍存在一定數量、未登記的非營利組織。從實際情況看，應完善社團登記合法性的相關規定，重視社會需求，合理程度內放寬准入限制，鼓勵形成競爭

和優勝劣汰的機制。

在行政法律體系中，相關非營利組織立法問題涉及到行政管理機關的監管內容尚不完善、權力和責任界定有待明確，以及非營利組織的權利和義務的定義需進一步突出。我國目前對非營利組織的劃分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有企業單位以及未註冊或工商註冊的民間組織。以組織產生的原因劃分不同類型，而並非以不同非營利組織具體的治理結構劃分，在現實中易造成對非營利組織法律性質定位不准。因而，應完善相關法律，從不同方面對非營利組織類型界定，使法律體系更加明晰，同時加強對不同類型非營利組織的監管，在具體部門落實和明確責任。

另一方面，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日常管理遵循雙重管理體制，遵守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的規章，但地方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地方法規即檔仍存在空白之處，因而需加強地方對社區非營利組織的針對性管理，出臺更有力的規範性檔。

在經濟法方面，我國目前還未出臺專門針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法規，而是分散在多個規章中，造成各地對組織的徵稅管理缺乏法定化的程式。在這種情況下，應對各地制定統一化的非營利組織徵稅標準。目前，在我國納稅人向非營利組織捐贈的優惠力度一般為3%，相比與國際水準仍較低，應實行更大程度的稅收優惠力度，在稅收激勵體制下，增強非營利組織自身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

在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方面，能否有效利用投入資金是決定非營利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生命線，加強規範非營利組織的財產管理制度仍是重中之重。對於社區內運營的非營利組織，儘管其經營地域較小，但仍應建立資訊公示制度，以法律為準繩，加強對非營利組織資金統籌和監管，避免因財務風險和資金去向不明確而影響組織信譽和形象。

(四) 加強非營利性組織的自身建設

非營利性組織在我國社會中仍處於一個發展完善中的階段，面對社區治理的複雜性，加之人口加速老齡化的社會現狀，使其在參與社區養老治理的進程中面臨更多困難。由於我國的非營利性組織參與社會養老治理的起步較晚，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較為緩慢，因此非營利組織在養老領域的經驗不足。而一個組織的是否能持續穩定的發展，與其自身是否能堅持革新，不斷加強其組織建設密切相關，其次組織內部的治理能力決定其對外資源的整合利用能力，又關係到其工作效能和管理效率。如何提高非營利性組織在社會養老治理的能力，要從根本上加強其自身建設。具體可從以下方面改善：

1. 改善非營利組織服務供給，關注老年人健康和精神需求

在社區治理層面，需著重完善對老年人的起居護理以及心理關懷，社區養老組織方面可開展更多豐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文娛活動，對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定期安排專業人員檢查，加強人員培訓，注重對老人的精神撫慰，避免因親情紐帶減弱和行動不便而陷入抑鬱、焦慮、無價值感等負面情緒，同時應保持更新和完善服務機構的設備，規範非營利養老組織的管理體制，以更高品質的服務照顧到老年人的健康和精神需求，獲得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認可。

2. 拓寬非營利性組織的資金籌集管道

資金作為任何社會團體、組織活動的必要條件，是保障非營利性組織能順利進行自身改革建設、提升服務效能的前提。

一方面，要加強組織自身籌集資金的能動性。目前社會上養老治理的非營利組織主要以依賴政府的財政撥款為支撐，通過專案委託承包的方式參與社區養老治理。組織內部管理仍然拘泥於形式上的“非營利性”，認為一旦不是通過捐贈、

慈善、撥款等官方手段獲得的資金都為不合理。因而，非營利性組織必須轉變觀念，加強依靠自身行銷的理念，發揮組織工作的能動性。

另一方面，要推進准市場化運作。市場化運營作為社會上籌集資金最快捷的途徑之一，是非營利組織獨立籌集資金的有效管道。因此，應充分結合市場有償服務的優勢與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的本質，採取有償和無償服務相結合的方法，保證組織正常參與社區養老治理活動。有償服務，如為老年人定期上門清潔服務，相應收取較低于營利組織的傭金；無償服務，如在社區中舉行老年人為主體的活動，推進社區養老文化建設發展。

其次，要引導企業走進社區養老治理。企業作為市場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推動資金流轉的重要成分。鼓勵企業與非營利性組織進行合作，推動雙方互利共贏。

3. 加強非營利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是組織工作正常運行的養分，擁有充足的人力資源，是非營利性組織持續壯大的關鍵。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可注重以下層面：

(1) 積極回應政府關於養老行業的人才激勵政策

隨著我國老齡化日益嚴重，國家對社會養老行業的扶持逐漸加強，對於高校人才在養老行業的培養也更加重視。而現代社會對於養老行業的從業認可度仍然不高，加之非營利性組織的本質特性，眾多擁有相關專業技能的人才並不願意從事非營利的社會養老治理工作。因此，非營利性組織必須建立並完善好人才儲備支撐系統，完善人事制度的規劃，合理規劃組織內的人員安排，發揮人員的最大效用。

(2) 提升自身員工的專業度

目前我國社會上參與社區養老治理的非營利組織中的服務人員，大多數為下崗職工，其中大部分人並不具備專業的養老服務的技能 and 知識。因此，非營利組織需重視組織人員的專業化培訓，嚴格考核官方資格證書，將自身招聘、培訓、考核、獎懲制度規範化；同時加強人員的在職培訓，提高組織服務人員的專業技能，提高服務效能。

（3）嚴格把控組織管理領導層

組織發展離不開領導層的規劃與管理，在人員的專業能力上，不僅要嚴格把控服務人員的專業度，更要重視管理人員的專業能力。組織中優秀、先進的管理人才，不但能促進組織工作的有效實施，更能增強組織內部的凝聚力，提升非營利性組織在社會中的公眾認可度。

（4）關注組織人員的心理需求

通常，在社會裡為非營利性組織工作的人因自身感到與組織的事業緊密相連，認可其自身工作的價值，從而獲得更多的內在動力，願意長期從事非營利性的活動。滿足組織中服務人員的心理需求，主要是給予他們在組織中的參與感，通過加強組織中民主管理的制度建設，調動非營利組織中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加強社工們的志願熱情和責任感，增強組織的內在凝聚力。

（5）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如今社會公眾對於非營利性組織的認知度仍不高，對於其服務的認可力度不強，因此創設良好的社會環境，有助於非營利性組織健康持續的發展。首先，應加強推廣非營利組織的服務活動，拓寬宣傳管道。其次，要落實非營利性組織的精神本質，贏得公眾認可。

五、非營利組織參與社區養老的現實意義

(一) 數據支撐

參考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⁸所收集的來自中國 23 個省份的 60 歲以上老年人健康狀況、醫療品質以及社區養老服務供需差異等詳細資料，摘要出的關鍵資訊如下表：

表 7 老年人對生活品質的自我評估
Basic situation of self-assessment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变量	自评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好、很好	一般、不好、很不好
性别		
男	2731 (45.5)	1170 (46.8)
女	3276 (54.5)	1331 (53.2)
年龄 (岁)		
60 ~ 69	765 (12.7)	388 (33.7)
70 ~ 79	1652 (27.5)	730 (30.6)
80 ~ 89	1527 (25.4)	653 (26.1)
≥90	2063 (34.3)	730 (29.2)
居住地		
城市	1617 (26.9)	588 (23.5)
城镇	1931 (32.1)	850 (34.0)
农村	2459 (40.9)	1063 (42.5)

表 8 老年人對自身健康狀況的自我評估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condition of the elderly(%)

变量	自评健康状况	
非常好	1052	(18.4)
好	3019	(58.7)
一般	3303	(87.8)
差	1053	(32.1)
非常差	81	(2.7)

從以上調查資料可以看出，在社區養老情況的統計中，仍有約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認為生活品質一般或未達到預期，且隨著年齡的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在接受社區所提供的服務後逐漸提高，凸顯社區養老服務在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質

⁸ 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採用隨訪問卷的形式，最終納入的研究樣本(60 歲以上老年人)為 8508 例。

和滿意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二) 理論意義

自 2003 年起，中國主要城市開始試點政府與非營利性組織簽訂合同，開啟非營利組織融入公共服務管理體制的歷程。發展到黨的二十大後，隨著“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這一重大推斷的提出，基層民主成為社會的熱門論題。非營利組織作為在社會上提供公共服務和產品的協力廠商組織，其作用有別於政府和市場，在社區治理和公共資源配置上具有獨特作用。

1. 非營利組織參與社區養老，彌補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不足，減輕家庭養老經濟負擔

隨著 2020 年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束，資料顯示我國處於“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⁹。隨之加劇的是“家庭結構變化突出”¹⁰的現狀，而基於家庭規模結構小型化、家庭代數結構扁平化、家庭類型結構核心化和家庭戶老化及老化速度超過人口老齡化速度等突出特點。研究認為，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依靠子女贍養老人以及政府的微薄補貼，並不能保障社會日益增長的老年化需求。其次，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80 後逐步承擔社會發展的主要責任，“4+2+1”的家庭模式¹¹開始成為中國大多數家庭的結構。加之現代人的平均壽命普遍提高，而經濟發展下的我國的社會生活成本也不斷增加。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經不足以滿足人民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家庭養老負擔也成為社會的熱門議題。

2. 是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的更具人性化的社區治理方法，有利於促進社區居民的主觀幸福感

⁹ 中國式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2023. 03. 05.

¹⁰ 王磊. (2023). 中國家庭結構變化及其政策意涵——對“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思考. 人口與發展(01), 118-122.

¹¹ “4+2+1”家庭，是指家庭中包括夫妻雙方父母四位老人、夫妻二人、未成家的孩子一人。此種家庭上有老下有幼，“421”家庭大多是夫妻雙方都為獨生子女。

中國社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注重社會中的倫理關係。即使我國社會在受到西方社會養老服務推進的影響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正逐步完善，養老院、福利院等營利或非營利機構日益增加，但在我國的絕大多數老年人口並不願離開原生活區域安度晚年。依靠非營利組織補充社區養老服務，讓老年人留在居住已久較為熟悉的區域，在社區鄰里互相關懷的人際紐帶下安享晚年，更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空巢老人¹²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幸福感。

在非營利組織的推動下，“互助式養老”的概念正逐步被社會所接納。它以社區內部中老年人之間的互信互惠為基石，以年輕老年人說明年長老年人為模式，在雙方的互助中滿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情感需求，有助於實現基層社區內的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盡顯社會的人文關懷。

3. 有利於打造社區多元化治理格局，改革公共服務體系

從“十三五規劃”到“十四五規劃”¹³，我國不斷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在堅定不移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著力推進涵蓋理論、制度、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強調的是多元化治理¹⁴，即依靠多方力量共同治理基層，讓人民百姓參與社會生活的管理與發展，在我國的突出體現為政府職能的逐步轉移，以及基層自治的逐步推廣。公共服務的改革基於我國人口老年化逐步擴大、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在社會不同年齡階層具有差異性的前提下，僅僅考慮社會大背景下的改革是遠遠不足的，因此改革社會公共服務需著重考慮老年人的社會需求。

4. 非營利性組織活動開展的針對性強，有利於提升社區養老服務品質

¹² 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離家後的中老年人。當子女由於工作、學習、結婚等原因而離家後，獨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婦因此而產生的心理失調症狀，稱為家庭“空巢”綜合症。

¹³ 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參考：《人民日報》（2022年02月22日01版）。

¹⁴ 多元化治理，讓民生幸福更綿長，來源：西部網-陝西新聞網，2022.11.23.

社區雖然是社會中人們聚居的最小單位，卻聯繫萬千家庭的需求。僅依靠社區的直接管理及志願者參與，無法有效解決高齡、生活難自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因此，應深化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拓寬社區的服務內涵，協同社會力量及社區各群體以共同打造居民共建共用的新格局。非營利性組織以其獨立性、志願性、非營利性的特點參與社區治理，能夠為滿足養老供需、解決社區養老問題提供一條有效路徑。

基礎的社區工作依靠社區服務組織的精心管理，其人員構成主要為社區常住人口，依靠自發性活動發揮居民的主人翁精神，低成本、高效率地解決實際問題。例如，部分社區開展“社區食堂”，緩解高齡獨居老人“做飯難”的問題。同時社區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依託社區內的人際關係，能更好的關注困難群體的需求，有效解決老年人不願主動溝通和傾訴困難的壁壘。

其次，非營利性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能夠對社區中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成立相應的類別組織工作。這種強針對性的服務，可有效補充黨領導下的社區服務組織非專業化造成的的缺口，提高便民辦事效率和社區治理水準。對社區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人群而言，他們通常會感到與社會公益性事業緊密相連，產生更多內生動力，使社區服務品質也更有保障。

5. 有利於助力社會資源管理，彌補供需不平衡

隨著社會公共服務的需求持續增長，僅僅依靠公共部門服務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2003 年至今，我國的社會服務領域的公共服務外包已經擴展到全國範圍。這種由政府購買非營利組織服務，並對其給予指導的公共服務外包模式，在解決長期的資源供需不平衡問題有其獨到之處。而非營利組織由於社會地位、合法性問題、人員組織安排及資金短缺問題，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因此，

這種社會公共服務外包的新格局還需不斷完善，彌補養老供需缺口，實現社會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

6. 在宏觀意義上，有利於推動我國非營利性體系自身完善

經濟的高速發展下，現代社會對非營利性組織的認可不斷加強。結合國內外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經驗，現代社會的公共服務在非營利組織的參與下獲得更加深入的發展，而我國政府也不斷加強對於非營利性組織的財政支援，建立有效的評估和監督機制，在多方面的力量推動下，有利於加強非營利性組織體系的健全和規範化發展。

六、總結

非營利性組織作為參與我國社區養老治理的協力廠商組織，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老齡化日益增加帶來的養老問題。它協助公共部門平衡社會供需，緩解養老服務中的資源需求缺口，在中國基本國情和傳統倫理道德角度為養老治理提供更人性化的解決措施，協助實現基礎社區的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除此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公眾對於社區養老治理的重視。

本文通過文獻分析法、歸納演繹法，試圖歸納總結出非營利性組織在我國社會養老治理服務中的作用。通過對其發展的歷史背景分析，聚焦于非營利組織在目前治理格局中的現存問題，探究社會將來在養老服務發展的方向。瞭解和調查非營利組織在社區養老服務發展狀況後，我們針對性地提出建議：非營利性組織自身應完善內部管理、監督、評估機制；加強組織內部人力資源專業化管理；拓寬組織的資金籌集管道。為促進非營利性組織未來長遠發展，本研究認為此三方面，亟需成為治理重點。

目前在我國社會，國家對於社區養老治理的政策扶持有所加強，但非營利性組織在社會養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較其他國家程度更低，仍處於成長階段。可我們不難發現其卓越的成果，參與社區養老的發展之路廣闊而光明。究其根本，如何實現在養老服務上的持續發展，還需依靠組織自身與政策環境的規範和完善，方能真正將社會養老治理的工作落到實處。

Research on the Involve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Yan Cheng Xintong Xie

Abstract: Confronted with continuous trend towards ageing, Chinese society is facing ongoing challenges of providing full-scale healthcare and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community aged-care services is unable to meet the ever increasing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imposing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supply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erving as third-party institu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assisting community elderly care, which combines the advantage of public policy response. This more diverse and flexible service approach meets the liv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helps to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 a manner that facilitates the multi-governance mechanism. However, during process of engagem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till reveal deficiencies in balanc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s well as facing operational inefficiency, and personnel organization issues. Through background and caus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address challenges based on practical cases and management theories, so as to fulfill people well-being through “ageing in place”.

Key wor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ocial welfare;
Public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經濟管理學刊》 投稿須知

《經濟管理學刊》由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主管、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經濟管理研究所與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 2023 年 3 月，是國際性經濟管理專業刊物，每半年出版一期。本刊以“理論、實踐、前沿”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經濟管理領域的繁榮和發展。

本刊歡迎國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投稿注意事項如下：

1. 來稿必須以繁體中文撰寫，全文字數以 5000-8000 字為宜；
2. 來稿文責自負，必須為原創且未經其他期刊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稿件一經採用，本刊可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或經本刊授權其他個人或單位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惟投稿 3 個月後仍未獲任何回覆，則可另投他處；
3. 本刊有權刪改來稿內容，如不同意，請在來稿中注明；
4. 為了統一規範論文的撰寫、編輯、印刷，以及為了便於論文處理、儲存、檢索、利用、交流、傳播等，投稿之論文格式請參照《體例要求》；
5. 來稿文章須同時以 WORD 檔及 PDF 檔格式電郵至 :imiarajem@hotmail.com

《經濟管理學刊》體例要求

一、頁面設置

1. A4 大小，標準邊界設定，除圖表、註腳、參考文獻、英文資訊行距為 1 外，全文行距為 1.5。

二、標題、課題資助、作者姓名、作者簡介

1. 文章標題為 16 號標楷體、加粗、置中；
2. 如有課題資助，則在文章標題尾以上標標註“*”號，並以插入註腳形式說明，採用 10 號標楷體；
3. 作者姓名為 12 號標楷體、置中，設於文章標題下一行；
4. 作者簡介在作者姓名尾以上標標註“*” / “**”號（如有課題資助），並以插入註腳形式說明，採用 10 號標楷體，順序介紹作者的姓名、學歷、單位、職稱及研究方向等。

三、摘要及關鍵詞

1. “摘要”、“關鍵詞”為 14 號標楷體、加粗；
2. 摘要字數一般在 300 字內，關鍵詞通常為 3-5 個，關鍵詞之間用分號隔開；
3. 摘要、關鍵詞內容為 12 號標楷體。

四、各級標題、正文文字

1. 文章一般設置四級小標題，各級標題按行文所需使用。
2. 一級標題以“一、”“二、”……編號，14 號標楷體、加粗、置中，標題後不加標點符號；
3. 二級標題以“（一）”“（二）”……編號，12 號標楷體，標題後不加標點符號；
4. 三級標題以“1.”“2.”……編號，12 號標楷體，標題後不加標點符號；

5. 四級標題以“(1)”“(2)”……編號，12號標楷體，標題後不加標點符號；
6. 正文文字為12號標楷體。

五、圖、表

1. 若文中含有圖、表，務必保證其中的符號、數字、文字、圖線清晰規範。圖、表需放在正文提及之後，需連續編號，如“圖1”、“表1”。

1.1 表

- 1.1.1 表號、表題放在表的上方，表號空一全形空格後加表題，表號、表題採用10號標楷體、加粗、置中；
- 1.1.2 表中文字採用10號標楷體；
- 1.1.3 “資料來源”應置於表下方，採用10號標楷體、置中。
- 1.1.4 “註”排在“資料來源”下一行，頂格。
- 1.1.5 全表行距為1。

1.2 圖

- 1.2.1 圖號、圖名放在圖的下方，圖號空一全形空格後加圖名，圖號、圖名採用10號標楷體、加粗、置中；
- 1.2.2 圖中文字採用10號標楷體；
- 1.2.3 “資料來源”應置於圖名下一行，採用10號標楷體、置中。
- 1.2.4 “註”排在“資料來源”下一行，頂格。
- 1.2.5 全圖行距為1。

六、英文資訊

1. 標題、作者姓名、摘要、關鍵字四部分全部翻譯成英文，放在正文後，行距為1；
2. 文章英文標題為16號Times New Roman、加粗、置中；
3. 作者姓名為12號Times New Roman、置中，設於文章標題下一行；
4. “Abstract”、“Key words”為14號Times New Roman、加粗；

5. 摘要字數一般在 300 字內，關鍵詞通常為 3-5 個，關鍵詞之間用半形分號隔開；
6. 摘要、關鍵字內容為 12 號 Times New Roman，使用半形標點符號。

七、參考文獻

1. 參考文獻以插入註腳形式置於頁底，參考文獻採用 10 號標楷體，行距為 1；
2. 標註方法採用 1，2……作序號且順序編碼，按正文中引出的先後次序列出，序號頂格，序號空一全形空格後加註釋文字，同時在正文中用上標標註序號；
3. 參考文獻詳見《GB/T 7714-2015 資訊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參考文獻主要格式如下。

3.1 專著

專著是以單行本形式或多卷冊形式，在限定的期限內出版的非連續性出版物，包括以各種載體形式出版的普通圖書、古籍、學位論文、技術報告、文集、彙編、多卷書、叢書等。基本著錄項目與著錄格式為：

[序號] 主要責任者. 題名:其他題名資訊[文獻類型標誌]. 其他責任者. 版本項.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頁碼[引用日期]. 獲取和訪問路徑.

示例：

- 1 餘敏. 出版集團研究[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179-193.
- 2 昂溫 G，昂溫 P.S. 外國出版史[M]. 陳生錚，譯.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88.

3.2 連續出版物

連續出版物是載有卷期號或年月順序、計畫無限期地連續出版發行的出版物，包括以各種載體形式出版的期刊、報紙等。基本著錄項目與著錄格式為：

[序號] 主要責任者. 題名:其他題名資訊[文獻類型標誌]. 年，卷(期)-年，卷(期).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日期]. 獲取和訪問路徑.

示例：

- 1 中國地質學會.地質評論[J].1936,1(1)-,北京:地質出版社,1936-.
- 2 中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學通訊[J].1957(1)-1990(4).北京:北京圖書館,1957-1990.

3.3 專著中的析出文獻

專著中的析出文獻是指專著中析出的具有獨立篇名的文獻。基本著錄項目與著錄格式為：

[序號] 析出文獻主要責任者.析出文獻題名 [文獻類型標誌] 析出文獻其他責任者 || 源文獻主要責任者.源文獻題名:其他題名資訊.版本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獻的頁碼[引用日期].獲取和訪問路徑.

示例：

- 1 程根偉.1998年長江洪水的成因與減災對策[M] || 許厚澤,趙其國.長江流域洪澇災害與科技對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 2 鐘文發.非線性規劃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應用[C] || 趙瑋.運籌學的理論與應用:中國運籌學會第五屆大會論文集.西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6.

3.4 連續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獻

連續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獻是指連續出版物中析出的具有獨立篇名的文獻。基本著錄項目與著錄格式為：

[序號] 析出文獻主要責任者.析出文獻題名 [文獻類型標誌].連續出版物題名:其他題名資訊,年,卷(期):頁碼[引用日期].獲取和訪問路徑.

示例：

- 1 李曉東,張慶紅,葉瑾琳.氣候學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自

然科學版，1999，35（1）：101-106.

2 丁文祥. 數字革命與競爭國際化[N]. 中國青年報，2000-11-20(15).

3.5 電子文獻

電子文獻是以數字方式將圖、文、聲、像等資訊儲存在磁、光、電介質上，通過電腦、網路或相關設備使用有知識內容的文獻資訊資源，包括電子書刊、資料庫、電子公告等。

凡屬電子圖書、電子圖書中的中析出文獻以及電子報刊中析出的文獻基本著錄項目與著錄格式分別按專著、專著中析出的文獻、連續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獻中的有關規則處理。除此之外的電子文獻基本著錄項目與著錄格式為：

[序號] 主要責任者. 題名:其他題名資訊 [文獻類型標誌/文獻載體標誌].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 獲取和訪問路徑.

示例：

1 江向東. 互聯網環境下的資訊處理與圖書管理系統解決方案[J/OL]. 情報學報，1999，18（2）：4[2000-01-18].

<http://www.chinainfo.gov.cn/periodical/qbxb/qbxb99/qbxb990203>.

2 蕭鈺. 出版業資訊化邁入快車道[EB/OL]. (2001-12-19)

[2002-04-15] <http://www.creader.com/news/20011219/200112190019.html>.

3.6 文獻類型和標誌代碼

普通圖書M，會議錄C，彙編G，報紙N，期刊J，學位論文D，報告R，標準S，專利P，資料庫DB，電腦程式CP，電子公告EB。

電子文獻載體類型標誌代碼如下：磁帶MT，磁片DK，光碟CD，聯機網路OL。

經濟管理學刊

主管：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主辦：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經濟管理研究所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

主編：高勝文、張向前

編輯：曹洪彬、鄭傲軒、劉弘燁、陳家豪

出版：學研出版社

印刷：學研出版社

版次：2023年12月第一版

印數：1000本

定價：80元

ISSN：2957-675X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簡介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於2013年9月1日創立，並於2017年6月7日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的非牟利學術研究權威機構。本院章程於2017年6月14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24期第二組，於澳門身份證明局的法人登記編號為：8149號，於澳門公證署的法人登記編號為第1/2017/ASS檔案組第44號。

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及本院《章程》開展院務工作，以熱愛學術研究，團結世界廣大學術研究愛好者；熱心服務社會，推廣、普及、促進各學術研究領域的繁榮和發展為宗旨。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並先後與國內外多所大學及知名機構建立了國際友好合作關係，一舉成為澳門最有活力、最有影響力的學術研究組織之一。

本院下設14個研究單位、5個工作單位及6個附屬機構，涉及研究、文化、教育、慈善、社服、出版、競賽等。現有音樂、體育、教育、心理、文學、歷史、社會、經濟、管理、語言、資訊、藝術、醫學、數理、建築、天文等領域之專家學者會員2200餘名（含下屬單位會員）。

本院憑藉良好的發展勢頭贏得了業界的讚譽，自籌備、創立至今，已完成為院校捐建港澳台圖書專館、推進中華母親節設立、申報研究項目獲澳門特區政府立項資助、主辦多個國際性與全國性學術及文化藝術比賽、捐贈多個獎助學金及研究基金、資助出版多部學術專著及多項文體活動，以助力國家教育事業發展，並在各領域為社會建言獻策、貢獻力量，以實際行動踐行愛國愛澳。多年來，已出版和參編多部著作，並在專業期刊發表多個領域之論文，學術研究成果也在多個領域多次獲獎。日後，期望能進一步把本院建設為國際上有知名度的研究機構和重要智庫。

為了使廣大學術研究愛好者及時溝通國內、國際學術研究資訊，本院每年主辦或合辦學術活動、比賽、研討會等，並吸收各地學術研究愛好者為會員，以便更好地促進學術研究活動。在此，本院熱烈歡迎各位學術研究愛好者加入，共同推動澳門學術研究事業向更高層次邁進！

聯系方式

官方網頁：<https://www.imacuiar.org>

官方電郵：imacuiar@hotmail.com / imacuiar@gmail.com



ISSN 2957-675X



9 772957 675006 >

定價：80 元